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争

〔日〕池上惇著

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争

〔日〕池上惇　著

林茂森　周铁山译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

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争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
天津新华印刷四厂　　承　印
850×1168　32 开本　7.5 印张　166 千字
1985年7月第一版　1985年7月第一次印刷
丛书编号：2—2　　成本费：1.00 元
印数：1—3000册

（党校系统内部发行）

出 版 前 言

本书介绍的是国外学者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上的争论情况，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同志可以从中了解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观点和分歧所在。这种把各种不同观点加以汇编介绍的资料书，对研究者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能编印一些国内社会科学界开展“百家争鸣”的资料，供大家研究参考。

“百家争鸣”是和“百花齐放”一起，作为指导我国文化科学事业的根本方针提出来的。自从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这个方针，到现在已经二十八年多了，回顾既往，我们不能不承认，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个方针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贯彻。现在，“文化大革命”中那种“万马齐喑”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了，这几年我们的报纸杂志和论文集，对不少理论问题开展过辩论、探讨。但是，当年提出这一方针时曾经设想过的那种由于“百家争鸣”而带来的科学繁荣的新局面，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至今还没有完全达到。当前，新事物层出不穷，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提供的新情况新问题是如此丰富多采、错综繁杂，而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却来不及作出一些最基本的比较系统的理论概括，更不要说为实践鸣锣开道、指明方向了。理论战线这种落后贫困的现象，大概同缺乏“百家争鸣”的风气和传统不无关系。惊弓之鸟没有争鸣的勇气是可以理解的。

马克思主义需要在同新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发

展。这种结合是一个不断探讨、分析、吸收、扬弃、比较、概括的过程，是对新事物的认识不断升华、凝炼的过程。由于人们的历史经历和社会体验不同，马克思主义的修养不同，文化科学知识的基础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因而对同一问题的认识也必然会有所不同；即使是雷同的认识，也必然会在认识的深度、广度上出现差异。人们认识的这种多样性，正是社会本身多样性的反映。只有允许各种不同的认识在自由的气氛中充分抒发，各种思想通过交流、争论而相互冲击、切磋，换句话说，只有经过充分的“百家争鸣”，才能取得正确的认识，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这个道理是不难理解的，但关键在于如何在实践中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西谚有云：“沉默是金，语言是银”，我们应当补充一句：实践是金银都无法比拟的无价之宝！

让社会科学在“百家争鸣”的实践中更快地繁荣起来。

《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编选组

1984年9月28日

译 者 说 明

本书作者池上惇，日本京都大学经济学部（系）副教授，专攻财政学。他的主要著作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现代世界危机与资本输出》、《财政危机与居民自治》等。作者的学术观点属于“讲座派”，亦称“正统派”。

本书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争论的历史；并从日本争论的国际背景角度，介绍和评论了苏联、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几种对日本影响较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观点。

应当说明，由于作者是从私人合法占有税收从而扩大资本积累和促进公共企业发展这一基本观点，来考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而又把这种观点运用在介绍和评论各派观点上；同时，作者又重点宣传了欧洲、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提出的“经济民主”观点。因此，本书也反映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研究中一个流派的观点。其中有些论点显然是不正确的，如虽然对希法亭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概念持批评态度，但很不彻底，甚至认为希法亭的错误在于对社会改良的评价“很低”，等等。但是，本书可以使读者对于国外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特点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上的各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及其争论情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发展史，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本书根据日本青木书店1979年版译出。

译者水平有限，可能有不妥或误译之处，请不吝指正。

前　言

日本社会深处的变化和改革是很缓慢的，当人们开始普遍地认识到这一点时，以通货膨胀、大萧条和战争危险形式表现出来的生活和生命的危机，就突然地表面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资本主义就是建立在这种不稳定状况基础之上的。对于这种不稳定、变化和剧变的前景，以科学的合乎规律的准确性进行预测的愿望，或者说以科学的认识展望社会和国家变革的愿望，不断地增强人们对于能够综合地把握现代资本主义的理论的关注程度。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就是这种理论的核心，或者说是最主要的理论之一。从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起，它不仅受到经济理论工作者的注意，而且也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探讨垄断、国家或这二者的关系时，不外乎对于两个问题进行综合的研究：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经济现象即大企业和垄断组织的统治；另一个是最典型的政治问题，即国家作用的增强。

因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从其诞生时起，就是同经济方面的萧条、失业以及财政改革、国有化问题之类大企业和垄断组织的危机结合在一起的，也是同战争、动乱、政治、革命和政党纲领等高度政治性的问题结合在一起的。

本书研究的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的争论，如果探赜索隐，会发现这是一个带有极其严峻意义的实践问题。所以，科学地探讨理论上的问题是一项饶有兴趣的工作，但也正因为如此，就更加困难。尽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是一项如此重要的研究

课题，但还几乎没有一部能够把这个理论本身做出概括的著作，其原因也在这一点。

我从1965年由有斐阁出版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一书以来，从财政学角度出发对于争论的历史寄以莫大的关心。但因为日本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在六十年代后期似乎已经得到解决，于是对于整理争论的工作就不觉得那么迫切了，而把精力放在经费理论和地区自治体问题的研究上。

我现在决心尝试整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争论问题的动机，有下述几点。

第一，进入七十年代，在物价暴涨、石油危机之后，大企业囤积和投机盛行，由居民自治的力量限制垄断组织，通过课税和直接限制等手段实行经济民主的趋势，已经作为一个现实的问题出现了。众所周知，自从已故服部英太郎先生的古典著作问世以来，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领域里，就曾经把经济民主这个概念，同希法亨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学说作为一个东西进行过批判。最近这个概念又在法国的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中以全然不同于希法亨的这个概念的形式提了出来。尽管如此，仍有进行一些再讨论的必要，是自不待言的。

再者，还出现了这样的动向：对于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典理论的列宁学说进行评论，对于作为列宁逝世之后的苏联理论家，为他作出评价还十分困难的布哈林的学说进行重新研究。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产生了整理日本争论情况，和从扎根于日本的研究角度出发，对于这些学说进行评价的必要。以上就是我整理争论情况的直接动机。

第二，东德和西德学术界围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争论的问题，由丰崎稔、大野英二两位教授介绍到了日本，并作了评论。在那里是从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概念的对比上，提出希法亨的有组

织的资本主义概念的。比较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只能有待于今后的研究。但完全可以认为，这是国际上争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有了新发展的标志。当向这次争论学习之际，我不由得想到把日本历来争论的问题整理出来，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第三，在我专攻的财政学领域内，有关国家和财政问题的研究有了进展。如本书反复谈到的，关于资本积累与官僚机构发展的相互关系的实证研究，也有了进展。可以认为，现在已经达到了可能对于争论做出一定理论概括的阶段。研究国家与财政理论的先驱岛恭彦教授积累了很多成果。他最近发表的《地区的政治与经济》、《通货膨胀》两书，都是他历来研究的总结。作者本人由于同财政学研究会同仁和大学院生① 的共同研究，由于同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自治体理论学科的工作人员的共同讨论，得到了讨论国家理论、自治体理论和希法亭学说的机会，所以才有可能把这些论点整理出来。

随着工作的进展，我更加确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本来就是同财政学中的专卖理论和赋税理论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以这些理论为基础试行整理论点，反而会出人意料之外，有可能全面地理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而且日本的财政学研究，在用实证方法和从理论上研究地区和自治组织问题方面，积累了出色的成果；也可以说，在扎根于日本社会的关于垄断和国家的研究方面，具有优良的传统。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整理外国的争论问题可能比较容易，这也是我下决心把本书公开发表的一个主要原因。

最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日益受到关注，但全面研究争论的书籍资料却又很少，这也是促进我出版本书的一个原因。过

---

① 大学院生即读硕士或博士课程的研究生。——译者注

去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曾经公开发表过若干谈到日本争论问题的短评式的文章；但可以说根本没有试图把日本争论的问题再拿到国际争论上去，从而使理论本身丰富起来的著作。也因为研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历史还很短，看来如果规定一个固定的命题，再用这把尺子去衡量一切理论，并不能和现阶段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因此，本书采用的叙述方法是：用从日本的争论中获得的积极成果，回过头来去衡量国际争论的主要论点，以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更具有普遍的意义，并探讨今后进一步研究的线索。我的这一尝试是否成功，只好有待于读者的判断，如果本书能够对于关心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和日本资本主义的人们，在争论的若干论点上起到某些参考作用，并做出一定的贡献来，则幸莫甚焉。

当本书完成之际，首先应当强调许多年轻的研究人员对我的巨大促进。同京都大学经济学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研究小组的共同讨论，以及青木书店编辑部的热忱相助，都直接地促成了本书的问世。在资料整理工作方面，得到鹤田广巳、佐佐木雅幸两位先生的巨大援助。对于经常在一起从事研究和教育工作的经济学部的同事，深致谢意。

池上惇

京都大学经济学部研究室

1977年5月10日

叙述顺序

日本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的争论[1]经历了这样的过程[2]：它的出现常常是带有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假说的性质，后来，在对于战后日本资本主义进行具体分析的过程中，它的真理性受到了检查，通过了考验，才作为理论确定了下来。如果这种理论是足以分析日本资本主义的理论，那末，一方面它必须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特征做出概括。这就要说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争论势必涉及到国际上的争论的问题，不能不反映国际争论，诸如瓦尔加争论、齐香争论以及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争论和晚期资本主义论的争论，等等。

另一方面，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也要明显地受到日本国家与经济关系的特殊情况——特别是由国家垄断代替和补充现代垄断的历史情况——的决定，不能不反映日本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和类型。这就可以使日本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研究中提出了许多西欧和苏联在争论中还没有可能提到的论点，从而使前面谈到的一般理论不断地丰富起来，並为更加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的出现创造了前提。[3]

本书第一部分研究日本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争论。在这里讨论有国际争论背景的日本的争论向国际争论提出了什么问题，讨论是否通过扎根于日本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解决了这些问题，以丰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

第二部分继第一部分之后，从扎根于日本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研究成果方面深入探讨国际上展开讨论的主要论点，为更加具

有普遍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体系化做好准备工作。

末章则概括地展望。从现在已经达到的理论水平来看，什么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系化的基本方向。

注　释：

1. 日本通过介绍列宁和布哈林的著作以及共产国际的报告，最为系统地研究总危机理论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著作，是河上肇的《第二贫乏物语》，1929年出版（载《河上肇著作集》第2卷，筑摩书房）。据小林晃的看法，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研究前史，是战前的劳农派开创的。《劳农》杂志1931年发表的“提纲”，和1932年改造社出版的《远东资本主义》第15章“国家资本主义”，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包括了问题的基本内容。参阅小林晃：《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争的展开》（载大内兵卫、向坂逸郎主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大系》第4卷《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上册河出书房新社1970年），第68页。第二次大战刚一结束，一部分学者出现了一种趋势，认为与其把当代资本主义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还不如作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来考察，其中就有宇野弘藏。他在《资本主义的组织化与民主》（载《世界》1946年5月）一文中评论希法亭和布哈林时说：“……对于把各国继1929年大危机之后，在三十年代出现的国家主义倾向，直接看作金融资本自主活动的产物，……还有许多疑问。……相反地，莫如认为国家主义倾向产生的根据在于：金融资本在再也不能把自己的负担转嫁出去的失业和农业危机问题上，暴露了自己的软弱无力。……资本主义不得不采取超越金融资本组织化限度的、能够实现更加高度组织化的形式。莫如认为，最近出现的国家主义倾向，就是这样的资本本身自我保存的形态。”

把资本主义组织化看作是处理农业危机和失业问题的一种机构，这个观点基本上也被本书准备介绍的大内力所继承。宇野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是：“资本主义处在重要的转折点上，只要它不能靠民主的方法发展资本的新形式，就是从面对苏维埃社会主义来说，也失去了它可以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可以认为，这种观点在许多方面与希法亭的有组织的资本主

义论有共同之处，参阅本书第二部分“关于希法亭”。

2．参加了第二次大战后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争论的人们，几乎无一例外都对于日本资本主义进行了分析。井上晴丸、宇佐美诚次郎、大内力、手岛正毅、南克巳、守屋典郎、岛恭彦、玉垣良典、大内秀明、户田慎太郎、池上惇等人，都是如此。

3．我在整理争论史时使用的方法是：使理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互相交叉，以普遍性为指针阐明特殊性，並与普遍性相对比考察特殊性，从而使普遍性更加丰富起来。

普遍与特殊，一般理论与特殊类型的理论之间的关系，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的方法论上的问题研究时，包含更为复杂的问题。由于这里的课题不是研究分析资本主义的方法本身，所以不再做更为深入的探讨。

目　录

前言……（1）
叙述顺序……（1）
第一部分　日本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争论的基本问题
第一章　井上晴丸、宇佐美诚次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3）
前言……（3）
Ⅰ　统制经济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4）
Ⅱ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资本积累……（7）
Ⅲ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12）
Ⅳ　小结……（15）
第二章　“生产关系社会化”的争论……（19）
前言……（19）
Ⅰ　井汲卓一、今井则义对齐香的批判……（25）
Ⅱ　“作为生产关系的国家”的实际内容……（29）
Ⅲ　“公的职能”与官僚机构……（37）
Ⅳ　批判“生产关系社会化”论的各种谱系……（48）
第三章　资本积累与官僚机构……（55）
前言……（55）
Ⅰ　手岛正毅的“利润率趋向下降原因”说……（56）
Ⅱ　大内力的“劳动力商品危机原因”说……（63）
Ⅲ　南克巳的“市场危机和军事化”说……（68）

Ⅳ “资本积累与官僚机构互相联系”说……(72)
第四章 展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争论的新局面……(82)
Ⅰ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的“复活”……(82)
Ⅱ 晚期资本主义论……(85)
Ⅲ 法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与日本的新动向……(87)
第二部分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争论的国际背景
第一章 平内尔与列宁——国家垄断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95)
第二章 布哈林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论……(100)
前言……(100)
Ⅰ 金融资本与“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102)
Ⅱ 垄断与竞争……(108)
第三章 关于希法亭——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17)
前言……(117)
Ⅰ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与经济民主……(118)
Ⅱ 社会国家还是阶级国家?……(128)
第四章 瓦尔加争论中的国家和垄断……(133)
Ⅰ 总资本家的国家和垄断资本的国家……(133)
Ⅱ 为自由市场的生产和为国库的生产……(138)
Ⅲ 瓦尔加争论的意义和局限性……(145)
第五章 关于齐香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149)
前言……(149)
Ⅰ “阶段论”批判……(155)

Ⅱ 垄断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59)
Ⅲ 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61)
代结束语……(165)
第六章 关于欧洲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争论的主要论点（一）——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的“复活”……(167)
前言……(167)
Ⅰ “融合论点”与“官僚制论点”的争论……(168)
Ⅱ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的“再生”……(173)
Ⅲ 竞争与改良……(177)
第七章 关于欧洲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争论的主要论点（二）——晚期资本主义论的问题……(180)
前言……(180)
Ⅰ “资本——劳动的命题”与“阵营间矛盾论的命题”……(181)
Ⅱ 限制垄断与官僚机构……(184)
Ⅲ “内在逻辑”与国家的地区性……(189)
末 章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争论的成果和问题……(193)
前言……(193)
Ⅰ 总危机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93)
Ⅱ 资本积累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99)
Ⅲ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210)
后 记……(218)

第一部分

日本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争论的基本问题

第一章　井上晴丸、宇佐美诚次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

前　　言

日本在第二次大战后，第一次大规模地讨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据认为是从井上晴丸和宇佐美诚次郎著作的发表开始的。他们于1948年1月在《潮流》杂志上发表了论文，又于1949年10月1日，由潮流社出版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现阶段日本经济分析》一书[1]。这本书经过修订，1951年2月以《危机中的日本资本主义结构》为题由岩波书店出版[2]，以后一直到现在多次再版。从修订本的书名可以看出，该书不是研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本身的，而是对现阶段日本经济的分析，或者说是研究日本资本主义结构的。正因为它是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作为分析日本经济的指导思想提出的，所以就比单纯抽象的理论叙述包含了远为现实、具体的论证，也就能够把它的内容作为在争论史上第一个形成了体系的成果介绍出来。该书的中心思想，从岩波版（下面的讨论以这个版本为主）题为“开端，问题的联系”的开头小论部分等处可以看出。下面试就该书内容依次进行一些研究。

注　释：

1. 井上晴丸、宇佐美诚次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潮流社1950年。

2.井上晴丸、宇佐美诚次郎：《危机中的日本资本主义结构》岩波书店1951年第1版。这本书在1957年当时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理论工作做出的业绩的评价，参阅林直道：《现代资本主义理论问题》（载《经济评论》1957年2月），第46页。

I 统治经济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第一个问题：作者主张，如果分析第二次大战后日本资本主义，虽然要以适用于分析战前日本资本主义的理论为依据[1]，但也需要有足以把握第二次大战后日本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综合性的理论。

作者认为，这个理论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是因为，它是从理论上阐明"在战争经济过程中出现的异常危机"中，"垄断资本主义怎样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而"一旦实现了过渡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战争经济结束之后仍然覆水难收，並且在战后的前所未有的尖锐化的危机中，发展得日益成熟。因此，无论从国际方面或是从国内方面论述当今的日本，如果排除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观点，任何问题都不能解释"[2]。这时，作者考虑的事实是：1937年侵略中国大陆开始，在此前后爆发的农业危机、工人运动、租佃纠纷、军备扩张、财政膨胀、国家资本活动领域的扩大、垄断资本与国家资本"勾结的加深"、殖民地半殖民地排斥日货运动、英国停止金本位制、二·二六事件①、修改重要产业统制法（1936年）、日铁建立（1933年）、进

① 二·二六事件是1936年2月26日在日本发生的陆军内部皇道派下级青年军官反对统制派军官的一场武装叛乱，杀死内大臣、藏相等多名元老、重臣，后被镇压下去。——译者注

口汇兑许可制度、米谷自治管理法、电力国有、加强治安维持法，等等[3]。一般地说，过渡到战时统制经济包括：1，国家对资源、资金、进出口物资、汇兑等实行分配制和配给制；2，强迫实行辛迪加和卡特尔，通过国有化实行强有力的产业统制、流通统制；3，同时对于军人和劳动力即军需生产所必需的人力资源进行强制性安排（包括普遍义务劳动制）[4]。以上是战时统制经济一般趋势在日本的表现（当然，这种一般趋势是结合日本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表现出来的。还必须注意：贸易部门的统制易于进行，八幡制铁所等传统的国营公司的作用很大，农业统制机构举足轻重，等等。但这些並不否认上述一般趋势）。而且这些统制机构在战争结束之后，经过改头换面继续存在了下来。例如，资源等的分配制度，从根据行政命令进行直接统制过渡到通过财政、中央银行和汇兑管理进行的间接统制；从强迫实行卡特尔过渡到由通产省进行行政领导；劳动力的安排则过渡到属于劳动省就业政策等范围内的工作。但是，“国家统制的调节职能异常强化”[5]的事实却是难以改变的。作者说，战时统制经济的核心在于军需物资的订货制（武器等的制造由政府向企业定购）。为保证订货的落实采取了资源分配、强迫实行卡特尔、劳动力安排、确保殖民地的资源、市场和劳动力的体制，创造了产出的物资向政府交纳时“保证垄断资本优惠利润”的机构[6]。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经济面临着军需生产崩溃的局面，重工业产品价格剧跌。为了保持重工业部门产品价格，挽救其经营危机，必须依靠国家财政金融和行政的力量维持“物价与工资”的稳定[7]。

作者认为，由政府提供补助金以维持钢铁和煤炭的价格，以这两个部门的工资水平为基准统制整个工资水平，通过复兴金融金库等重点地向重工业部门投资，通过管理贸易和原料分配制优

待大资本，等等，都是国家保障垄断利润的措施。由此看来，作者认为，垄断资本向国家垄断资本过渡的根据是，凭借国家财政、金融和行政手段，克服垄断资本特别是它的核心重工业资本的危机，首先是克服经营危机。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系指国家通过保障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的机构，永久地支撑危机和“战争结束”引起的垄断经营危机局面的状态而言。

注　释：

1．看来作者认为，战前分析日本资本主义的成果系指：野吕荣太郎的《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山田盛太郎的《日本资本主义分析》和《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中的著作。关于这部《讲座》和日本资本主义问题的争论，参阅小林良正：《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回顾》白石书店1976年。

2．井上晴丸、宇佐美诚次郎：《危机中的日本资本主义结构》，第2页（该书以下简称《结构》）。

3．《结构》，第61—63页。

4．“……战争使各交战国遭受到闻所未闻的灾祸，但同时它又大大地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把垄断资本主义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致无论是无产阶级或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不能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资本主义范围之内了。

实际生活已经超出了这种范围，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调剂生产和分配，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强迫实行辛迪加化（联合成为大公司）等等。”（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跋”，写于1917年9月28日，《列宁全集》第13卷第408页）。

5．《结构》，第8页。

6．《结构》，第210页。

7．《结构》，第211—213页。

Ⅱ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资本积累

如上节所述，井上、宇佐美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作为三十年代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而产生的政治经济危机的产物。但是，他们不单单强调总危机这个对于资本积累来说属于外在的因素，而且大力强调“按照资本运动规律从内部把握[1]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那末，怎样“按照资本运动规律从内部把握”呢？上一节已经谈到，从第二次大战后的日本来看，无非是对于垄断的核心即重工业资本的经营危机这种资本运动，由同样地处于垄断资本支配下的国家予以积极的援助，从而促进了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加快了资本积累的速度。在井上、宇佐美看来，垄断企业的经营危机，是由大危机和战争结束之类经济危机作为直接的契机而发生的，但经营危机本身却是被更为长期的资本运动规律所规定的。这个规律就是“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现在，称转化为生产资料部分的资本为不变资本，称转化为劳动力的部分为可变资本，而由于采用作为资本积聚和集中动力的新技术和新机器导致工人数量相对的削减（减员），意味着对于可变资本部分来说不变资本部分的相对增大。如果把这种情况叫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趋势，那末，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过程就是有机构成提高的过程。假定一定量的可变资本产生的剩余价值量不变，随着可变资本量的相对减少剩余价值量也相对减少。因而一定量的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总和）产生的利润额也不断下降。以这个规律为依据，作者们提出：“假定剩余价值率不变，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平均利润率的趋向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于是闲置的生产资料有增无已，非生产性和奢侈性的设备日益充斥，货币资本的浪费不断增加，

生产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的比例一味下降”[2]。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使追加投资产生剩余价值日益困难，不再产生剩余价值的设备便闲置起来。而且，即使不生产物质财富，资本也要尽量拥向有利可图的产业、娱乐观光产业、流通部门和奢侈品产业。设备闲置增加了失业人口，第三产业人口增加了，战争又扩大了军队规模，因此生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势必下降。[3]

“这种情况的结果，比起生产规模扩大和总人员增加的比例来，剩余价值总额的增加却缓慢起来。在竞争过程中推进积聚、集中和决定垄断价格的垄断资本，能够通过这种积聚、集中和垄断价格，使剩余价值总额中归于自己的部分增大，从而自然地同上述缓慢趋势相对抗，但不能制止这一基本趋势的发展。”[4]

这样，作为资本内在趋势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就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也贯彻始终地作用于大企业的经营活动，促进大企业的经营危机，不断地引起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因此，那些支配大部分社会生产和流通的少数垄断资本家，同不断被剥夺财产和生活资料而贫困化的大多数居民之间的矛盾便日益扩大，从而“劳苦大众对垄断资本的谴责就更加强烈”。[5]

可以说，作为这种资本内在运动的结果而出现的阶级对立、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国际上资本间的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和世界分裂成“两种制度”，等等，这一切造成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危机。只就这一点来说，资本的内在逻辑通过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作用就会导致垄断经营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上述这些就是“总危机”的经济上的主要原因。这个经济上的主要原因又是形成政治危机的原因，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尖锐化[6]。把全部因果关系综合起来看，就是沿着下述步骤发展的：（1）作为资本内在逻辑的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2）资本价值增殖困难，设备、资本和劳动力的过剩；通过资本积聚、

集中和垄断组织的发展克服过剩现象；（3）通过垄断价格的制定等给予利润率下降规律以反作用；（4）固定资本更大规模的扩大和利润率更多下降的危险，垄断经营危机、大危机；（5）少数垄断资本与大多数居民之间矛盾的激化；（6）阶级对立、民族矛盾和垄断集团间竞争的尖锐化；（7）政治危机的加深。作者认为，这种因果关系的总结果，便是“垄断资本主义处理总危机问题时，为了直接对付政治方面的问题，最终就要走向法西斯主义，采取依靠国家政权进行镇压的政策；与此同时，还必须采取解决经济方面问题的对策”[7]。所以，只有“国家政权解决经济方面的问题”，才是使垄断资本主义必然转化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把上述主张进一步概括起来就是：

1，国家政权处理经济方面问题的背景，直接表现是阶级对立激化等政治危机；而政治危机的背后，又存在着为资本运动内在规律所决定的经济危机。

2，因此，不能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仅仅看作政治危机的产物，还应当重视它在处理在更深处进行的经济危机这一方面。

3，不过，大规模地处理经济危机形式上是以处理政治危机为直接开端的，基本事实是战争开始和战争结束。

“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国家政权”处理“经济方面”问题，意味着国家从质量上加强了“对国民经济的统制作用”[8]（同以前相比较）。作者认为，它的表现形式是：“过去国家的作用主要在流通方面，是局部的”，而现在则全面扩展，并且同历来的国家干预，诸如关税壁垒、补助金、给垄断企业特别贷款和中央银行的信用统制不同，发展到“国营企业、提供设备、提供资材和资金、粮食征购、配给制、劳动统制等形式”，就是说，“国家被垄断资本拖进生产部门内部来”[9]。这种观点认为，区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与其以前资本主义

国家干预的标志，是干预的重点由流通部门转变到生产部门。那末，国家干预为什么不能停留在流通部门而要扩大到生产部门呢？作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叙述不见得是很完整的，但按照书中前后的叙述进行综合判断时，可以归纳为下述几点。

第一，包括战争在内的危机的深刻程度说明，平均利润率的趋向下降和剩余价值总量增加的趋向缓慢两者范围之广为从前所未有，所以国家就必须直接干预劳资关系，统制工资，使作为劳动力价格的工资低于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借此推进资本积累[10]。国家扩大其对于垄断企业等经营活动的统制范围，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第二，在社会把生产的总剩余价值优先分配给垄断资本的问题上，确定垄断价格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垄断企业的经营危机，使凭借私人手段就难以维持垄断价格，所以就要靠国家力量搞订货制、财政资金分配、信贷统制、电力和资材分配、征购制、强迫实行卡特尔和选择贷款等等，这些都对于维持垄断价格具有重要的作用[11]。因此，国家政权对于社会剩余价值总量人为地进行再分配，是国家干预全面化的第二点根据。

第三，如果认为工资统制和国家保障垄断价格体制是“掠夺和侵吞”，那末，国家干预全面化的第三点根据，就是采用了导致扩大这种掠夺和侵吞的通货膨胀政策。通货膨胀导致实际工资下降和中小企业、农民和小食利者的没落；导致大公司的囤积、物价昂贵、资金集中和投机收益的扩大，等等。如C·图罗尼说的那样，通货膨胀就变成了强制性的储蓄和资本积累的手段[12]。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的扩大结合起来，常常同发行巨额公债有联系。但是，如果国家保障垄断价格使财政膨胀并成为通货膨胀的原因，那末，国家干预的全面化，其结果只能是通过更大规模的通货膨胀而实现的“掠夺和侵吞”。

第四，存在着为现代化战争的总体战性质所要求的“技术经济”[13]方面的原因，这一点作者只简单地指出了事实，并未强调。国家政权必须通过战争等以高级的技术装备起来。后边可以看到，这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技术开发和国营企业是从这个领域扩大起来的。对于国家干预生产部门来说，这是应当探讨的问题。作者的考察是以分析战后日本复兴过程为中心的，所以对于后来从与美国资本主义研究的联系上才特别提出的这个问题，不能说探讨得很充分，但已经指了出来，还是值得注意的。

上述井上和宇佐美的共同研究，以资本运动的内在逻辑为基础，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凭借国家权力保障垄断利润（特别是保障工资和物价）的机构，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进行了极其值得注意的理论概括工作。当然，如果指出存在的问题时，那就是他们在论述国家权力要与资本运动相适应时，把资本分析作为重点，而在根据经济学分析国家权力特别是分析官僚机构和赋税制度方面，则除了简单地指一指外，几乎没有讨论。他们似乎未把国家权力对于资本运动的适应当做经济分析的对象，反而作为政治动向确定其为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前提。这个缺点，不能不给分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历史地位留下若干问题。对此，我们将在下一节里进行考察。

注　释：

1．这个“从内部把握”的想法，可以说是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展开的一个基本特点。继承了《结构》基本内容的手岛正毅、户田慎太郎等，都是以实现这个方向为目的的。参阅手岛正毅：《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有斐阁1966年，户田慎太郎：《现代资本主义论》大月书店1976年。

2、3.《结构》，第10页。

4、5、6、7.《结构》，第12页。

8.《结构》，第13页。

9.《结构》，第13页。对于这个观点，大内力作了如下批判："这个所谓国家被拖进生产方面，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十足感觉似的规定，无论如何也不会有科学意义。从字义上看，国家被拖进生产方面只能是国家自己进行生产。然而，国家作为国营企业从事部分的生产，并不是这里直接讨论的问题；如果是指国家全面地掌握生产，那就已经不能叫做资本主义制度了"（大内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第88—89页）。

10.《结构》，第15页。

11.《结构》，第16页。

12. C·B·图罗尼：《通货膨胀经济》，M·E·塞耶斯译，1937年伦敦。井上、宇佐美指出其前言部分。

13.《结构》，第13页。

Ⅲ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

如果不但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运动的角度，而且还从向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社会过渡的角度把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则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问题了。也可以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展开，即从其作为资本主义运动这种狭义的经济学对象的理论，到其作为包括社会构成体的变化、发展和过渡等内容的广义的经济学对象的理论展开，将成为在这里必须讨论的问题。[1]

作者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本身构成资本主义历史中的最后阶段，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则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进一步划分为小阶段时最后的一个小阶段[2]。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垄断资本主

义是资本主义的终点站。这意味着：少数资本家的统治同大多数持改革社会愿望的居民之间的最激烈的对抗；而且还意味着：新社会的物质基础已经成熟，物质财富生产者和实际的脑力劳动者已经从资产阶级转移到工人阶级，随时都可能不要资产阶级而由工人阶级和居民经营管理社会了。作者认为，少数人与大多数人的矛盾和对立，在战争经济条件下，则只能使国家和垄断组织结成一体，“给工人（和一部分农民）造成**军事苦役营**，给资本家建立起**天堂**”①。如果大多数被压迫者紧密地团结起来，这时，作为社会主义的“入口”[3]，就已经拥有了新社会所需要的物质前提。作者认为，第二次大战后，反垄断的工人、农民、小市民和中小企业者等大多数居民的联合，作为社会变革指针的人民民主革命理论，为大多数被压迫者提供了团结的基础。作者还认为，第二次大战后在东欧和中国农业中残存的半封建社会势力，与外国垄断资本国际统治体制的结合，阻碍了人民中民主主义的成长。为此，以社会主义为目的的革命，首先必须着手进行联合大多数人民的人民民主革命，而且这种革命已经被纳粹和日本的国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制作了准备。

这样的人民民主的社会变革方式，同农田改革后的日本和西欧这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变革方式有哪些不同呢？当时作者是怎样考虑日本方式的呢？如果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边，那就剩下一个问题，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时，社会民主变革就能够以反垄断为中心而进行。这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方面创造了在反垄断方向下得以联合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条件；另一方面，也创造了当社会变革成功实现了大多数人统治时，

---

① 引自《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0页。——译者注

大多数人得以管理社会的物质条件。在作者看来，这样的物质条件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国有化部门，强迫实行卡特尔、国家和银行的混合，征购和配给机构，并把这种机构叫做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这个经济制度，同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小个体企业)以及独立小生产者经济制度（特别是农民）等密切地交错在一起，并作为最占优势的制度发挥着职能作用。而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垄断资本的经济据点，是大型经济的“高地”（管制高地），是一个“要塞”。

作者认为，人民民主革命一经“把这个高地、要塞”委之于“人民力量”，“它就成为人民剥夺和监督垄断资本的据点，就成为援助人民解放的堡垒”[4]，作者特别期望国有化部门发挥巨大的作用。

书中说：“以人民的力量实现的重要产业、银行等的完全国有化，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不同，它意味着过去国有化部门的国家资本在这里不再成其为资本，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出现。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出现，不仅使历来在垄断资本压力下凋零枯萎、被扼杀生机的小生产、农民经营的生产和中小企业得到复苏，并且给予它们以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机会”[5]。

那末，这个国家政权交替的实现是怎样的过程呢？

国家和垄断的结合，使一切为保卫民主和生活而进行的斗争，都在反垄断和变革社会的方向下结合起来。在这个论点(特别是工农联盟）的基础上，作者所强调的是下述两点：占据高地主要部分的冶金、机械、电力、铁道、通讯部门的工人把斗争的技术手段掌握在自己手中；因国家和国营企业的发展而使公务员①

① 日本的公务员指担任和执行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职务者，有国家公务员和地方公务员之分。——译者注

和见习公务员的增加，而财政危机又把他们的薪金降低到“工人水平或更低”[6]。

作者的结论是：当中小企业、农民和民族解放运动等在上述两个过程中汇合起来时，国家政权的交替就可以说是必然的。

注　释：

1. 这样，从双重角度，就是说一方面从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即资本积累和垄断组织的发展，另一方面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规律性，来把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把前者作为追求垄断利润，后者作为维持资本主义制度这两个因素予以规定的，是吉村达次的《现代资本主义和国家》（吉田义三编《现代资本主义研究》日本评论社1962年）。

2. 《结构》，第18—19页，第284页。

3. 《结构》，第284页。

4. 《结构》，第288页。

5. 《结构》，第288—289页。

6. 《结构》，第305页。

Ⅳ 小　结

那末，这种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考察方法，就是说，第一，从战时和战后统制经济的变化和发展方面，第二，从其作为由国家政权加速实现资本积累的过程上，第三，从对于垄断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展望角度进行考察，对于该书出版前的争论问题是怎样概括的？从后来争论的发展过程来看，该书的主张又有什么问题呢？它又在多大的程度上受到了当时日本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限制呢？

井上、宇佐美的论文开始连载时，国际上关于后面我们准备叙述的瓦尔加争论的介绍，也传到了日本；关于战后日本经济学

方法论争论问题之一的“生产力理论”的争论也正在进行；这就在他们的理论确立之前，提出了一种论点。岛恭彦概括了这个时期的争论问题，他认为井上、宇佐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第一，因为它引进了列宁根据俄国这个比西欧生产力低下的资本主义国家做出的理论概括，即战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以带有一种“战时色彩”和“临时色彩”。而分析第二次大战后战时统制解除以后还存在的发达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就有必要研究一种更新的方法。以后我们将要看到，齐香企图以西德投资问题固定化的事实为基础，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做出说明。岛恭彦认为，列宁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最高阶段过渡的理论；第二，它尤其是战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第三，它是以叫做“两个政权”那样的强大革命力量的存在为前提的过渡理论。[1]

第二，关于生产力理论的问题。日本战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列宁考察的俄国不同，是在“革命力量也完全被粉碎了”的情况下形成的；因此，它当然不能有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景。然而，岛恭彦认为，井上、宇佐美的理论，却一直存在着积极评价日本战时经济进步性的思想倾向，并“从这里产生了排除革命主体的‘生产力理论’”。前节叙述中出现的所谓“管制高地”，如果排除国家政权的变革和革命主体力量的成长，只是强调生产力的高度，就是所谓的生产力理论。岛恭彦认为，这种理论“忘记了，没有最重要的革命力量，‘管制高地’就会使全部社会经济受到战争的破坏，就会变成强迫全体国民进入战争体制苦难生活的据点。”[2]

尽管有这些问题，井上、宇佐美两人的《危机中的日本资本主义结构》一书的基本部分，还应当说是为研究第二次大战后国

家垄断资本主义奠定了最基本的基础。这是因为该书采取的方法，不单单从大危机和战争之类总危机的表现中探求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必然性，而且是以资本积累的内在规律为基础来说明经济危机，并从经济危机说明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以及少数人和大多数人对立的加深；然后说明政治危机，分析政治危机以国家权力为媒介给予经济过程以反作用的过程。以平均利润率下降为主干的这种论述，不仅对于理解战时的而且对于理解平时的资本积累规律，也是重要的方法论。而且该书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观点，把上述方法作为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互相促进的关系来把握，这就给后来的争论以巨大的影响。当然这种方法论，就是说一方面以资本积累与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为依据，另一方面以少数统治者和社会上大多数人之间对立的激化为媒介，来论述国家权力和经济过程相互关系的这种方法论，需要预先规定，国家理论本身作为理论考察的对象，是包容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之中的。但是，作者的论述却仅仅考察了公务员的增加趋势等问题，而对于国家本身却几乎没有从经济学角度或从理论上进行考察。这个缺点对后来的争论有很大影响。如下面谈到的那样，这个缺点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中的国家垄断这个概念，并未从发生史的角度进行探讨（探讨这个问题时，就要涉及专卖和赋税概念，这就必须研究“国家与财政的理论”同“资本积累理论”的联系）；虽然规定了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但对于社会分裂为生产者与国家行政需要的资材的增加之间的关系，却未充分展开讨论（看来这也是被当时日本社会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在六十年代农民阶层的分解中，地区生活共同体解体了，特别是为地方行政所需的新的行政资材的增长过

程，不如今天这样明显。索甫① 关于日本税收制度改革的建议只不过刚刚开始实行，日本的赋税制度和地方制度还处于考察时期，并不成熟）；在日本经济学研究领域中，从理论上阐明经济学中的国家问题也只是刚刚开始，尚未达到能够做出完备结论的程度，等等[3]。

总之，日本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的争论，在对井上、宇佐美理论的批判、继承和发展中，是出现了一定的争论和成果的。下面简单地说明一下这些论点。

注　释：

1. 岛恭彦：《现代国家与财政理论》三一书房1960年，第24页。

2. 同上，第26页。认为这种生产力理论的原型出自希法亭，见本书第二部分第3章。

3. 关于《结构》对于日本资本主义分析方法的贡献和问题，参阅古川哲：《关于宇佐美教授对日本资本主义分析的考察》（加藤睦夫、古川哲、良知力、鹫见友好编《现代资本主义与国家》有斐阁1976年，第368页）。大岛雄一在《把握战后改革的基本观点》（《历史评论》1977年2月号）一文中，肯定和发展了古川的观点，指出：井上、宇佐美评价战后改革时，是用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明战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战后改革的"连接性"的，从而为大内力和大石嘉一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大岛认为，山田盛太郎的观点是说，研究战后日本资本主义时，必须以战后的改革是与战前的中断为出发点的（参阅山口盛太郎：《农田改革的历史意义》，载东京大学经济学部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战后日本经济问题》有斐阁1949年）。

---

①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49年5月率"税制代表团"抵日，提出改革税制的建议，日本政府据以修改了税制。——译者注

第二章 “生产关系社会化”的争论

前 言

如果认为前述岛恭彦对《结构》的评论是有根据的话，那末如何对待《结构》的“战时色彩”、“临时色彩”，对于理解《结构》未解决的问题来说，就不得不成为最基本的论点。如果认为从发生史的角度来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战时经济的产物，而二次大战后战争体制仍在继续，重建武装成了世界性问题，经常性的军事支出的规模在维持或扩大，那末，“战时色彩”由战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某种形式继承下来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例如，以1950年朝鲜战争为契机，世界各国一致开始了重建武装，多次发生了“有限战争”和“局部战争”，这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日本甚至也出现了根据1950年以后的配备“防卫力量”，特别是美国的大规模国防预算水平，把依靠“经济军事化”获得垄断利润的问题当作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而加以表述的动向[1]。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关于理论问题的关心都趋向于，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中军需品生产部门占有一定的固定的比重时，再生产中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关系上出现什么样的特点这个问题[2]。假如购买军需品主要是靠国家征收的赋税，那末，就把赋税作为本来应该用于消费资料开支上的购买力转移给国家，并因而对扩大生产和消费的矛盾的东西，从理论上加以说明，从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军需生产

的扩大，扩大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导致生产力的浪费，激化了经济危机[3]。

但是，这种极端的结论，在朝鲜战争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力的急剧发展、固定资本的加速更新，景气的迅速恢复等现实面前，又需要作新的理论上的探讨了。毋宁说可以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比起“战时色彩”来，更多可以看到的是“平时生产的扩大”这个方面。当然，这个“平时生产的扩大”，一方面是伴随着世界性的重建武装的趋势进行的，也因为六十年代越南战争的正式扩大，所以这决非意味着单纯地恢复到平时的状态。然而，如果与军需生产的扩大相并行，还存在平时生产的扩大以及促使这种扩大的健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机构，理论研究工作就不能对上述情况置之不论，就不能不从整体上对具有“战时色彩”，但又“促进平时生产扩大的国家垄断主义”加以阐明了。

日本在研究战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同时，也研究了美国新政时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出现了研究并不仅仅具有“战时色彩”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动向[4]。但是毋宁说这种研究是从“资本主义的组织化”这个角度来进行的，真正的理论化的工作还是很落后的。

1957年K·齐香在东德《经济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文章，提出了轰动一时的观点，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国家政策是基本上不同的东西，是垄断资本如果企图利用现代的巨大生产力——这对于民间的固定资本投资也好，国家的军需生产也好，都是一样的——使其作为在资本主义下获得利润的手段，就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5]。构成这种主张现实基础的事实是，西德的投资活动利用赋税和国家金融机构向民间公司提供了巨额资金，使它们的生产力

发展了起来[6]。

这种趋势——由以赋税为基础的政府出资法人扩大投资和公共投资的趋势，已经是美国在三十年代以创办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为开端的新政时期就出现了的特点[7]。在日本也有复兴金融会社、日本开发银行、日本输出入银行、日本道路公团等许多公社、公库、公团①等作为政府出资法人而设立起来；它们正在成为表现“平时”经济中的国家与经济的关系的一个基本特点[8]。齐香提出的问题，可以认为是对这种“平时的设备投资、公共投资的扩大”在理论化方面提供了一个途径。

然而，就是在这种场合，也有必要对“战时色彩”浓厚的军需生产的方向（这也是区别于全面战争期间的军需生产），和这种政府出资法人的增大趋势，从它们的整体关系上进行研究，对两者作综合的探讨。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概念也有必要进行慎重的斟酌。

可是，当齐香理论被介绍到日本来，与日本的现实相对照时，首先出现的问题是，一方面有的人采取了一种片面性的方法，即不是对军需生产和投资活动双方进行理论上完整的探讨，反而是扩大了齐香理论的弱点，即缺乏对政权问题特殊性的探讨；另一方面，有的人尽力纠正这种“过头”的看法，这两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9]。这就是围绕“生产关系社会化”理论的争论的开始。

---

① 公社、公库、公团为政府出资企业。前者有专卖公社、电电公社和国铁，后者为经营大规模土建工程的住宅公团、道路公团等。公库为国营金融机构，主要业务为向企业贷款，如中小企业金融公库。——译者注

注　释：

1.把垄断利润问题理解为“最大限度利润规律”，通过同平均利润规律的对比而企图把现代资本主义的利润规律加以表述的是斯大林，他在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作了如下的论述：

“有人说，平均利润率的规律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这是不对的。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不能满足于平均利润，何况这种平均利润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高而有下降的趋势。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所要求的不是平均利润，而是比较正常地实现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最大限度的利润。”“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下卷第567—568页）。包括斯大林的这个观点在内，想要展开垄断利润理论的许多人都把分析的中心点指向平均利润规律的改变问题——利润率的向垄断和非垄断的阶层分化、平均原理和边际原理的关系等。然而，如下面将要谈到的，垄断阶段的利润不只是垄断价格的问题，凭借对于利润的确实估计，因股票和土地价格的上涨而产生的资本利益占了主要分量，因而使人们认识到仅仅注意平均利润规律的改变方面是片面的和错误的。

2.分析再生产公式和军事经济的关系的典型著作是守屋典郎：《军事经济和危机》青木书店1953年。

3.同上，第215—216页。

4.藤井洋：《新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科学研究》1952年)。宇野弘藏：《资本主义的组织化与民主》(《世界》1946年5月号)。

5.K·齐香：《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经济科学》杂志第四年度第5期1956年9—10月。

6.K·齐香：《西德投资基金的向题》，《经济科学》杂志第四年度第1期1956年1—2月第42页。

7.青木圭介：《新政时期政府金融机关的活动》（《经济论丛》第113卷第1期1974年1月）、《新政时期政府金融机关设立的背景》（《广岛女子大学文学部纪要》第9期1974年4月）。

8.柳濑孝三：《占领下日本财政的"合理化"过程和财政投资贷款——战后日本的财政投资贷款制度的形成过程（1）》（《经济论丛》第108卷第1期1971年7月）；《开银、输银、资金运用部制度的形成情况及其作用（2）》（《经济论丛》第108卷第2期1971年8月）。

9.日本当时关于现代资本主义争论的主要文献资料如下：

井汲卓一：《作为过渡时期的现代资本主义》（《现代马克思主义》第2卷，大月书店1958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序论，大月书店1958年、《战后的景气循环和资本主义》（《世界》1958年9月号）、《战后循环的问题点》（《贸易研究》第2期）、《循环和周期》（《贸易研究》第6期）、《作为生产关系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日本经济分析》第3卷，大月书店1959年）、《国家、垄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上、下（《思想》1960年2、3月号）。今井则义：《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规律》（《经济志林》第26卷第1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的两种思潮》（《现代理论》1959年5月号）。上田耕一郎：《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前卫》1959年8月号）。奥村茂次：《以〈现代资本主义论争〉为中心》（《经济评论》1958年（临时增刊号）。小椋广胜：《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现代资本主义研究》（《思想》1957年11月号）。海道胜稔：《关于齐香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经济评论》1960年7月号）。上林贞治郎：《股份公司·垄断组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营研究》第46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经济学杂志》1960年4、5月号）。北田芳治：《现代资本主义理论和〈意大利的道路〉》（《日本经济分析》第1卷）、《现代资本主义论争》（《思想》1959年1月号）。木原正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国民经济"计划化"》（《京大经济学部四十周年纪念经济学论文集》有斐阁1959年）。筱畸武：《现代资本主义理论和辩证法》，青木书店1959年。岛恭彦：《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现代财政》（《现代资本主义讲座》第3卷，东洋经济新报社

1958年）、《管理经济试论》（《京大经济学部四十周年纪念经济学论文集》）、《论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经济评论》1958年3月号）、《现代国家与财政理论》三一书房1960年。杉田正夫：《现代帝国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现代理论》1959年6月号）。丰崎稔：《战后工业周期与危机》（《现代资本主义讲座》第1卷）、《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评论》1958年3月号）、《论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必要性》（《京大经济学部四十周年纪念经济学论文集》）。丰田四郎：《"现代资本主义"论争》（《前卫》1958年1月号）。长洲一二编：《现代资本主义与马克思经济学》大月书店1957年、《现代马克思主义论》弘文堂1957年、《现代资本主义论的方法论》（《现代理论》1959年7月号）。名和统一：《怎样理解现代资本主义》（《世界》1957年12月号）、《现代资本主义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现代资本主义讲座》第1卷）、《再论"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经济评论》1958年临时增刊号）。福田丰：《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争》（《九大经济论究》1960年3月号）。古畑义和：《关于我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经济评论》1960年7月号）。向笠良一：《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分析的若干问题》（《思想》1959年1月号）。守屋典郎：《现代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前卫》1958年4月号）、《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日本经济分析》第2卷）、《战后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理论"》（《思想》1960年2月号）。山本二三丸：《论"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性质》（《经济评论》1958年11月号）。

此外，关于齐香的业绩，上田耕一郎说："第一点是，以前多数的情况总是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仅仅理解为上层建筑即国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就是说只是理解为一种政策性的东西。现在却把它作为经济基础的客观变化、再生产过程的客观变化来评价，把它作为一种资本主义内部的生产社会化过程的特定形态来把握。第二点是，以前总是仅仅从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殖民地制度的崩溃这种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制度的外部危机，或是仅仅从战争、革命和民主力量的发展等资本主义的内部危机，也就是说仅仅从'总危机'的角度来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现在则确立了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内部

来看产生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化的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的立场”（《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载《前卫》1959年8月号）。

另外，肯定上述评价的，还可参看加藤泰男：《现代资本主义分析的一点看法》（《经济评论》1960年8月号第72页）。

I　井汲卓一、今井则义对齐香的批判

一九六〇年二月，《思想》杂志发表了井汲卓一的《国家·垄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上、下。同年十一月合同出版社刊行了今井则义等著《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中收录了论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问题》。这两篇论文通过对齐香理论的批判研究提出了日本“生产关系社会化”争论中的一个主要论点。由于齐香拟以研究西德的投资问题为线索而实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的理论化，象前面我们已经考察过的，他探求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巨大生产力所需要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的更加社会化的形式。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当生产力水平还较低，靠小规模的资本仍能充分地获得利润时，靠独资公司进行资本积累是可能的。但是，一旦发展到需要巨大的生产设备和有关设施时，只靠个人可能支配的资本来创立公司就困难了，这样一来就要用发行股票的形式聚集多数人的资金，用比独资公司更为社会化的形式来使用资本以追求利润。在这种情况下，支配股份公司的归根到底仍是大股东，他们的私人所有权在支配着公司的事实并无改变。然而，由于比独资公司聚集了更多的社会资金，积聚了其他小所有者的货币并纳入于自己的支配之下，所以这种支配权就能凭借更大的资金实力支配更大的生产力以追求利润。

这时，股份公司虽然仍处在私有制的支配之下，但比起独资公司来，它发展到这种程度，可以以更加社会化的形式追求利润，

支配生产设备、劳动力等生产力的各种要素。齐香把这种状态看作“适应生产力新水平的新生产关系”。如果把从独资公司向股份公司发展的逻辑适用于现在的现实情况，即在垄断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资的本积聚和集中、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固定资本的增加、技术进步和军事技术导致的固定资本的迅速贬值和更新的必要，那末，“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资本规模就必然不断地扩大，从而使私人使用资本日益困难，而要求社会使用资本日益发展到高级的阶段”。他得出的结论是：“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同时要求促进掠夺和集中的所有制形式。这种促进是靠直接的破坏也好，靠虚拟资本也好，或是靠比如赋税政策、中央银行的政策之类国家措施也好，反正都是一样的”[1]。

但是，由于资本规模的扩大和危机等造成的资本价值破坏的规模很大，这时，股份公司受到国家赋税和国家中央银行贷款的救济。这种情况即使是事实，但把它直接看作更加社会化的生产关系的诞生并称之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看来这在逻辑上也有些超越阶段了。这是因为独资公司变成股份公司是资本所有制形式的改变，是私人营业活动形式的变化，但是赋税和国家贷款的进入，则是国家政权对经济的干预，是政治反作用于经济的过程，不能把它看作单单是营业活动形式的变化。于是齐香就一方面以独资公司——股份公司——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种形式，展望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更加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承认垄断通过使帝国主义国家从属于自己而干预再生产过程的事实[2]。作为生产关系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种规定，同国家从属于垄断或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这两个方面，在齐香的理论中，只是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两个侧面，未加整理地并行地叙述着。因此，对他所举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范畴一一加以推敲，就可以发现，有的可以称作生产关系，也有的如果不用国家政权特殊性的

道理就说不清楚。例如，国有企业等情况，只要是进行独立经营同赋税等并无关连地获取利润的话，就属于资本的营业活动的一种形式。然而，对于赋税和财政造成的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等，就不能直接把它视为资本的营业活动。它作为政治和经济、或者作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问题，首先就必须同独立的国营公司区别对待。这样，齐香的“作为生产关系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概念，只在国营公司那样的有限的范围内才适用，至于作为现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的以赋税和财政为媒介的各种问题，仍然只有靠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才可能进行研究。

井汲、今井两人抓住齐香理论的这种混乱，试图把“作为生产关系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逻辑首尾一贯地贯彻下来。而批判他们的人们则试图通过阐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规律性，把作为危机产物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逻辑贯彻始终，从中消除齐香理论中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双方各自都是企图继承齐香理论的一个侧面。

例如，井汲一方面对齐香所说的“作为生产关系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规定表示赞同，而把齐香“把国家引进生产过程”的表述仍然当作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对基础的反作用，其主张如下：

“……根本的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在于把国家引进生产过程这个说法的内容。

“齐香通过把国家引进生产过程这个‘词句’，把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巧妙地引进到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过程之中，但这只不过是一种玩弄词句的魔术而已。事实上，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仍然是上层建筑，不管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政策仍然是上层建筑的国家的一种职能。……如果是这样的话，所谓国家垄断资

本主义仍然不过是上层建筑的国家对经济——基础——的干预，不过是国家权力在经济方面的作用即政策所起的作用的增大而已”[3]。

在我们这样地确定问题之后，如若首尾一贯地贯彻作为生产关系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逻辑，就只有把国家本身当作生产关系来把握了，此外再无其他办法。国家必须是生产关系，而实际上却又是上层建筑。解决这个矛盾就不得不成为井汲(以及今井)理论所面临的课题。

今井则义也与井汲同样批判齐香说：

“……只能说他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和国家政策之间关系的论述是极为含混不清的。……他在论述战后西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是把问题主要地作为通过国家的立法、制度和政策等的经济活动来描绘的。看起来似乎是把‘生产关系的新形态’和‘经济本身的变化’这种作为基础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同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的政策即经济活动混淆在一起了”[4]。

那末，井汲、今井两人的所谓“作为生产关系的国家”又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注　释：

1. K·齐香：《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经济科学》杂志第四年度第5期9—10月，1956年第693—694页（载长洲一二编《现代资本主义和马克思经济学》，村田阳一译，大月书店1957年第25页）。

2. 同上，第697页（同上译书第257页）。

3. 井汲卓一：《国家·垄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思想》1969年2月号）第214—215页。

4. 今井则义编著：《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合同出版社，1969年第Ⅰ章第21页。

Ⅱ “作为生产关系的国家”的实际内容

把国家理解为生产关系时，就不能避开何谓生产关系这个问题。如前所述，齐香说：“作为生产关系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这个生产关系是指独资公司——股份公司——国营公司这样的资本的营业形态和经营方式的变化而言。进而言之，甚至可以说是指个别资本的企业形态而言。此处强调之点在于，资本所有制的形态开始拥有了从社会上许多人那里征集资金，从而适合支配更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和劳动力的那种形式。这时，变化的只是所有制的形式，而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等的所有者，在生产场所支配着被剥夺了这些资料的劳动者这种意义上的生产关系并没有什么变化。

于是，井汲、今井两人为了继承齐香的设想，把“作为生产关系的国家”加以理论化，就必须论证，国家本身作为资本所有制的形态，通过更大规模地动员社会资金，使社会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成为可能，并成为支配社会全部劳动力的东西。这种场合，资本就不能是个别资本（例如国营公司）而必须是总资本，资金的动员成了与全社会成员有关系的事，假如生产资料也成了全社会的东西，工人也就不能不变成整个工人阶级了。假如设想可以说是由总资本支配总劳动的东西的话，那就只会令人想象出由一个单一的托拉斯把所有的资金汇总在一起，由它支配社会的全部生产力，支配整个工人阶级的情景。然而，假想建立这样的单一托拉斯的根据是完全不存在的，只要垄断是建立在私有制和商品生产的一般基础之上，就不能否认社会由于个人利害冲突和竞争而在分裂这样的事实。井汲自己也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

展，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到了极限，所谓全面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乃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然而，这种全面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布哈林所说的单一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这只能是抽象的观念的产物，实际上是不能形成的”[1]。这样，所谓“作为生产关系的国家”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现实存在的是，反复进行激烈竞争的垄断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因个人利害冲突而出现的分裂。担任社会共同事务的警察、公共事业和文教事业等，很难反映整个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而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官僚机构独立地发展下去。官僚机构和垄断的这种关系，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基本问题，就成为一个必须不断进行研究探讨的问题了。

井汲、今井两人虽然说是继齐香提出的问题而阐明“作为生产关系的国家”问题的，但他们把垄断向单一托拉斯发展的方向予以理论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关于“作为生产关系的国家”问题的阐述，就转向论证同垄断阶段的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运动全然无关的问题，即论证在民族国家的确立中（在资本主义确立时期出现的国家），比起封建社会来，是一种能实现更高生产力的新生产关系这样的方向了[2]。在这里，两人实际上是与齐香断绝了关系。因为齐香所说的生产关系的社会性，意思是指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发展的所有制形式的展开，或个别资本的企业形态而言的。但是，井汲、今井两人所说的“作为生产关系的国家”是指与突破封建社会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言。前者说到底也不过是资本运动形态的变化，而后者则是国家本身定义的改变。乍一看，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这一点上，二者逻辑形式是相似的，一方研究的是，资本运动这种同质事物的形态变化；而另一方面则是研究封建社会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的变化。由于逻辑

形式的类似性，由于把完全不同质的问题当作同一类的事物加以研究，则“作为生产关系的国家”这个概念，结果就不能不比起历来所研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问题更加突出了国家论本身的问题了。

井汲把“作为生产关系的国家”的论证求之于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闭锁性（尤其是基于家族的）的打破和国内市场的形成，求之于以“一切生产者的社会联系”“结合成为一个整体”[3]。而且他又认为民族国家是这个生产者的社会联系的概括。那末，若问这个民族国家为何不是上层建筑而是生产关系呢？他认为那是因为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这种适应更高生产力的一种社会关系的概括或总体的缘故。井汲说：

“现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生产者是被结合在整体社会的单一的生产过程之中的。从而剥削者和直接生产者的关系也就不仅存在于作为各个企业中资本和劳动关系的孤立关系之中，而是作为互相联系的、不可分离的社会阶级关系的整体而实际存在于其中的。作为这种事物的‘概括’而自在地存在着的东西，我们认为就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国家’。资产阶级社会从经济结构来看，就是这样的，在民族的框框内作为一个阶级关系的整体而被概括起来的”[4]。

虽然使用了各种表述，“作为生产关系的国家”的核心，总起来说，就是由于分工和阶级关系使人们互相结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内部分工发展了，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也被社会分工的网所制约，这是任何人都承认的起码的基本事实。然而称此为生产关系，不是有些过于“飞跃”了么？因为社会内部分工作为私人生产者所进行的生产的一种基础，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更一般的说法是在生产关系之下）一向是作为生产力来对待的范畴，称此为生产关系，令人感到过于牵强了。

因而，井汲反复提出，作为生产关系的国家并不是社会内部分工本身，而是把以社会内部分工为基础的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所作的概括，从而尽力给人以由于是阶级关系的概括，所以就是生产关系的印象。然而由私有制和阶级关系执掌着社会内部分工的资本主义基本生产关系，却反映了社会内部分工自身已经不能把社会作为一个统一体维持下去的事实。众所周知，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因此，社会内部分工已经不再处于社会成员有意识的支配之下，生产的社会性质如果不是以货币这种物质的东西作为保证就无从表现了。这里，社会内部分工这种人和人的结合、统一，只有通过用货币进行交易这种私有制关系才有办法实现[5]。因为用货币进行交易需要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度量单位和货币名称，具有共同语言的民族也就需要民族自决[6]。所以，民族国家不能象井汲所说的那样直接反映生产的社会性质。构成民族国家基础的民族经济基础，不过表现了以货币为媒介的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表现了如不以私有制为媒介则社会关系就无从表现的事实。如果在一定的意义上把这种以货币为媒介的私人生产者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称之为生产关系也未尝不可。但这是同井汲把不以私有制和货币为媒介的社会内部分工的整体叫作生产关系是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而且所谓“以货币为媒介的私人生产者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关系亦即经济基础，所以不能称之为国家。换言之，社会分裂为私人生产者，社会成员互不统一，彼此疏远，他们的统一不通过货币这种物质就不能形成。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来看，不是社会统一的实现，而是社会的分裂，是社会向私人生产者分裂的实现。虽然如此，可是只要有货币，无论同什么人都可结成契约，在这个意义上，只要以私有制为媒介，则人与人的关系就以远比封建社会等更为社会化的规模扩大

起来。称此为“以社会内部分工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发展”还是适当的。只要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内部分工的发展，只会使私有者的营业活动更活跃，从而使社会向更深刻的对立关系方向分裂下去，而不会有对立的缓和，不会立即产生私人生产者相互间的协调和合作。

进一步说，私人生产者相互间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关系，使他们成为互相竞争的存在，或者说为了获取货币而一再地进行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为了在竞争中能生存下来，就必须进行旨在支配他人无偿劳动的生产的更大规模的社会化，引进机器、设备和大量雇用工人。社会不单单分裂成私人生产者，而且还创造了通过以私有制为媒介的工作场所和工厂内部协作和分工的扩大和科学的应用，大规模地造成了社会的分裂，分裂成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也通过资本家之间争夺货币的竞争，和以货币为媒介的劳资契约关系而被联系起来，因此“如果不通过私有制，则社会内部分工、社会生产力都不能获得进步和发展”的状态越来越普遍化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阶级关系由于社会内部分工而被赋予了一种统一的状态等等。因为不通过货币这种物质就不可能结成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能够加以论证的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是生存竞争激烈的严酷的社会，是被私有制和阶级所分裂了的社会而已[7]。实际上，这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的总体。给它赋予了一种统一状态的，不是井汲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只能由货币这种物质连接的疏远关系。

总而言之，对于井汲来说，以商品生产和货币的发展为一般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作为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的社会内部分工，这二者的区别是含混不清的。他认为社会内部分工不以货币为媒介就突然地结成了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而且不以货币

和语言为媒介，又突然地提出了国家“概括”社会内部分工和阶级关系这种规定。

假如，因为国家是具有以社会内部分工为媒介，在一定的空间内统一阶级关系的职能的机关，而这种职能是概括人与人在生产中的关系的，所以说国家是一种生产关系；那末，社会内部分工就被置于可以说是资本和劳动这种阶级关系的共同基础的位置上，这时，出现反映社会内部分工的要求及其发展水平的“国家”职能的扩大，就是理所当然的。这样一来，所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成了下述的样子了。“现在，与生产力的社会性质更加高度发展的同时，这个社会的生产在它的运动的一切地方——所有制形式、以及生产与价格的调节、乃至于金融、信用的经营等等——就都要要求概括社会生产的国家形式，从而国家的经济基础的因素就增多了。这乃是生产力的要求”[8]。

这段叙述表明了值得注意的如下见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用货币的所有权和国家政权（官僚机构）作媒介直接反映生产力的要求而造成进一步社会化的统一。如果国家不以货币所有权和官僚机构作媒介就能够直接反映生产力要求的话，那末由于使社会生产力进步这一点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国家当中找到超阶级的社会成员利益的一致点。资本家也好，工人阶级也好，对于去扩大反映他们的共同基础即生产力进步的国家的统一是会一致支持的。国家在作为特定阶级的机关而成为上层建筑之前，作为“生产关系”不得不具有不同阶级共同进行较量场所的性质。

如果不是井汲所说的“国家”，而是以货币所有权和官僚机构的存在为前提来谈生产力的进步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就一定表现为，伴随着货币所有权向少数大私有者集中、社会阶级对立的扩大和社会成员利益的分裂而增大的“社会共同事务向权力机构转化”的过程，因而导致社会阶级分裂的扩大。然而

井汲的逻辑，由于对货币所有权问题和官僚机构发展的规律性问题都未谈到而存在重大的缺点。在强调劳资双方的共同的生产力基础的情况下，就成为带有甚至有可能成为劳资调和主义的基础理论那样的逻辑结构[9]。阶级关系具有一种统一性这种说法，包含一个自相矛盾的判断。阶级这个概念，本来是以社会不能表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因私人利害而分裂和已被分开的事实为前提的。可是，如果说阶级关系存在一种统一状态，社会也能反映这种情况，并且作为一个具有统一性的东西而存在时，作为其当然的结果，就不能不预料到会出现阶级间利害关系的对抗性可以缓和，有调和余地，可以找到共同的利益等情况。所谓“作为生产关系的国家”，换言之，就是代表社会成员共同利益，实现社会成员共同生产力的国家，而不是已经不反映社会成员共同利益，非通过私有制就不能实现社会生产力进步的那个国家了[10]。

注　释：

1. 井汲卓一：《国家·垄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224页。

2. 同上，第216页。

3. 同上，第217页。

4. 同上，第219—220页。

5. “……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8—89页）。“摆脱不了以无政府状态的生产和交换为原则，用商品形式进行社会的物质新陈代谢这种形态规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古川哲：《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笔记》，《经济志林》第29卷第2期1961年5月，第38页）。

6. “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

系在一起的。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着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同时清除阻碍这种语言发展和阻碍把这种语言用文字固定下来的一切障碍。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统一和语言的无阻碍的发展，是保证贸易周转能够适应现代资本主义而真正自由广泛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地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最后，是使市场同一切大大小小的业主、卖主和买主密切联系起来的条件。”（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508页）

7.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和生存竞争的关系及其现代的意义，可参看池上惇：《现代资本主义财政理论——生存竞争组织化的财政支出》有斐阁1974年；《财政危机与人民自治——经济的民主与公务劳动》青木书店1976年第1章第3节。

8. 井汲所著前文，第222页。

9. 众所周知，产业合理化运动和提高生产率运动的基础在于提高生产率，以其成果分配给劳资双方而谋求共存这一点。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争论的经过看，这个体系是在希法亭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中得到了典型的反映。它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共同决定法为背景，把工会作为肩负贯彻生产政策的组织参加经营，参加国家的决策的过程予以理论化了。（R·希法亭：《时代问题》，《社会》杂志第1卷1924年；《社会民主党在共和国中的任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基尔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5月；《战争、裁军及国民军制度》、《关于裁军问题的三本文集》、《社会》杂志第1卷1926年。

10. “井汲理论认为，即便没有战争和危机，生产力的发展也不停地要求着的生产的社会形态和国家形态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作为不变的基本的方向’而存在着的，它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今后还要越来越广泛地而且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发展下去。但是，离开战争、经济危机这些生产力发展所产生的矛盾和危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果真能独自地发展起来么？”（吉村正晴：《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点考察——以国有

化问题为对象》，《思想》1960年10月号第52页）。

Ⅲ“公的职能”与官僚机构

关于作为表现生产关系的统一或有机的一体性的国家同社会分裂成阶级两者的关系，井汲在另外一篇短文中，作了如下的表述：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与人在生产中的关系上产生了对抗性的利害关系对立，在生产关系中产生了对抗性，社会分裂成利害互相对立的阶级关系之后，社会之作为社会的统一性、不可分性仍在保持着；生产关系虽然包含着这样利害关系的对立，但依然构成一个不可分的统一体和不可分的独立单位，是没有变化的。”[1]

社会分裂成阶级以后的社会统一性这种表述，似乎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社会分裂成阶级，但尽管如此，在某种意义上社会成员又形成了民族、地区、国家等的统一单位，这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井汲在与岛恭彦的争论中说：“只是如果说同岛先生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我更多考虑的是：国家不单单是停止在作为为整个阶级统治服务的‘公共机关’上，而是执行为全社会服务的公共职能的机关。依我看来，正因为国家具有这样的职能，才给予了统治阶级以全面统治这个社会的能力。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这种公共职能归于统治阶级之手，就是国家产生的由来”[2]。由于前面所考察的作为生产关系的国家的逻辑是，直接反映社会内部分工和生产力的进步，作为阶级关系的共同基础而存在着生产的社会化及其统一。那末，如果把国家的公的职能摆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结论呢？

井汲所说的国家的公的职能或公共职能，当然是说的国家代表全社会的利益，或是采取依靠生产力的发展为全社会带来利益的措施等的职能。他特别强调“社会的共同性”，指出：“所谓生产关系的一个单位是构成一个独立社会的基本结构，就是意味着这个生产关系是具有一种统一性的构成物。这个统一性才是把生产关系中的全体成员联系在一种生产关系里的纽带，是社会的共同意识——这正是该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实在的基础”[3]。

这里，很明显是说“生产关系的统一”即井汲所谓的国家，乃是社会的共同意识的基础。此处所谓共同意识，据井汲说，就是公的意识形态的根据，就是说即使社会分裂成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都是一样，如不通过公的意识形态，把自己当作社会利益、共同体利益的代表者，就不能进行统治，就不能支配居民。我认为阶级利害对立的当然结果，是要使这里所说的共同利益不复存在的。而据井汲的说法则是“这种分裂的意识形态，是各自在各该阶级立场上的关于社会的共同意识即社会意识形态，可以说不外是对于在该社会中自己——自己的阶级——的地位的‘自我认识’。仅仅只不过是在这一点上的对立和分裂，是坚持以同一的社会作为共同的东西为前提的”[4]。

“……在既有的生产关系下，对立的社会集团间产生了对该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与之相区别的特殊利益之间的分裂。对立的社会集团作为生活在同一生产关系下的人们虽然以在此限度内的共同利益互相结合起来，可是同时又被置于难以相容的、严峻对立的现实利益关系之上。这就是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分裂”[5]。然而，一个阶级把自己作为社会利益代表者强加给人民的过程，使“基于这个生产关系的同一性产生的共同利益”表现为“幻想的作为国家的共同社会性”[6]。据井汲的看法，“各自阶级的特殊利益，是在国家这种幻想的共同社会的名义下被认可的”[7]。

这里所谓国家的公共职能，在井汲来说，就是以反映生产力进步和社会内部分工发展的生产关系的统一性为基础，在把这种情况以存在社会共同利益的形式加以确认之后，社会分裂成阶级，追求阶级利益的阶级，就以保卫社会的共同利益这种意识形态建立起一个社会制度，从而扩大国家的公的职能，于是便用公的职能的扩大使群众对作为幻想的共同体的国家获得印象，靠这样的办法才能贯彻阶级的统治。

因此，所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是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内部分工的扩大，资本（垄断）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立被调解，作为一个统一的生产关系大规模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由于国家公的职能的实际基础显著扩大，使公的职能也达到了最高发展的阶段。因此，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就围绕着谁能更多地代表生产社会化的成果，这种成果能否还原为社会的共同利益问题，展开了“领导权的争夺”[8]。把这种抽象的在逻辑上的表述，具体运用于分析现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生产关系的统一”的含义，和作为它的反映的国家的公的职能的扩大，将会成为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井汲的主张因其文章不同重点也有所变化，但基本上是如下四点：

（1） 国家投资的扩大，特别是国有化，研究开发的投资、对民间企业的投资贷款。

（2） 财政和国家市场的扩大，支持军需品市场和农产品价格制度。

（3） 对大企业的特别免税及其他措施。

（4） 以管理通货制度为基础的信用、金融制度的发展[9]。

这四点内容反映了生产关系社会化或作为生产关系统一性规模的扩大的国家公的职能的扩大。既然垄断是通过支配这种公的

职能进行积累和再生产的，那末，井汲发现，凭借这些制度，工人阶级提出建立更加社会化的制度，并通过参加管理和扩大民主权利获得领导权，而向担负社会共同利益的方向开展运动的重大意义，这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应当说，井汲的理论作为所谓“日本结构改革论”的理论基础而被援用，其根据就在这里。

“社会的共同性”随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大，通过国家而进行的阶级统治，只要是不执行反映这种“社会的共同性”的公的职能，就是不可能的。井汲的这种立论的当然的结果，是预想了下述结论的，即国家的决策是关于社会共同利益的多元的要求的反映，对于这些社会阶层的多元的要求，任何阶级统治都不能忽视，而且也不得不反映在他们的现实政策中[10]。并且，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进步也会增进社会的共同利益这个结论，又假定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共同事务或者说使社会成为统一体的事务，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扩大下去”[11]。

但是，对井汲理论进行批判研究的人们则主张，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进步，首先，不是直接地创造社会的共同利益，而是造成货币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存在使肩负社会共同利益的团体和家庭解体，由商品货币关系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的趋势。其动力在于，私人生产扩大了在工厂中的权力，指挥全社会的生产，使有组织的社会权力（共同体）解体[12]。批判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性的发展，是以作为商品生产社会性的异化形态的货币权力和提高货币的普遍的支配力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现代资本主义的货币权力的提高，只会加强金融资本的支配力量。而成为提高商品生产中的生产社会性的杠杆的，则是工厂中私人权力的确立。在这些情况下，对于批判者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生产社会化，一方面意味着由于货币权力的发展而造成社会内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工厂内

生产的组织性、机器体系、协作和分工的发展。因此，由于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私人权力的发展，使社会解体，社会权力和社会共同事务已经不再反映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了。即如同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指出的："甚至下面一点也可订为普遍的规则：社会内部的分工愈不受权力的支配，作坊内部的分工就愈发展，愈会从属于一人的权力。因此，在分工方面，作坊里的权力和社会上的权力互成反比的"[13]。

因而，要想对井汲的国家即生产关系说进行更彻底的研究，就必须进一步地深入阐明，反映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共同体这个范畴同国家这个范畴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这个课题已由战后日本的地区、自治体问题的研究者们进行了实证的和理论的阐明。因为在这项研究分析中，对地区共同体、家庭的动向同由大资本与官僚机构所进行的地区开发的联系问题，以最明确的形式进行了实证的把握；与此同时，还通过自治体的民主化问题、革新自治体的诞生，把"从社会异化出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官僚机构"转变为"为居民自治办事的公务劳动机构"这个课题，与社会改革问题联系起来，作为问题提了出来[14]。

本来，从学说史上看，货币理论和官僚机构论两者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的致命弱点。何以言之，因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大多主张金融资本一遇到大危机和战争时，由于社会危机的关系，金融资本组织化的限度就暴露出来，限制资本主义的私有本质的资本主义的组织性就自然而然地被加强起来。可是这种同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相对立的组织化的进展，如不否认资本主义制度下货币权力的普遍性，不否认官僚机构受货币的权力和"工厂权力"所支配的事实，就无法加以论证。井汲强调社会的统一性时，忘记了生产的社会化增大了货币的权力这个基本事实，同时他也忘记了资本主义社会货币的权力是因工厂内生产的

组织性而加强的。还有，人们不能不问：货币和工厂的权力是怎样使由共同体和家庭所承担的社会的共同事务起了变化的？这时，关于官僚机构形成的基础理论就提到日程上了。当然，现代的官僚机构是以用征税和货币雇用公务员，在行政领域“移植”工厂制度为其基本特征的。共同体和家庭自发地提供劳动，和以此来承担社会的共同事务的情况，将随货币和工厂权力的扩大而变得不可能了。这是因为一切事务不支出货币就办不了，不配备领取报酬的专业人员也不行。例如，一旦工厂办起来了，住宅增加了，靠作为共同体公共事务的用河流或水井来供应用水，已经难于维持生活之用了。这就需要建设工业用水管道、农业灌溉渠道、生活用水管道等。这些就与地方自治体和建设省① 的行政事务有关了，于是这些机关的官僚机构的发展，与水有关的专业的行政职员的配备和增员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样就导致了农村“用水共同体”的解体（即以水利权共同所有为基础的生活共同体的解体），和水利行政事务、与水有关的官僚机构的扩大[15]。可以说，由私人利害关系和工厂制度造成的共同体的解体，使历来是共同体共同事务的水的管理工作转化为官僚机构的事务。与此同时，过去靠共同体的自发劳动维持的公共事务，也需要用“现金”和通过公共权力机关进行征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积累的进行，就这样地把作为社会的共同事务保留下来的东西转化为官僚机构的事务。从这一点看来很明显，井汲的国家理论，完全忽略了关于社会成员由于私人利害而分裂，和基于这一事实而形成官僚机构这一方面的道理。在战后日本有关水的行政事务中所出现的这种典型形态，其规律性不仅几乎在其他一切行政领域中可以看到，实际上就资本主义国家本身的理

① 日本的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译者注

论研究来说，也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16]。

市民革命根据资产阶级原理改革专制主义国家的官僚机构时，专制君主所有的广大土地，以及随带的农业、工商业（官营工业、专卖公司等）方面的生产指挥职能，由于土地改革、封建行会的废除，私人生产者营业自由权获得法律承认等而解体了[17]。随之而来的是商品和货币的权力一旦打破地区共同体的界限而统一国内市场，语言统一一经形成民族自治，历来作为共同体和教会的一种职能的保护生命财产的职能，便集中于靠纳税维持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官僚机构，而成了专业官吏，靠薪金生活的官吏的职能。然而这种职能已不能象共同体那样反映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18]。因为社会成员由于私人利害不同而分裂，承认这种对立的利害关系，资本主义官僚机构便作为法律承认的东西形成了。民族自治中的商品生产者的自治制度，在保护私有财产的前提下，变成一个拒绝对营业权进行干预的社会。可是，商品生产者的自治制度产生了贫者和富者时，私有财产的保护很容易变成对于“富者自由统治贫者”的保护，国家势必变成只是反映富者阶级利益的存在[18]。对于没有商品和财产的人来说，“自治”不得不成为徒有其名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本应反映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共同体的警察职能，随着社会成员分裂成私有生产者而成为由居于社会之上的机关来执行。只要贯彻保护私有财产的原则，这种职能就会与富有阶级利益相一致。共同体失掉了指挥生产的权力。愈是容许商品生产和货币的权力，共同体的共同事务也就愈是远离开社会的共同利益而居于社会之上。这样，富者与贫者之间的对立，无论在国内或是在国家之间愈是激烈，则官僚机构就愈是要扩大，从社会中产生又居于社会之上的机关庞大起来，把居民按地区加以分割而进行统治，为了维持这些机关的存在，就要建立征税机构，雇用官吏，征收税款[20]。

井汲若是把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加以对比，从而说明商品生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生产社会化的发展，那末，就国家理论来说，首先应该注意的问题，实际上乃是关于因私人利益不同而产生的社会分裂同资本主义官僚机构的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律性。然而井汲忽视了这个方向的考察，把生产社会化的进展理解为劳资关系的一种统一，漏掉了在官僚机构下富者和贫者对立的扩大或者说是固定化的问题。他在应该看到对立的地方却看到了统一。

并且，产业革命的进行带来了地区共同体和家庭的彻底的解体，同时，激化了机器同工人的竞争，出现了女工和童工，以至延长劳动时间威胁工人本身的生命。于是，正象在英国可以比较典型地看到的那样，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就不得不制订工厂法而由官僚机构（内务部）任命视察员，限制劳动时间，使义务教育、保险制度、公共卫生等行政措施经常化，并扩大地方自治机构，应付新的行政部门所需物资的增加[21]。这里也同前述的官僚机构一样，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育儿、教育、卫生等项工作，与工厂制度使共同体和家庭解体的同时，被转化为构成官僚机构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专业的官吏、教师、医生来负责。不仅国防，而且在警察、教育、医疗、公共土木建筑事业、司法等一切领域产生出来的这些官僚机构，由于私人利益对立造成的社会分裂和由于工厂制度造成的阶级对立的促进而日益发展。

然而，资本主义官僚机构的发展，它本身却包含着一种自相矛盾的因素。那是因为，一方面如不采取民族自治和地方自治这种形式，就不可能保护私有财产；另一方面雇用专业官吏的数量增加并且扩及人民生活的一切领域，又带来了专业人员（特别是教师、医生）和大量的“从居民中补充的公务人员的增加”[22]。

在共同体中担负社会共同事务的人们，常常是“具有能够专

心从事共同事务的充裕时间的富裕的人物”。而且这种共同事务如指挥生产、土木建筑、文化、宗教等，具有一般居民文化水平的人是不能胜任的。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同了。在官僚机构工作的人们，其中大多数人是领取薪金的职员。在多数情况下其薪金水平、工作条件都是与工人相同的。又由于劳动时间的缩短和教育、医疗制度的普及，就出现了具有一定文化教育水平的居民，从这些居民中补充的公务人员就占了多数。一切居民都具有能够参加行政工作和政治活动的文化水平，形成了以这样的文化水平就足能胜任的公务内容[23]，从居民中补充的公务人员占多数，而且由于实行民族自治和地方自治的制度，居民获得受政治训练和教育的机会时，就必将出现资本主义的官僚机构不断面临被提出“民主化”要求的局面，这是居民自治和公务劳动者团结起来的结果。

并且，应当把这两种情况区别开来，即一种是直接担负保护私有财产职能的官僚机构——军队、公安警察等；另一种是，从工厂法可以典型地看得到的那样的，限制资本的营业自由权、缓和资本压迫、给居民以发展余地的公务。就是在推行官僚机构的民主化时，当然应该缩小前者，扩大后者[24]。只有在此前提下，才能够谈论民主改革和领导权等问题，抽掉这些内容的“国家论”、“改革论”，就不能不是非常抽象的、非现实的东西[25]。

井汲的这本著作，后面重点转到世界经济中的国际机构问题、向国际发展的生产力和支持这种生产力的超国家的结构问题方面。从逻辑结构上看，这可以认为是他的国家即生产关系学说的一种应用，因此从略。

注　释：

1. 井汲卓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现代意识形态》第4卷1962年10月三一书房出版，并载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现代的理论

社1971年）第32页。另外，评论井汲的公的职能论的文章有小野义彦的《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和阶级性》（《思想》1964年6月号）。

2. 井汲：《国家·垄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思想》1960年3月号）第362页。

3. 井汲：《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第35页。

4、5、6、7. 同上，第36页。

8. 井汲：《国家·垄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第363页。

9. 同上，第366—367页。

10. 政府不是只反映特定阶级的利益，而是反映社会各阶层的整体利益的，这种主张是希法亭1927年在基尔大会的报告中提出的（R·希法亭《社会民主党在共和国中的任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基尔代表大会上》）。

11. 指出井汲的这个说法是与德国财政学的有机国家观和国家生产力说相类似的，可参阅池上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有斐阁1965年版第1章。

12. 最早从这个角度进行批判的见池上惇：《垄断的支配和国家成分的增加》（宇高基辅、岛恭彦、宇佐美诚次郎编《马克思经济学讲座》第3卷有斐阁1963年）第44—45页。

13.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66页）。

14. 芝田进午编：《公务劳动》，自治体研究社1970年。对此书的批评可参看池上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中的国家》一文（加滕睦夫、古川哲、良知力、鹫见友好编《现代资本主义和国家》有斐阁1967年）第33页及以下各页。

15. 板桥郁夫：《水利资源问题和水利法》（《法学家》1972年9月号）。仁连孝昭：《美国水利资源开发思想的体系》（自治体问题研究所《地区和自治体》第5集自治体研究社1976年）。

16. 参阅池上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地方自治》（自治体研究社刊，前书所载论文）。

17. “王室领地一变为个人财产，不到几年，即会好好地改良，好好地耕植。生产物由此增加了，人口亦必随着增加，因为人民的收入和消费必因此增大”（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1974年商务版第383页）。

18. “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随着社会成员由于原始公社的瓦解而变为私人生产者，因而和社会公共职能的执行者更加疏远，这种权力加强了。”（恩格斯：《反杜林论》，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2页）。

19. 岛恭彦、池上惇：《马克思的国家和经济》，（《经济论丛》第102卷第5期1968年11月）。

20. “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168页）。

21. 参阅池上惇：《财政危机与居民自治》，青木书店1976年第1章第3节。

22. 岛恭彦：《财政学概论》岩波书店1963年第26页。

23. “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绝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填表、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行使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工人的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残余铲除干净。”（列宁：《国家与革命》中文版《列宁选集》第3卷第207—208页）。

24. 缩减军队等而扩大居民福利的这种设想，托马斯·潘恩就已经有了。可参照池上惇：《现代福利与经济民主》（向井喜典、池上惇、咸

濑龙夫编《现代福利经济论》青木书店1977年)第279页及以下各页。

25. 不破哲三说："虽然在词句上，都同样地谈国有化和人民对垄断的统制等民主改革问题，但其意义和性质却是完全不同的"。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把民主改革问题摆在破除垄断组织的统治和整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的前景之中来看待的"。为此，他提出如下三点：第一、民主改革加强了限制垄断统治的统一战线；第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取得民主改革各项要求的实现是可能的，"这对于向革命前进是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但是"在革命胜利之前，不能通过它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也不能把它看作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向社会主义演变的开始"；第三、"对垄断组织的基干部分实行人民统制和国有化等彻底的民主改革，只有在建立起人民政权或至少是建立起强有力的统一战线政府的政治条件下，才能保证其实现"。不破认为，井汲、今井的理论却与此相反，"把'民主改革'降低到对垄断政权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部分的改良或资本主义统治下的生产关系的'部分的改革'的水平。而且由于以此为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或'演变的积极形式'，实际上，他们已经站到在资本主义下能够开始向社会主义演变这种立场上了，而把真正的革命和争取人民政权的斗争推向无限的远方"（不破哲三：《国家垄断主义的修正主义（上）——井汲、今井理论批判》，《前卫》1963年3月号第40——41页）。

Ⅳ 批判"生产关系社会化"论的各种谱系

通过引用恩格斯、列宁的话，抽出资本主义下经济制度的一些变化，特别是抽出独资公司——股份公司——国营公司这种适应生产力社会化的、对于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生产力的社会性予以部分承认的事实，举出它本身只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次要因素，并根据无论国有或是国家政权对经济的反作用，都是与

国家有关的表面上的事实，强行把国家本身看作是实现生产力的东西，并代之以生产关系这个术语。以上就是“生产关系社会化”论的一个特点。

对于这种强行把国家本身与生产关系等同起来的主张，手岛正毅展开了有力的批判，他说，国营公司、国家资本是“构成社会总资本的个别资本的一部分，因而是属于经济基础的”，并反驳说：“今井认为国有企业即国家机关，这种见解，难道不是对国家的一种夸大其词的解释吗？”[1]

还有，井汲、今井两人在把国营公司与国家等同起来之后说国家是生产关系，并把与马克思《资本论》不同的“计划”①作为可靠的根据。

今井说：“马克思认为，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概括’，是‘派生的’，非‘原生的’，这正是说它是一个生产关系”[2]，并且主张马克思是把税、公的信用……等当作第二级的、第三级的生产关系来把握的。

对此，手岛依据文献作了具体的反驳。他按照《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的叙述，说马克思在“计划”中的“分篇”处，讲了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而作为“注意”事项才讲了第二级、第三级等等的话，分篇和注意事项之间并无直接的关系[3]。

还有大内力指出，第一、个别资本→股份资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种图式的“资本概念的扩展”，国家也有时作为资本发挥其职能（国有企业等），但是另外的职能即征收赋税的职能却是很大的；第二、今井的说法是，作为国家的“两重性”把国家

---

① 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的计划。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1页。——译者注

分为政治国家和经济国家。这个“两重性说”，是由两方面构成的，一是“把政治国家降低为‘暴力机构’，二是把‘经济国家’抽象化为剥削、调节生产之类的经济职能”[4]。

此外，岛恭彦和池上则主张，作为国家政权经济基础的是赋税、财政，在此基础上的官僚机构和官僚机构的技术水平，以及作为官僚机构的支柱的公务劳动和居民之间的关系，这些都应放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研究领域之中[5]。宫本宪一和远藤湘吉通过对财政投资贷款和公共投资的分析，举出不仅仅是国营公司，还有公社、公团、公库等政府出资法人，特别是财政资金向生产基础方面集中投放的问题，从而实际证明了赋税不单用于支出而且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用于投资[6]。

这样的研究方向，其当然的归结必然是，提出作为“经济制度”以及作为个别资本的国营公司，同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这样尖锐的问题。尤其是不得不向阐明赋税、公债或是基于赤字公债而产生的通货膨胀，同政府企业的活动之间的关系这个方向的发展。

这样的话，不单单是仅仅提出了资本积累和国营公司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也阐明了这样一些问题：即使是国营公司，但作为政府出资法人，其活动领域也发生了变化（基干重工业、化学工业由民间分担；国家经济基础部门[7]、产业基础、生活基础、“社会资本”由公私合营企业、政府出资法人分担）；政府出资法人经营的慢性赤字状态和必须由赋税、公共费用、赤字公债加以补偿；慢性通货膨胀的进行等等。

再有，坚持这样的研究方向，使下述一些问题也开始得到了系统的说明：资本积累单靠民间的科学技术的开发是困难的，在国家政权内部设置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前提的科学技术开发部门[8]，这些部门与民间共同投资；在对付政治危机和“冷战”当中去扩

大研究开发部门；以即将应付危机的姿态，使财政膨胀，诉诸重税和通货膨胀；而且由于通货膨胀，国家就干预劳资间的契约关系以减低实际工资，一方面促进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对付工人运动以及其他社会危机，等等。

上述批判，可以看到“危机”说把“经济制度”论的意义和局限予以明确化並逐渐形成定论。引人瞩目的是，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对美国、日本资本主义的分析，基于日本社会实际的理论的形成。看来这种趋势今后将会继续下去。

在评价对井汲、今井理论的这些批判时，不能忽视当时意大利的国家论（特别是陶里亚蒂）对日本的影响。1956年6月24日陶里亚蒂在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就历来关于列宁国家论的解释，即通常所说的向社会主义过渡时要打碎国家机器的问题发言说，这种观点必须加以“若干”的订正[9]。这个发言和与此相关联的贾拉塔那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国家论与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0]，迅速介绍到日本来，围绕它的意义问题，特别是在名和统一和北田芳治两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名和说：意大利的这个观点是对国家论本身的修正，是说国家不是特定阶级的工具。他同时认为“必须把国家当作敌对的两个阶级的力量平衡的场所，当作是维持公共秩序的机关来把握”，并且主张用“国家政权的双重职能”[11]加以表述。

对此，北田芳治则指出：陶里亚蒂、贾拉塔那同名和所解释的，即认为与阶级国家存在超阶级性无关。“他只是想要限定工人阶级不去粉碎而可以利用的国家机器或国家职能的范围。在他看来，国家如果只是为了进行压迫的国家的话，就不会发生利用的问题。可是实际上还可能具有在与压迫职能相区别的意义上的公共职能。这是不能粉碎的，必须积极地利用。而且这是（陶里亚蒂也这样说）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12]。如果说前述井汲的

国家论有给名和的观点提供根据的内容，那末，不言而喻，对它进行批判的人们所作的评论，基本上未超过北田所指出的这个范围。陶里亚蒂所说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改良或者改良和革命关系的古典命题的再确认。工厂法、劳动法、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的发展无疑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改良。然而这种改良，说明国家不单单是阶级压迫的机关，其中含有对资本家的压迫进行社会的限制，和由于公的性质而限制私人营利的因素[13]。尽管制定这样的法律和制度，如前所述，只要货币的权力和官僚机构还存在，阶级国家的本质就是不变的。但是，比如根据工厂法任命的工厂视察员，他们反抗官僚机构和货币的权力，保护居民的生命，迫使厂方严格遵守劳动时间，使教育和医疗制度民主化，从而出现保障居民的发展那样的政治气氛的话，那末，使作为国家政权一部分的劳务行政实现一定程度的民主化，並为人民利益所利用还是可能的。马克思在工厂法和教育问题上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期待着，即使国家的本质不改变，依靠民主改良给工人以发展的机会和余地，从而出现超越资本家阶级的道德的能量[14]。当然，货币的权力和官僚机构是要使工厂视察员顺从自己的权威，从与人民对立的立场上调动使用科学技术成果的。因此，视察员将会一方面受到官僚的法令和形式主义的约束，另一方面进行保障居民发展的工作。因而可以说，所谓国家政权职能的两重性就是指这样的内容而言吧。

如果承认这样的“两重性”，那末在社会变动时期，在从一个社会向另一个社会过渡的时期，就会容易地设想这时的国家不是由单一阶级掌权的国家，而是社会上多数的阶级、阶层一致对垄断的权力进行民主限制的国家。陶里亚蒂就设想了城乡中产阶级（包括中小资本家）参加政权同工人阶级统一起来进行联合执政[15]。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意共和法共两党展开争论的同

时，关于中间阶级、中产阶级的研究也很活跃[16]。所谓限制国家政权一切方面的压迫职能，扩大公共的职能，按我前述的说法来看，就是限制货币的权力，使官僚机构民主化的过程。北田通过揭示“意大利道路”的真相，对称作意大利道路而为日本式结构改革论建立基础的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当时的争论中，作为从正面论述国家理论的为数不多的著作，对其意义应给以高度的评价[17]。

注　释：

1.手岛正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经济评论》1962年11月号）第97页。

2.今井则义：《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25—26页。

3.手岛所著前文，第69页。

4.大内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第105页。

5.岛恭彦：《现代国家与财政理论》三一书房1960年第3章、《财政学概论》岩波书店1963年第2章。池上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有斐阁1965年、《现代资本主义财政论》有斐阁1974年。

6.远藤湘吉：《国家的经济任务》（岩波讲座《现代》第5卷《资本主义的改造》1963年）。宫本宪一（与岛恭彦合著）：《财政投资贷款的机构》（铃木武雄等编《金融财政讲座》第3卷有斐阁1961年）第11页及以下各页。

7.参照平实：《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研究》，弥涅耳瓦书房1972年第6章“国家经济基础部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

8.南克巳：《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的阶段——战后‘冷战体制’的性质》（《土地制度史学》第47期1970年4月）。

9.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形势的根本变化与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世界政治资料》第2、3期）。大谷明夫：《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与结构改革》（《经济评论》1961年3月号）。卢齐亚诺·格鲁皮：《葛

兰西的遗产》（《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59年12月号）。

10. 瓦连蒂诺·贾拉塔那：《马克思主义国家论和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石堂清伦编《现代革命的展望》合同出版社1957年）。

11. 名和统一：《如何认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1957年12月号）。关于名和论文的争论，参看岛恭彦：《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经济评论》1958年3月号）。

12. 北田芳治：《现代资本主义论与'意大利的道路'——特别是关于过渡的逻辑》（《日本经济分析》季刊第1卷大月书店1959年）第176页。

13、14. 池上惇：《财政危机与居民自治》青木书店1976年第1章第3节。

15.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为了意大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了劳动阶级的民主政府》，"陶里亚蒂总书记在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世界政治资料》第16、17期）。

16. 罗歇·加罗迪：《关于〈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几点疑问》（载于《现代革命的展望》见前）。共产主义手册①编、小出峻译：《工人阶级与中间阶级》新日本出版社1961年。

17. 尾上久雄：《经济计划与结构的改革——在意大利的情况下》岩波书店1968年，也是正确地论述了意大利道路的精心著作。此外还有评论雷里奥·巴索著《社会构成体和国家形态》的芦田亘：《"发达国家革命"论和国家论》（《经济科学通信》第17期1976年11月）。

此外，与意大利道路的领会过程同时，有南斯拉夫理论家的论文以及南共新纲领中的国家论和官僚论，引起了人们的瞩目，甚至发展为苏联的基林和南斯拉夫的耶尔·伊之间的争论等（基林：《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评价》，《国际资料》第38期）。对其当时意义的评价，因为作者也仍在研究当中，姑且予以保留。

---

① 法共中央理论政治月刊。——译者注

第三章　资本积累与官僚机构

前　言

如前所述，批判“生产关系社会化”论时，曾围绕着怎样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官僚机构发展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批判者的研究方向，可以说主要形成了四种趋势。

第一种趋势：进一步深入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规律，根据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把握国家与经济的关系。这种研究方向，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井上、宇佐美研究方法的继承，其代表是手岛正毅。

第二种趋势：主要站在宇野经济学立场上，根据对于总危机中劳动力商品再生产特点的理解来研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代表是大内力。

第三种趋势：以列宁《帝国主义论》关于垄断的概念为主线，分析垄断阶段价值规律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危机，以制度“解体”危机中国家权力作用的增大为根据，论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必然性，其代表是南克巳。

第四种趋势：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竞争中，私人占有税收这一垄断竞争的手段，从而促进资本积累，使官僚机构得到发展的体制。其代表是岛恭彦和池上惇。

现在把上述几种说法的基本特点简单归纳如下。

I 手岛正毅的“利润率趋向下降原因”说

手岛的代表作是《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组成）。这本书是井上、宇佐美的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研究发表[1]以来的总括性的巨作。因此，下面试以该书为中心对于作者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做些研究。

手岛在《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的“前言”中，说明了他从事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研究的态度。他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打击和美国“半永久性占领体制下”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其复活过程中，“为构成其深层基础的垄断组织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一直起着不可缺少的支柱作用的，无非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机构。”[2]

当确立一种理论作为研究这种机构的指导思想时，瓦尔加认为它是在总危机中总资本与垄断资本利益的对立，齐香认为是“生产关系社会化”，大内力认为是丧失了从危机中自动恢复能力的危机感，岛恭彦认为是在总危机基础上的垄断形式的变化[3]。手岛正毅以与不同于危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内容，即垄断阶段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为指导思想。

“垄断资产阶级完成了资本的进一步积聚和集中的结果，它迫于获得巨额垄断利润的必要，为了限制竞争和再生产无政府状态规律的作用，遂发展到通过国家干预经济的形式。”[4]作者从这个观点出发，研究了“使这种限制成为必要的矛盾、目的和动机[5]，并试图在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6]的发展过程中阐明国家垄断机构。

使限制无政府状态规律的作用成为“必要”的矛盾是什么呢？手岛认为，就一般资本主义社会来说，这个矛盾就是“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而马克思就是从这里发现了“资本的内在矛盾运动的，即利润绝对额增大的同时又导致它（对于预付资本总额）的相对下降”；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不可解决的矛盾”[7]。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研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即以“社会总资本的平均利润率长期下降趋势”（包含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为基础（这一点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过的），讨论私人垄断转化成国家垄断的理论时，只要把垄断利润规律和垄断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展开，就会从这里顺利地导出阐明国家垄断机构(作为“垄断资本”对于“垄断利润率下降[8]”采取的“最后的并且是毫无希望的抵抗”[9]的机构)的方法论。

把国家的作用作为阻止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提出来的，是意大利经济学家斐赞蒂，但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现代垄断利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国家垄断机构研究的，则从手岛开始。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这本书在理论上的重大意义。

大家知道，《资本论》在“论证”“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时，并“没有提出超额垄断利润是阻止利润下降的原因”[10]。在手岛看来，这是因为“在这里(《资本论》的该部分——引者)，并不是就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一般而是就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本身进行论述的，所以垄断被抽象掉了”。

手岛又说，但是，强调的是这一点：“在阐述个别资本或一定的个别资本集合体即垄断资本集团的利润率变化时，情况便自然地不同了，重新阐明垄断作为阻止利润率下降因素的意义和作用，就成为重要的课题”。[11]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手岛把与社会总资本运动相照应的平均

利润率规律，同个别资本运动相照应的超额垄断利润做了重要的区别。手岛研究方法的出发点，是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下述一段话为根据的：

“其次，利润率的降低还可以由于取消现存的利润扣除额而被阻止，例如减税、减租等等。严格地说，这不属于我们目前讨论的范围，虽然这含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因为这就是在其它名义下被资本家以外的其他的人们所占有的那同一部分利润。利润率的降落同样可以通过开辟新的生产部门而被阻止，只要这些部门所需要的直接劳动相对地说多于资本，或者那里劳动生产力或资本生产力还不很发达。垄断也可以发生同样的作用。”[12]

手岛把最后指出的“垄断也可以发生同样的作用”看作阻止利润率下降的一个因素，所以他说：“不容置疑，马克思把垄断看作个别资本运动中的一个阻止利润率下降的因素。”[13]关于个别资本赢利的界限，他企图从两个方面统一地予以说明：一方面是由平均利润率规定的；另一方面，是获得旨在阻止利润率下降的“最高垄断利润”（也叫做利润率的差别结构）。这就纠正了过去提出的“最大限度利润”论，特别是纠正了斯大林观点在逻辑上的混乱。斯大林“一方面说，在平均利润率以下，资本主义生产比较正常地实行扩大再生产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又说，如果不是最大限度的利润，比较正常地实现扩大再生产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理论上的一个根本转变，即不以获得垄断利润作为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赢利界限，而认为获得垄断利润是为了实现“阻止平均利润率下降”[14]这一目的的。

只要是确认这一点，那末，一面揭示“平均利润规律与垄断利润规律并存[15]的必然性；一面研究追求超额垄断利润的各种垄断形式，即研究各种获得超额垄断利润手段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16]，就可以十分容易地揭示出私人垄断转化为国家垄断的必

然性。

垄断的各种形式，如卡特尔、托拉斯、康采恩等等，一方面企图阻止利润率的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动员了巨大的生产力，而重新引起利润率更大的下降，所以私人垄断终于势必达到“一定的界限”。手岛认为这种界限表现在下述几点：

第一，资本积聚受到“狭窄积累源泉”的制约；第二，在这个基础上的超额垄断利润与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规律的作用；第三，“面对危机私人垄断不能干预、控制和调整社会总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全过程。”[17]

这样出现的国家垄断机构，其“主要一环”是以“作为生产关系的国有制”为基础的，而“其他各个环节，则是在国有制基础上派生的国家垄断的支配力，即给经济基础以反作用方面所必要的手段”。[18]

手岛根据恩格斯的论述，即“在同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有制形式（所有制性质）按股份公司、托拉斯、国有……顺序变化”，“资本所有权同职能的分离”发展了，提出一个大胆的结论：“在国家所有制场合，私人垄断甚至不参加投资（所有权与职能分离的极限），也可以共同获得社会所有权，实现垄断组织的实际上的共同所有权”。他还在历来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争论的基础上，提出如下结论：

“东德的齐香争论，由于未搞清楚所有制的阶级本质与性质之间的区别，未搞清楚所有制形式与生产力之间矛盾的状况，以致引起不必要的混乱。对于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规律的作用的限制，是作为从国家所有制中的垄断组织实际上的共同所有权派生的国家垄断各个环节的作用而产生的。[19]

以上就是手岛提出的“在垄断阶段中从私人垄断向国家垄断过渡的自然历史过程”[20]，“而危机的各种条件就是起加速和促

进这个过程的作用的，而且也只能起这种作用”[21]。

以政治对于经济的相对独立性、帝国主义国家间政治发展不平衡以及政治上从属的相对独立性为前提，“经济危机和生产的慢性过剩”与“经济军事化和向战时经济过渡”[22]，有力地加速了向国家垄断的过渡。

手岛把这个结论应用于战后日本资本主义，他一方面阐明了随着日本垄断组织的复活而出现的国有制和国家垄断的联系，揭露了国家垄断对于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所起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说明了以垄断资本家阶层为顶点，以“半自然经济”为底边的社会经济构成，揭示“总的情况是非垄断阶层特别是半无产者和小资产者阶层众多”。并以对美国政治上从属关系的相对独立性为媒介，以金融上牢固地从属于美国这一特点为前提，做出下述结论：

“社会经济构成的这种历史特殊性，激化了美日垄断资产阶级与工人、农民以及其他要求民主的人民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世界，则构成了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程度不同地激化起来的策源地。而且，它还提示了将来必然发生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日本国家资本主义的特殊构成”[23]。

手岛一方面导出了理论结论，另一方面导出了出色的具有实践意义的结论，这时，他必须越过许多理论上和实证上的高峰。首先，要继承富塚良三、本间要一郎的业绩，超越丁·罗宾逊、斯威齐、安培一成和堀江忠男等人对马克思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批判；要把超额垄断利润规律从白杉庄一郎和F·贝伦斯应用边际效用原理的研究方向中拯救出来，使人们想起“工业标准生产条件的可动性”[24]来，并把这个问题应用于垄断的形式，明确地揭示出，垄断在标准生产条件下生产的大量商品为取得支配市场生产价格所需要的质量关节点[25]；以垄断利润规律与平均利润规律

并存的观点，批判苏联和东德关于垄断利润规律的争论与高须贺义博的观点；要搞清楚由于马克思研究过的十八——十九世纪的技术与以自动化和控制论为中心的二十世纪技术革新的不同，提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是否有低于有机构成增长率的可能性？因此，不会有由于尽管技术构成提高但有机构成没有提高，从而阻止利润率下降的可能性吗？（据M·戈兰斯基的研究，从1919年为转折期，这以后的技术进步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26]）。还有，根据基尔曼的实证研究，有机构成大幅度下降和剩余价值率略减的结果，美国企业的利润率有上升的趋势。但是，手岛就美国和日本的情况提出：剩余价值生产和国家垄断的加强，随着垄断的腐朽化而出现的有机构成提高出现停滞的事实，[27]，以及有机构成高速飞跃提高的事实，[28]试图首尾一贯地证实利润率下降规律。

在对于这些理论做出贡献的同时，手岛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分析上，继承了加藤睦夫、山田盛太郎、山田喜志夫和井上晴丸等人的业绩，展开总危机理论论述时，把列宁区分为α、β、γ名群的分类方法应用于当代，展开了以万隆会议为开端的第三阶段论。

当然，关于对垄断利润规律和构成这一规律基础的垄断与竞争关系的理解，关于“垄断组织共同所有”的概念，“自然历史过程”与“危机”的关系，以及“总危机第三阶段”论，等等，还会有许多不同意见。但是，手岛的《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根据其首尾一贯展开的垄断利润规律理论而开创的体系，同其对于问题的敏锐认识一起，进一步巩固地奠定了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研究的基础，也一定会成为未来长时期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29]

注　释：

1. 井上晴丸、宇佐美诚次郎：《危机中日本资本主义结构》岩波书店1951年版。

2. 手岛正毅：《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有斐阁1966年版，《前言》第1页。

3. 参照瓦尔加：《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论文集》中《关于资产阶级国家问题》。今井则义等著：《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合同出版社，第1章。大内力：《日本经济论》上，东京大学出版会第242—243页。岛恭彦：《〈帝国主义论〉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1976年12月号）第47页。池上惇：《现代国家与国家垄断》（《历史评论》1968年7月号）第5页。

4. 手岛所著前书，第1页。

5、6. 同上，第8页。

7. 同上，第33—34页。

8、9. 同上，第72页。

10. 同上，第34页。

11. 同上，第34—35页。

1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4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页。

13. 手岛所著前书，第36页。

14. 同上，第38页。

15. 同上，第45页。

16. 同上，第73页。这个“自然历史过程”概念需要讨论，但在这里不来谈它。

17. 同上，第75页。

18. 同上，第77—78页。

19. 同上，第79页。

20、21. 同上，第12页。

22. 同上，第76页。

23. 同上，第242—243页。

24. 同上，第49页。

25. 同上，第53页。

26. 同上，第111页。

27. 同上，第135页。

28. 同上，第141页。

29. 手岛的理论受到了意大利安东尼·裴赞蒂的启发，见手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经济评论》1961年 11 月号）第83 页；安东尼·裴赞蒂：《利润率的下降》（名和、佐藤编《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与周期》合同出版社1960年版）第284页。

Ⅱ 大内力的“劳动力商品危机原因”说

大内力的《日本经济论》被认为是“用宇野理论的方法分析日本资本主义现状的集大成性质”的著作。书中对齐香和齐香的批判者双方都进行了批判，指出：

“我们与齐香不同，不单单以与生产力社会化相适应的进一步社会化的新生产关系的形成来规定阶段。这种抽象的规定，对于规定具体阶段，没有任何作用。我们认为，还是应当以经常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态及其积累方式的不同划分阶段。总之，资本主义运动经常以资本积累为中心而发展，所以，只有资本积累方式的差异，才是规定资本主义历史性质的根据。因此，如果贯彻这个观点，不用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新阶段，而是帝国主义阶段。因为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态仍然是金融资本，第四号新资本形态并没有占统治地位（也许有人认为国家资本是第四号形态，但是国家资本不用说只是作为部分的补充的形态而存在的，如果它要占据了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就已经不成其为资

本主义了）。但是，因此就象齐香的批判者所说的那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同‘古典的’帝国主义本质上是同一的，是战争和危机时采取的暂时性的政策，它本身可以用‘帝国主义论’来说明，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我们不能赞同。应当说这种态度实际上陷入了仅仅从资本主义考虑阶段问题的结果，忘记了从世界史的角度对阶段进行规定。它还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变化视而不见，反而把马克思经济学变成了一成不变的教条。在我们看来，重要的问题还是世界历史上的阶段与资本主义本身阶段的不相吻合，是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变化。过渡阶段的规定，就是以此为根据的[1]。”

具体地说，作者在这里强调了在世界历史的现阶段里，是垄断与金融资本的时代，同时还意味着是社会主义开始发展的过渡阶段——把资本积累这个经济学原理性范畴予以具体化的必要性；强调这种具体化的线索就是世界史上的阶段同资本主义本身阶段的不相吻合，而其结果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变化。但是，被称为所谓帝国主义论“还原”派的人们，也并不否认把握现阶段资本积累的特征，而是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的基本特征是通过赋税、公债和通货膨胀促进资本积累。前面已经说过，在这一点上，他们认为资本积累的特征是区别于国家资本的“国家与垄断的混合”或“国家从属于垄断”。而且他们认为，危机的各种特征，诸如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运动和帝国主义的国际斗争，等等，进一步加速了赋税和通货膨胀促进资本积累的过程。就这个方面来说，看不出他们与大内力的认识有多大的不同。如果说有对立的话，那就与这个问题有关：怎样论证作为现代资本积累特征的赋税和通货膨胀促进资本积累的发展？

大内力考察了现代危机的形式，从象1929年危机那样的“深

刻且长期的危机”[2] 里探求资本积累的特征。他说明垄断的形成使垄断企业同局外企业利润率的差别固定起来，使危机时局外企业资本的破坏同垄断企业避免对生产的限制和资本的破坏并行，这一事态通过过剩资本的保存和垄断价格的维持，造成了慢性的结构性的萧条局面。尔后，尽管出现上述情况，但由于从危机中自动恢复能力经常发挥作用，所以从长期来看，是可能摆脱危机的。但这种长期的深刻的危机，使劳动力商品的所有者工人在长时间里大量的失业，在俄国革命成功的国际背景下，他们的不满和向政治方面施加的压力，使资产阶级政权不能听任这种危机自行发展，等待其“自动恢复”[3]。为了对付这种状况，资产阶级政权便一方面救济失业，实现“充分就业”，以便从政治上缓和危机；另一方面，为了获得充分就业所需的财政资金，遂发行赤字公债，增发纸币，使通货膨胀慢性化，借此对于工人的实际工资进行控制。这种场合，怎样认识充分就业政策和对实际工资的控制呢？是把它看作维持金融资本体制，保障高额利润的措施呢？还是认为它并不是金融资本的组织化，而是作为资本主义的自我保存，针对金融资本不能处理的失业问题和农业危机而推行的“资本主义的组织化”呢？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本质的重要问题。大内力业绩的先驱宇野弘藏，1946年在《世界》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就使用了“资本主义组织化”这一表述，认为关于失业问题和农业危机的各项政策是由国家承担的金融资本组织化的范围内的东西[4]。

对于这个问题，大内力虽然明确地使用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术语，但并未采取把失业问题和农业危机中的“组织化”的本质看作金融资本组织化的一个环节，对此进行论证的方法。那末，是不是可以把大内力理论的本质，看作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还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这个问题，未明确表态，持保留意见

呢？这是今后也有必要研究的一个课题。

通常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本质所做的规定，是把它看作垄断和金融资本的组织性与国家的组织性的合为一体，但基本上是金融资本组织性占统治地位。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本质的规定，则是对于金融资本再也不能处理的问题，由国家和官僚机构发挥的超过金融资本的组织性。至于超过金融资本的组织性这种情况，是指以工会参加国家的决策活动，或各种有压力的团体多元地参加国家决策活动的形式，民主地推进“资本主义的组织化”而言。根据希法亭和宇野弘藏的看法，资本主义组织化的第一根支柱是通过放弃金本位制，采用纸币本位制，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以对付失业和危机；第二根支柱是通过工会民主地参加政权，实行保险制度、教育制度和参加经营制度等。这个理论的最大缺点在于货币理论，希法亭的看法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他认为通过停止金本位制和发行纸币，国家完全垄断了黄金储备，就可以抑制作为商品生产一般基础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没有黄金这个一般等价物就可以实现经济的“组织化”，就可能分配资源，调整物价[5]。但是，我们在讨论井汲卓一的论点时已经说明，对于商品生产基础和私有制支配社会产品来说，货币作为必不可少的媒介物质，介入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如果是在承认这一事实之后再进行讨论，而且是根据停止金本位制也是由靠大银行垄断黄金储备的国家给予保证的一种形式这种观点进行讨论的话，事态就完全改变了。

国家对于货币的统制，丝毫不能扬弃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而是在价值规律基础上进行活动的垄断行为。如果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把黄金储备集中在国家手中，并置于大银行、大商社等统治集团支配之下，由于滥发纸币而引起通货膨胀，实际上统制了工资，大公司寄生于财政，大银行寄生

于赤字公债等。这种场合，不过仍然是金融资本“在价值规律和商品生产基础上的”组织性。

在上述货币本质的基础上，再引进社会分解成私人生产者，社会公共事业转化为官僚机构这一逻辑，官僚机构的一切组织化，就都变成了在私有制和商品生产基础上加强垄断企业的组织化了。这样一来，工会和其他团体的参加国家决策机构，只要不触及到货币本质，不触及到官僚机构加强垄断组织的活动，就根本谈不到组织化，只能是与资本家的合理化合作的体制。

如果要谈资本主义下工人、居民对于垄断的民主限制，就必须为了触及货币本质而对于大银行、大保险公司的营业秘密进行干预，就要使官僚机构民主化，并借此对于垄断营业秘密和营业自由施加限制。对于货币制度和官僚机构不予明显的触动而保持其原状的“组织化”，实际上很有可能转化成金融资本组织化的一部分。

但是，这决不是说作为大内力理论基础的通货膨胀问题，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不具有重要意义；而是说必须进行努力使一个假说式的阐述进一步丰富起来，论战的经过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

注　释：

1.大内力：《日本经济论》上册，东京大学出版会1962年版第247—248页。

2.大内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同前第131页。

3.同上，第148—149页。岩田弘：《现代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载岩田弘：《世界资本主义》未来社1964年版）第298页及以下各页，批判了这个论点，强调大内力和今井等人的观点基本上是一样的。

4. 宇野弘藏：《资本主义的组织化与民主》（《世界》1946年5月号）。宇野在这篇论文里认为，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在于民主的“资本主义组织

化”未能成功。设想在工会的参加下实行民主的资本主义组织化。

还有，关于大内力是否正确地继承了宇野弘藏的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问题，降旗节雄（《宇野理论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载《探索社会科学》1976年春季号时潮社）、伊藤诚（《现代资本主义与危机》载《经济评论》1976年1月号）等持怀疑态度；镰仓孝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考》载《探索社会科学》同前）、加藤荣一（《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观点》载《经济学批判》Ⅰ社会评论社）、马场宏二（《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Ⅰ载《社会科学研究》第27卷第2号）等人认为，大内力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是宇野观点的引申，也指出了他作了发展和不充分（存在于宇野观点本身）的地方。在他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次争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镰仓孝夫说，宇野和大内都强调资本主义认识到金融资本组织化的局限性，都强调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是总资本对于政治危机的组织性；但又指出，“虽说国家组织化超越了金融资本组织化的局限性，但只要金融资本支配经济，只要阶级关系统一于商品经济关系，那末，国家组织化也只有通过商品经济关系才有可能”（镰仓孝夫所著前文第37页）。加藤荣一批评宇野的论文也尖锐指出：“这时，宇野关于劳动力商品化是资本主义根本问题的观点，还不能说已经明确了，因此，难免有把国家进行的组织化与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对比地进行考察的倾向”（加藤荣一所著前文，第21页）。

5.研究一下宇野弘藏的货币理论在这一点上具有怎样的特点，是有意思的问题，但这里不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地方。关于希法亭，参照《金融资本》第2章和《货币与商品》（玉野井芳郎、石垣博美译：《希法亭·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法政大学出版局1955年版）。对此进行批判的是考茨基：《黄金、纸币和商品》（《新时代》第30卷第1册，日译本可参照向坂逸郎、冈崎次郎译：《货币论》、笠信太郎译：《金与货币》同人社1932年）。

Ⅲ 南克巳的“市场危机和军事化”说

宇高基辅、南克巳、古川哲等人主张，垄断资本积累方式与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大萧条，造成了深刻的矛盾，单单凭任市场自然发生的分工关系已经没有希望实现萧条的恢复，造成了在垄断组织企图排除自由竞争的范围内，就不可能从经济内部解决的矛盾[1]。南克巳在谈到垄断组织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带来的难以克服的生产过剩问题的联系时，强调垄断企业与局外企业结构上的不平衡，他的结论是："资本过剩和人口过剩"是全面的严重的发展不平衡的结果；而这种不平衡是牺牲广大的局外企业和劳动群众生活而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旨在维护垄断利润而对竞争和生产进行种种限制的结果[2]。与大内力以劳动力商品再生产危机和国家干预劳资关系为理论的中心不同，南克巳以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即再生产的理论为准则，着眼于各生产部门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在垄断阶段的加剧，把价值规律危机作为理论的中心。他的结论是："过去的'基调'即竞争支配下的'平衡'（'理想平衡'的实现）以及通过这种'平衡'实现不断的发展，这已经成为过去。而代替它的新'基调'，就是制度'解体'危机深化的国内基本路线，从而它还是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内**基本路线**"。在他看来，当上述制度"解体"危机出现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是"把阶级统治工具国家机构隶属和合并（因此重新组成着以军方、财界和工人贵族等阶层为核心的非生产阶级）于金融资本统治和掠夺体系（金融寡头制，有时是它的联合），并把国家机构当作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的手段，同时谋求从政治和军事上"解决"问题的体系[3]。这种体系是垄断和自由竞争的内在矛盾以政治和军事为媒介爆发的形态，所以从其企图从政治和军事上解决慢性危机的意义上说，可以把它叫做"世界战争（危机）周期"。经济中的矛盾，它自己不能"自主"解决，而把解决的方式求之于政治，这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根据。对于这个

观点，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结论：在作者看来，问题的本质在于解决市场问题，特别是要通过扩大军工生产来解决，与此同时处理政治上的对立问题，以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大内力认为，问题的本质在于劳动力商品再生产的危机，他没有涉及到是垄断组织化还是资本主义组织化这一问题。南克巳则认为，问题的本质在于垄断造成的商品市场和价值规律的危机。这样一来，在把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特征时，他们都着眼于垄断企业与局外企业结构的不平衡，但大内力强调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政策干预劳资关系，南克巳则强调战争和军事经济使国内市场扩大并对市场关系进行干预。看来他们的主张是各有理由的。但是，联系垄断本质来论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则是南克巳的优点。关于他们之间观点的对立，从表面上可以归纳为，大内力认为，象南克巳那样强调军事经济和战争的认识方法，即使能够把握作为对于危机和战争的暂时性政策的战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不能把握持续的平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他认为即使是长期严重的萧条，但存在于经济本身中的自动恢复能力并未丧失。在他看来，垄断的发展即使可以暂时地破坏价值规律，但做不到使它长期“废除”，从长时期看景气还是要恢复的。但从世界历史的阶段来看，资产阶级政权并不存在可以指望长时期恢复景气的条件，这是因为劳动力商品不可能长期就业，并且因而引起政治和阶级的对立激化起来的缘故[4]。

对于这个问题，把南克巳后来的研究成果也一并进行考察时，他的观点是：现代资本主义，虽然受到垄断与自由竞争的矛盾和丧失自动恢复能力趋势的压力，不断受到制度“解体”的压力，但又通过以军事为中心的国家政权扩大其对于经济的干预，使垄断组织日益加强。现代资本主义一方面借此维持其制度；另一方面又由于垄断和自由竞争矛盾的日益扩大，加速了制度的

“解体”。具体地说，美国用武力统治世界体制的加强，军事方面研究开发投资带来的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各产业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寄生于军事部门的垄断组织的技术开发，以由此得到的技术垄断为媒介的世界规模的资本输出，等等，这一切都在世界的规模上加剧了垄断和自由竞争的矛盾，愈来愈看不到现代资本主义的自动恢复能力，而是使“制度”解体的条件成熟起来，所谓“冷战”更加促进了这种趋势的发展。我们姑且把大内力的观点叫做“劳动力商品危机”说，那末南克巳的观点就可以叫做“市场危机和军事化”说。

在把大内力提出的现象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垄断的组织性问题从理论上阐明之后，当然就有必要把它同南克巳展开的几条规律合在一起统一地予以说明。

注　释：

1. 南克巳：《〈帝国主义论〉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序说》（《土地制度史学》第23期1964年4月）。古川哲：《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结构与工业周期》有斐阁1970年版第1章。宇高基辅：《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现代意义》（井汲、今井、宇高、江口、吉村编《现代帝国主义讲座》第1卷日本评论社1963年版）。

2. 南克巳所著前书。还有杉本昭七试图从理论上阐述帝国主义战后阶段的《现代帝国主义理论》，青木书店1968年版。

3. 南克巳所著前书，第15页。参阅海道胜稔：《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和转化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桥大学《经济研究》第16卷第3期1965年）中关于竞争与垄断关系的论述。

4. 加藤荣一认为，魏玛体制①是“早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根据兵藤钊的恰当的概括，它是这样的资本主义：“作为旨在吸收和压迫革命力

① 魏玛体制系指1919—1933年魏玛共和国（德意志共和国）的资产阶级——容克地主专制的体制。——译者注

量的办法，由于一举展开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开始发展起来的‘工人争取平等权利’的过程，以至于担负起两个互相排斥的任务：既保障作为体制吸收革命力量的代价的“能够生活下去的工资”，又保障“适当的利润”。对于加藤和大内的观点进行比较研究，是一项重要的课题，但不在这里深入进行。加藤荣一：《魏玛体制的经济结构》（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版）、《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经济讨论》1974年2月号）。兵藤钊：《现代资本主义与劳资关系——关于所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的评论》（载户塚秀夫、德永重良编《现代劳动问题》有斐阁1977年版）

Ⅳ“资本积累与官僚机构互相联系”说

上述两种观点，当然是把重点分别放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两种现象上所进行的理论论述。众所周知，现在，在慢性的财政危机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国家政权不得不对劳动力的再生产进行干预，不得不降低实际工资和实施充分就业政策。还有，在美国带头搞国际军事支出和两种制度对立下进行的军事研究开发，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跨国公司进行的统治世界的活动，这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这就要求建立起统一说明这两种现象和为这种说明所需要的更加带有普遍意义的理论。

岛恭彦、远藤晃、宫本宪一和池上惇等公共投资和地区问题的研究人员，又企图开辟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同劳动力再生产危机和市场问题激化这两种事实同时存在。他们大体上，都是着眼于作为齐香提出问题背景的“战后资本主义经济中政府投资法人的增加”，“政府有关机构以税收为资金的信贷活动”，以及“主要由这二者支持的公共投资和地区开发”，试图把这些纳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之中。这种场合，他们的尝试并不象齐香

那样，作为“生产关系的社会化”，使国家湮灭于个别资本运动之中；而是相反地，以国家这一政治存在为前提，通过阐明政治与经济边际领域的问题，诸如官僚机构、赋税、公的信用和通货膨胀等等，探讨问题。于是，他们就反复地尝试，力图根据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观点从理论上阐明“经济学中的国家”范畴；力图通过地区和自治组织问题的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上给予反映现代资本主义典型现象的公共投资理论以应有的地位（特别是努力于从其与前述军事支出和劳动力问题的综合关系上给予应有的地位）[1]。

在阐明国家理论时，论者共同面临的任务，是阐明下述几个问题的相互依存关系：与资本积累同时进行的社会公共事务，地区共同体，血缘家庭关系的解体和重新组成，增收赋税，官僚机构的发展[2]。随着社会由私人生产者组成而出现的作为社会的公共事务经营的防务、土木工程、互助、科学、文化、教育，等等，便转化为从社会中产生、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以致产生了官僚机构，这是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反杜林论》中，已经论证过的。上述研究人员把这个基本观点运用于经济学中的国家问题，企图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计划”里提到的“国家”范畴的基本点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使商品生产全面化了，使社会分化为三大阶级（资本家、工人、地主）。一切社会成员都转化为私人生产者，结果，社会公共事务便不再反映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造成了“非生产阶级”即担任军事、警察、土木建筑、教育等任务的官僚[3]。如果从公务这一点来认识这个问题，那末，只要社会还未被私有制瓦解，公务就是反映社会共同利益的；当社会一旦分化为私人生产者，公务就变成一种异化劳动，就会转化到从社会中产生、驾于社会之上的官僚机构的官吏那里[4]。于是公务便不能由

社会成员主动的劳动来承担，而不得不由基于征税权而征收的赋税来维持，而且如果赋税不足，便不得不发行公债以预支赋税。官僚机构的发展和征收赋税，从经济创造政治基础的意义上说，是同资本积累并行的合乎规律的过程，不能认为它仅仅是已有的政治条件，它也不象齐香说的那样，可以湮灭于个别资本运动之中。在对于经济学中“国家”做这样的理解之后，再回过头来考察一下现代公共投资问题就可以明了，在这里国家征收的赋税，作为形成“社会资本”所需要的资金来源之一，通过政府投资法人，执行着它的职能。而且从宫本宪一具体阐明的结论可以知道，共同体和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的共同基础——水源、交通、通讯、土地、文化等等，一旦被在国家的规模上凭借权力所收买，它们就变成为私人垄断服务的生产条件[5]。例如，农村共同体的水源，过去是居民劳动和生活所必需的公共手段，而大企业侵入地区，使其出售水利权，则水源的性质就变成以公共投资的工业用水管道为中心的水源利用体系。同样的过程遍及海域、土地、道路和地区文化等一切方面。在垄断使地区共同体和家庭关系解体的时候，以赋税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各种公团、事业团体和公库等积极地执行着它的职能。因此，它就揭示了这种关系：一方面由政府投资法人扩大和发展官僚机构，同时也促进了垄断组织的资本积累。这说明他们的理解是：官僚机构不仅作为资本积累的结果而发展下去，而且由于官僚机构扩展到生产和生活的一切基础方面，而存在着促进资本积累的趋势[6]。

从现象上看这种趋势是把赋税作为资金提供给公团等政府投资法人，而且再加上使用政府有关金融机构（在日本有邮局存款等）和民间的贷款，把生产基础和生活基础改造成以“垄断为中心”的形态。这种趋势，从世界上看，是从三十年代美国新政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开始，经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战后确定下来的。

这样，把官僚机构扩大到生产基础和生活基础，并以此来援助垄断资本积累看作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有充分根据的。那末，使这种趋势必然出现的根据是什么呢？他们认为，这种根据一方面在于垄断积累方式要求发展生产和消费的社会性；另一方面在于通过国家权力使社会承担垄断企业产生的浪费和生产成本增加部分[7]。现在垄断组织拥有大型机器和设备，特别是通过康平纳使技术和社会方面都密切地联系起来，因此，工厂的建设和经营，势必全部地改造包括一切地区的生产基础和消费基础。为了使这种生产力的要求不是在与社会成员利益一致的方向上而是在私人的、无政府状态的、追求利润的方向上实现，就必须依赖于作为并不反映社会共同利益的“异化的公务劳动”的官僚机构来推动。但是，这种私人的、无政府状态的、官僚式的地区改造，将扰乱自然与人类的新陈代谢，导致社会内部资源的浪费、人力的浪费和使用的不合理，还酿成公害、灾害和环境问题，向地区社会袭来。如K·卡普指出的那样，要求地区居民生存和民主的运动如果要清除这些灾难时，大企业就要被迫不得不支付防止公害费用以及其它各种补偿，而且水资源等的浪费，还要从资源方面对企业的生产费用加以限制。要避免生产费用上升，垄断组织就再次需要官僚机构的援助。这就需要设立承担防止公害资金的政府投资公司，从而扩大了生产事业新的行政领域。

用上述逻辑阐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就不一定需要国家在慢性萧条基础上对于经济进行干预的理论。成为问题的还是：为垄断积累扩大所需要的生产和消费社会性的发展，同私人的、无政府状态的、官僚性质的加深这二者之间的矛盾。

还有，当对于地区社会进行考察时可知，垄断资本积累需要把地区居民生产基础和消费基础合并到官僚机构之中，这也是使地区居民家庭形式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创造政府和官僚机构新的

行政需求的过程[8]。地区社会的生产基础和消费基础转化成为垄断服务的生产基础时，土地和水利权的收买、住宅和农田的赔偿，促进货币关系向地区社会的浸透，因而从根本上推翻了共同体关系和家庭间的互助体制。当割断了家庭同地区公共财产和家庭集体财产的联系，家庭的单个成员作为“核家庭”开始走上独立的道路时，历来由共同体和血缘关系支撑的育儿、医疗和家务，立即无人管理，如不能以社会的规模提供托儿所、医院、住宅和耐用消费品，就连生命的再生产都变得困难了。所谓“城市化”的潮流一旦波及到整个地区，一方面是自治组织，另一方面是流通资本和不动产行业，都必须提供地区消费生活的基础。这就需要扩大福利措施和有关厚生省① 的行政业务，需要承担这些工作的福利工人。而且这些行政业务也往往要由作为官僚机构一部分的公社、公团和公库等政府和地方自治组织投资的公司负责。核家庭化的发展，增加了薪金工作者的数量，增加了缴纳所得税的人口，从而扩大了财政和税收的基础。于是，官僚机构便沿着垄断组织的生产基础、居民的生活基础和国家的财政基础这三个方向发展。

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把官僚机构发展的规律性同资本积累的规律性一并纳入其理论之中时，他们着眼的事实就是：以赋税为资金的来源之一，背后有政府机构支持的法人组织，使与共同体和家庭关系结合在一起的“生产基础和消费基础”不断地瓦解，特别是使农民土地所有制瓦解，创造出工人阶级和采取公司形式的中小个体企业，从而增加了纳税人口，扩大了国家财政基础。美国和日本以所得税为中心的税收体系，增加了个人所得税和中小个体企业的纳税额，从而增强了官僚机构的经济和财政的基础[9]。以此基础为背景，赋税主要从四个方面扩大了官僚机

① 厚生省系日本政府卫生福利部。——译者注

构活动的范围。

第一，“市场危机和军事化说”强调的方面，即经常性军事支出(包括研究开发和国外军事支出)的增加。

第二，垄断组织生产基础的扩大，即所谓国家经济基础部门的完备。

第三，官僚支配居民生活基础的体制——通过保育、医疗、教育、训练等——的加强。

第四，在征收赋税制度扩大基础上的公的信用的扩大、赤字公债的发行和通货膨胀，由此引起的实际工资的下降和居民储蓄的减少，以及“劳动力商品危机说”所说的国家干预劳资关系的加强[10]。

上述四点共同之处是：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基础特征，是利用赋税作为垄断资本积累的手段而不用之于民的现象；是私人通过合法的预算制度占有公款以促进资本积累从而使与居民对立的官僚机构得到发展的体制。我们姑且把持这种立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叫做“官僚机构发展”论。这种立场认为，只有合法的利用税收促进垄断资本积累的官僚机构的出现，才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萌芽形式，它通过战争和革命危机以及大危机等得到了发展，在第二次大战后确定下来。

这里所说的萌芽形式，是来自对于后面将要提到的F·平内尔专卖概念的发展[11]，它包含的内容有：在国际上垄断组织斗争的过程中被美国石油资本战胜的德国资本，通过国有化使其损失由国家税收予以补偿、通过私人占有公款来应付国际上的竞争。专卖这个概念，本来是指国家垄断营业权，从中得到收入，并把它作为赋税缴纳给国库的行为而言。但在这里，它却变成了旨在救济在竞争中失败破产的垄断企业，而由国库提出税款予以补贴的概念。现在如果把它叫做国家垄断，那末，由于扩大了应付危机

的官僚机构，使侵吞或合法占有公款转化为资本积累的主要特征，这样的垄断资本主义就可以叫做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了。

这种场合，合法占有公款的过程，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高度发展的军事技术为官僚机构所采用，组织生产不是面向自由市场而是面向国库；通过援外和输出国家资本以扩大垄断组织对外扩张的基础。第二，引进公共事业和运输、通讯上的高级技术到公共投资方面，在使其为国库生产的同时，把以赋税为资金的政府投资法人组织起来，以扩充垄断组织的生产基础。第三，节约向居民生活基础方面的支出，在这个领域里也扩大政府投资法人的活动范围，提高作为追加赋税的公共费用，在生活基础部门不足和民间资本产品价格高昂的地方扩大其营业地盘。第四，隔断居民与共同体和家庭的联系，促进核家庭化和工人化，扩大纳税人口，国家凭借公的信用和通货膨胀对于居民家庭经济进行控制。这最后一点无疑会更加扩充官僚机构的基础。

随着两种制度之间的冷战、阶级对立、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上资本斗争的激化，更加迅速地促进了上述四种过程的发展；所以，在资本积累加速进行的同时官僚机构也加速度地扩大起来。官僚机构和赋税促进资本积累的加速进行，使工人阶级因技术进步和农民阶层的分化而剧增。但是，官僚机构的发展和行政事务工作领域里引进更加高级的技术，则使公务人员从原来的中产阶级地位沦落为工人的地位。特别是私人合法占有公款带来的官僚主义的浪费（地方主义、重复开支、资源和收入分配不合理等等），尽管纳税人口在增加，也要不断增加因财政收支不平衡的扩大而出现的节约人事经费的压力，促进引进技术于行政业务工作（包括电子计算机），使作为低工资劳动力的职工在增加。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就已经指出，欧洲的战争增加了军事支出，军事任务的承担者变成了工人和农民，因此，权力的基础

实际上已由居民承担起来。他们一旦有了自己的意志，立刻就会实现权力的交替。并把这种情况叫做“军国主义灭亡的辩证法”[12]。

现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为了维持生产、生活基础和庞大的信用、征税机构，雇用了专家和大量职工，特别是在公营企业和地方自治组织里，随着公共投资、教育和福利等行政业务的发展，经常雇用大批职工。这些人从生活到意识都与居民有共同的利益关系，他们同居民一道对官僚机构进行民主改革，阻止把公款化为垄断的私有，使其转化为服务于居民发展的财政基础。这样就表现出一种进步趋势，出现了这样的学说，主张象军国主义由于自身发展的辩证法而灭亡。那样，官僚机构也要由于自身发展的辩证法而灭亡。并且在这一预见下，确定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从而主张在政治、经济、财政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彻底地实行民主，诸如实行反垄断税制、民主监督公的信用、文官管理军事、预算优先分配给生活基础部门、按照地区计划对企业选择厂地进行限制等等[13]。

与官僚机构民主化的进展程度相适应，财政要使用在保障居民的发展上。工会、自治组织和合作组织等，作为民主的学校要担负起教育和训练任务来，为居民发展服务。但是，只要国家政权性质不发生根本变化，为居民发展服务的途径到头来也还只有一个。只要官僚机构不彻底地实现民主化，财政也就不可能转化成为人民发展服务的物质基础。

“官僚机构发展”说达到得出上述结论的程度，经过了相当的曲折，因为这必须由大量的地区研究和公共投资研究提供证据。但是，由于这个理论着眼于官僚机构与资本积累过程的相互关系，因而避免了历来极其抽象地讨论国家适应危机问题的倾向，可以说这种观点在具体而又概括地提出问题方面，基本上取

得了成功。

注　　释：

1．宫本宪一：《社会资本论》有斐阁1967年版。池上惇：《社会的劳动手段与公共投资》（载《经济论丛》第90卷第6期1962年12月，以及《现代资本主义财政论》，同前第三部分第9章）。

2．着眼于地区社会变化与官僚机构联系的著作有：岛恭彦：《现代地方财政论》有斐阁1951年版和《町村合并与农村变化》有斐阁1958年版，以及《地区的政治与经济》自治体研究社1976年版。池上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地方自治》（载自治体研究所《地区与自治体》第5集1976年版）。

3．参阅池上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争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中的国家》（载加藤、古川、良知、鸷见编《现代资本主义与国家》同前）。

4．池上惇：《马克思理论与现代财政》载《财政危机与居民自治》第214页及以下各页。

5．宫本宪一所著前书，第75页。

6．为了把这些过程理论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这个范畴，似乎是有效的。参阅池上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地区开发》（载《现代资本主义财政论》）。

7．在加深这个论点上，不能忽视K·卡普社会费用论的影响。K·卡普：《私人企业的社会费用》（篠原泰三译《私人费用与社会的费用》岩波书店1958年）。

8．为把家庭问题纳入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向井喜典、池上惇和成濑龙夫等一贯地进行了努力。见前《财政危机与居民自治》，以及向井、池上、成濑编《现代福利经济论》青木书店1977年版。

9．参阅池上惇：《财政危机与居民自治》同前，第134页及以下各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财政的"家计支配"结构——以美国财政信贷机构为中心》（载小谷义次、吉冈健次、宫本宪一编《国家与财政理论》青木书店1973年版）。

10．池上惇：《现代资本主义财政论》。

11. 同上，第一部分第2章。

12. 池上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第203页。

13. 池上惇：《现代福利与经济民主》（向井、池上、成濑编《现代福利经济论》末章）。池上惇：《列宁与经济民主》（载《财政危机与居民自治）。

第四章　展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争论的新局面

Ⅰ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的“复活”

根据上述考察，很明显，可以把第二次大战后，日本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的争论，大致划分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　围绕井上、宇佐美著作展开的“生产力理论”的争论时期；

第二时期　“生产关系社会化”的争论时期；

第三时期　关于资本积累和官僚机构相互关系的争论时期；

然后，把现阶段姑且叫做第四时期。

从六十年代后半期到七十年代，乍一看并不清楚，但逐渐明显地出现了几个争论问题。前面已经谈到，“生产关系社会化”论在危机论的批判面前节节后退，到了1976年，终于开始了一个划时代的新局面。“生产关系社会化”论者之一的玉垣良典，终于表示他认为，否定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概念，代之以“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概念是适宜的[1]。过去是“生产关系社会化”论支持者之一的正村公宏，在《现代理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井汲卓一的国家理论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只有这个理论才是批判持阶级国家一元论立场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说它是最早表明多元国家立场的理论[2]，即认为国家不是垄断资本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是通过由社会各阶层结成的有压力的团体来调整利益对立的机关。

于是，“生产关系社会化”论自己就发表了宣言：放弃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概念和阶级国家论。因此，争论的重点也就从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本质问题，转移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概念本身是否错误上来；具体地说，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还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3]

应当注意，玉垣的论点接受了西德J·科卡的主张[4]，而且科卡的论点，同西德理论家特别是同比勒菲尔德大学[5]和柏林自由大学[6]的理论家批判东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论点，同出一辙。科卡把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概念摆在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相对比的位置上。这时，它的特点是使希法亭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概念复活起来，尽管附有若干保留。

希法亭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新的经济问题时形成的，最先出现在192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刊物《社会》的卷首论文里[7]。文章以卡特尔、托拉斯的发展，工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以金融资本形态相结合，以及劳动过程社会化和产业部门相互结合等事实为基础，把“经济的有意识的组织化和统制的加强”看作“为了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克服自由资本主义内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所做的努力”。结论是：“就整体来说，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过渡”。这个观点，当时就受到了列宁写了创刊号序言的、有很大国际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和瓦尔加等苏联经济学家的反驳，遂发展成大规模的国际争论[8]。批判者们一致主张，金融资本以及同它结合在一起的国家，是不可能克服资本主义的基础即“私有制和商品生产”的。这种观点，在1929年大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事实面前，变得很有说服力；另一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上述主张，在纳粹主义抬头的事实面前，又变得很缺乏说服力。就是希法亭本人，也受到了诺伊曼的批评，说他“虽然有极其聪明的天资，但对于群众状况

却又没有任何感知能力。而以对于战后社会的巨大变化缺乏洞察力的人为自己的领袖，则是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一个悲剧。”[9]

这样的时代背景，明显地削弱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概念的影响，促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概念的普及；总之，这可以说是当然的归结。但是，现在我们却看到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概念的“复活”，虽说是在一定条件下的“复活”，但却说明包含否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概念在内的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的确正在形成。因此，就使我们有必要再回顾一下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争论的情况。

注　释：

1. 玉垣良典：《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的根本反省》(《现代理论》1976年1月号）。

2. 正村公宏：《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诀别》（《现代理论》1976年5月号）。

3. 对于玉垣提出的问题，大内秀明说：“特别是对于所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作者甚至宣布要停止使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概念，表示他对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术语有一种亲切感，等等。这说明作者正在尝试一种可以认为稍嫌过分大胆的思想转变。作者积极地评价自由派社会主义政策纲领，同时对西德式‘市场社会主义’寄以莫大的希望，要把它作为代替当代资本主义的模式，等等；都表明作者下了决心，转变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信仰。”（大内秀明：《为了重新开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争论》，载《现代理论》1976年5月号第25—26页）。

4. 大野英二最先正确地介绍了J·科卡（Kock a）的观点。大野英二：《J．科卡〈战时阶级社会——德国社会史（1914—1918）〉》（《经济论丛》第116卷第5、6期1975年）。科卡关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问题的论文的日译文是，冰沼宗司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还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现代理论》1976年2月号）。

5. 科卡：《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还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序言”，载H·A·温克勒尔编：《有组织的资本主义》1974年。

6. R·埃宾豪森：《垄断与国家》，1973年。

7. 希法亭：《时代问题》，载《社会》杂志第1卷1924年。

8. 这些批判文章载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9. F·诺伊曼：《毕希矛斯①——纳粹主义的结构与实际》，日译本，1963年第35页。

Ⅱ 晚期资本主义论

与酝酿“复活”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的同时，另一个受到重视的问题是，晚期资本主义论以及国际上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给予日本的影响。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的权威理论家E·曼德尔，于1972年由祖尔康普社（Suhrkamp-Verlag）出版了《晚期资本主义》[1]。书中对于苏联的切普拉科夫、东德的齐香、法国的波卡拉等“正统派”和作者称之为理论家的人们进行了批判。曼德尔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是这样的理论：论证由于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对垄断施加限制，实行民主限制，不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也可以逐渐地限制资本主义危害的理论，并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曼德尔看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是使民主主义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从而掩盖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矛盾的理论，是企图维持和平共处局面，以保持自己权力的斯大林主义者为自己辩护的理论。曼德尔认为，阐明劳资间关系的理论，必须是资本积累理论；资本积累过程的矛盾必然表现为，导致世界经济危机的长期波动[2]和为其

① 毕希矛斯（Behemoth）：源出《圣经》，巨兽，喻庞然大物。——译者注

决定的军事经济的发展，以及后进国家原始积累的困难[3]和停滞。而阐明这些问题的理论，就是晚期资本主义论。这种场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本身，仍然是被否认的。如果说，前述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是从“右”的方面加以责难的话，那末晚期资本主义论，则可以说是来自“左”的方面的责难。

注　释：

1. E·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1972年版。此外，他的著作还有：《现代马克思经济学》Ⅰ—Ⅱ，冈田、坂本、西川译，东洋经济新报社1972年版；《现代资本主义的对抗》，石崎，鬼塚译，东洋经济新报社1972年版等。曼德尔的活动领域极其广泛，他还从事马克思思想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关于构成曼德尔思想背景的法兰克福学派，参阅J·舒莱夫斯坦等著：《马克思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城塚登译，青木书店1974年版。

2. 曼德尔特别重视康德拉节夫周期动向，尝试把它同托洛茨基的资本主义崩溃论“统一成一个体系”。B·戴：《长周期论：康德拉节夫、托洛茨基、曼德尔》，载《新左派评论》1976年9—10月第99期第67页。戴在这篇论文的结论部分批评了曼德尔，说他对于托洛茨基和康德拉节夫双方的观点都同意、企图竭力调和两个完全矛盾的理论：一个是托洛茨基的强调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投机和崩溃的理论；另一个是康德拉节夫主张存在长周期和在某种意义上强调资本主义生命力的理论。从整体上看，可以说曼德尔的主张是，不论什么地方，都要把各种各样新见解“统一”起来，这就使他的理论很难懂。鲍勃·罗索伦：《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载《新左派评论》第98期。列昂·托洛茨基：《欧洲与美国》1971年纽约。

3. 汤浅赳男：《第三世界经济结构》，新评论1976年。加藤哲郎：《第三世界革命论与假“发达国家革命论”》（《前卫》1974年10月号）。

Ⅲ 法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与日本的新动向

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日本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中，开始系统地介绍和吸收了法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法国博卡拉、法共中央经济部和《经济与政治》杂志编辑部合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上下册，译成日文出版。这就使日本研究工作者可以直接了解，在以进行所谓“发达国家的革命”为目的的西欧所形成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该书的内容，在很大的程度上，同井上、宇佐美战后立即从理论上阐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相一致；也同学习和发展了意大利裴赞蒂观点的手岛正毅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相一致。

该书对于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对于总危机时期国家政权对经济过程的反作用，或者说对于资本积累理论与国家论统一的方向进行了探索。人们注意到，它把国家财政、政府出资、价格规定等有关国家和财政问题看作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占统治地位的特征”[1]。引起人们注意的还有，对阶级构成的变化和剥削新形式的分析，其中包含靠领取工资或薪金生活的各中间阶层的成长和脑力劳动作用的分析。

在上述背景下，户田慎太郎的《现代资本主义论》[2]一书，以对大垄断组织的分析为中心，同手岛正毅一样，以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为指针，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行了分析。

《现代资本主义论》的主要特色在于：对现代大垄断企业生产结构内涵的矛盾和不稳定性的具体分析，以及对其规律性的认识。户田认为，由于：1，机器、设备的大型化，2，自动化、高效

率和快速化，3，生产过程康平纳化，从而显著地提高了现代资本主义大垄断企业资本技术构成。

上述种种的结果便是，严重的不平衡和不断扩大市场的必要性决定了保持私有制本质的大垄断组织之间必然相互竞争的命运，同时又决定了扩大设备和各产业部门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命运。如果单位平均设备的规模增大时，设备投资竞争的规模也就要大型化，与设备的大型化同时进行的“快速化”，要求维持生产作业的连续性，要求强行维持开工率、扩大市场和缩短建厂时间。康平纳化和连续一体化，越是需要以设备投资的分散和长期的“妊娠时间”为前提，也就越是需要把连续设备投资不断地投放到不赢利的部门，尽管资金本来是优先向高收益部门投放的。

如果这样，那末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就势必导致可变资本部分相对的减少和不变资本部分相对的增加，特别是势将导致扩大与直接赢利无关的部分，同时又不得不使不变资本部分相对的增加。这就必然带来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即使利润率上升。这种下降的表面化，是在生产能力加速增大从而形成的全面过剩，向加速扩大的市场投下阴影的一瞬间出现的。为了突破扩大市场的界限，就必须扩大以所谓“第三产业”为主的新的投资部门和持续进行国外市场的开拓。

与其说户田是从列宁那里还不如说是从马克思那里探求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指导思想的，而且他把与马克思的时代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垄断时期不同的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归纳为上述三个特点，并认为这个时期产生了利润率下降和竞争的新条件。

户田认为，拥有这种新内容的当代资本主义，只靠个别的努力，是不可能阻止利润率下降的。如果不把由财政制度、金融制度在社会上汇集起来的货币的流动、中小企业、农业承包制的维持和人口流动等与大垄断的利益结合起来，以确保大型设备的连续

性和互相依存性，就不可能进行积累。他是从这里探求确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根据的。

但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巨大生产能力，同实际上直接与剩余价值有关的资本部分的差距越是大，国家投放的贷款越是难以回收和回笼，遂引起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如果出现石油危机等使利润率突然下降的因素，就会使拥有创造剩余价值能力的资本部分进一步紧缩，所以就会出现借助于投机和物价狂涨而获取利润的现象。

户田利用凡是收集到的会计、统计资料，对于利润率下降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在建设性的争论过程中，发挥了雄辩的说服力。

历来某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把国家“干预”当作对于因规定垄断价格而出现的设备过剩慢性化和利润率下降所起的反作用，进行了略微一般性的论述。对此，户田则在生产力的当代内容的基础上，一方面着眼于大型垄断组织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求；另一方面又着眼于直接参与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同从使用价值方面看社会结合生产能力之间的距离。如果把这些内容与今后需要讨论的国家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等合在一起思考，可以认为《现代资本主义论》一书是极其富于独创性的。

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当作对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起反作用的原因之一，这种认识方法，不能从整体上把握资本积累和官僚机构的相互关系。因为这种方法，不能从理论上、实证上解决资本积累是怎样使地区的社会公共事务转化为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机构的。国家为了救济垄断企业的经营危机，特别利用赋税干预经济，这是事实，但这种干预在促进垄断组织资本积累的同时，又发生了如下过程：从居民那里夺取地区的生产基础和消费基础，使其转化为垄断组织的生产条件。

当我们从世界市场中的国家这个领域和国家内的地区这两个方面考察地区问题时，如果不在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和国内政治经济危机的基础上讨论地区官僚机构的发展规律，就很难从整体上把握垄断资本积累过程的现代特征。

日本的研究工作，联系国际上美元危机的发展，资源、原料的激化，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体制和农业[3]、粮食等各个领域里，都有了发展。与此同时，开始出现了在地区、自治体问题和公害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在劳动和生活方面，重新从理论上阐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动向。一方面，资本积累过程的分析，深入到日本的技术和生产力结构上，并取得了进展；另一方面，国家论也摆脱了历来抽象的“计划”①争论，从随着“高速增长”而来的地区社会的变化与地区官僚机构的发展的联系上，进行了讨论。七十年代，公务工会②和教育工会，提出了官僚机构民主化问题，进而扩大到医疗、福利等各种地区问题，因而医疗劳动、福利劳动理论也发展起来了[4]。如果居民自治与公务劳动的关系构成一个问题，如果对官僚机构和大企业进行民主限制成为讨论的对象，那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所当然地就要研究这样几个问题：前面考察过的资本积累过程和官僚机构发展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两个过程产生的社会阶级构成的变化问题，以及阶级结构变化使居民和公务的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使大多数人统治代替少数人的条件是怎样成熟起来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仅为新社会准备了物质条件，而且从大多数居民将要成为社会主人这个意义上说，培养居民全面发展和统治能力的必然性，也要重

---

① “计划”指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提出的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计划。

② 公务工会是由公务员组成的工会。——译者注

新讨论[5]。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按照这个方向形成一个体系，可以认为，就是从国际上看，扎根于日本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研究，也在国家、财政和公务劳动理论方面，作出了有自己特色的贡献。下面试根据日本的争论，阐明国际争论的评价和存在的问题。

注　释：

1. 法共中央经济部《经济与政治》杂志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上下册，译者大岛雄一等，新日本出版社1974、1975年版，上册第41页。P·博卡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基础》（《新世界笔记》1967年10月号）。

2. 户田慎太郎：《现代资本主义论》大月书店1976年版。

3. 井野隆一、晖峻众三、重富健一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农业》上下册，大月书店1971年版。

4. 芝田进午编著：《教育劳动理论》、《医疗劳动理论》、《公务劳动理论》等，由青木书店发行。

5. 池上惇：《财政危机与居民自治》。

第二部分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争论的国际背景

第一章　平内尔与列宁

——国家垄断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确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一般通用的概念，是列宁的功绩，这是公认的事实。如果考察一下列宁是从什么人那里继承这个概念并予以发展了的，那就会找到平内尔博士二十世纪初的论文。列宁在撰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论》）时，留下了大量的笔记。笔记摘录了相当数量的刊载在《银行》杂志上的平内尔的论文[1]。平内尔提出，当时，格文涅尔这位人物，在德国帝国议会上宣传制定石油专卖法案，并对此做了评论。如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第五章里详细叙述的，当时的情况是：同美国石油资本竞争失败了的德国垄断组织，要求实行能源部门（石油和电力等）的国有化，以此作为同美国资本进行竞争的手段，它以诉诸德国国民爱国心的形式，主张救济同美国资本竞争失败了的德国垄断组织的破产[2]。由国家有偿收买因大危机等濒于破产的重要工业，借此救济垄断组织破产的方法，其当然的结果就是意味着用国民的赋税救济垄断组织的破产。

平内尔指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们说什么，工业转化为国有化和专卖事业，使国民消费增加，使国家分到企业家一部分利润，实际上都是可笑的空谈。他严厉地指出，这“不过是为了用国家的钱来振兴要破产的私营工业罢了”。在平内尔看来，电力和石油的国有公司化和专卖事业化，是受“国家监督的私人垄断”[3]，国有和专卖只是一个名义，而垄断在斗争和竞争过程中既可以成为私人垄断，也可以成为国家垄断。列宁在《帝国主义论》

中，引用了这个主要内容；并予以评论说："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得不作出这种宝贵的供认。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在金融资本时代，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是交错在一起的，实际上这两种垄断都不过是最大的垄断者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个别环节而已"[4]。

平内尔所使用的专卖概念，在日本说起来，就象用纸烟专卖等用语来表示的那样，在财政理论上，意味着某种生产事业营业的一部分或全部为国家和地方自治组织所垄断；意味着把纸烟销售金额的一部分，作为一种赋税缴纳给国家。这是纸烟工业通过国家垄断的营业，把一种垄断价格强加给消费者，把强行销售得到的金额的一部分作为赋税来征收，所以，显然是一直把它看作"奢侈品税"的一种。专卖事业则是国家垄断某种生产事业以征收赋税的手段。

但是，这里平内尔阐述的专卖，同列宁评价的专卖，虽是同一个专卖，意义上却有很大不同。石油和电力专卖，不但不能通过征收赋税使国库受惠，反而成了国家使用从国民那里征收来的赋税去救济私人垄断组织的破产，所以很明显，这不是征收赋税，而是"补贴"。

因此，专卖失去了征收赋税的本来意义，转化成它的对立物即赋税补贴，把转化成对立物的专卖换成日语时，则译为国家垄断，原词都是Staatsmonopol。

这样一来，赋税补贴数量规模扩大了，而私人垄断或金融资本如果对于公款的支配日益增多，国家垄断形式当然就要比私人垄断形式占据优势了。这就构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在量的方面，即私人垄断正在被国家垄断形式（他们都是金融资本形式）所取代的垄断资本主义。不单单从量上而是从质上把握这个取代过程，是列宁对于战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分析的一大贡献。列宁

分析了面临危机的垄断资本主义实行战时统制经济的过程，他重视即使通过“法律保障的盗窃国库行为”，推进税收的扩大，结果还是导致财政收支的不平衡和财政危机的发生、导致发行公债和物价高涨；他尤其重视在军需品的缴纳和供应的过程中，生产不单单为市场而是为国库进行的。主张这种为国库生产如果获得的利润超过公正标准，就是公开的盗窃国库[5]。换句话说，国家扩大市场，从接受订货的垄断组织来看，它就是可能估计的、可靠的市场，就是受到国家权力保障的可靠的市场，这个可靠的市场，当然要构成私人发财、获得暴利的基础。列宁着眼于上述事实，认为由国家权力保障垄断组织利润的体制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这种观点当然的归结，就是需要有保证巨额垄断利润的国家官僚机构。这种官僚机构，通过战时统制经济，用(1)资源、资金的分配制度、(2)加强强迫实行卡特尔、(3)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的办法，推动生产和消费的社会结合；同时，排他地承认垄断组织的营业自由和营业秘密，隐蔽地保证垄断组织获得生产和消费社会性发展的成果。由此看来，在列宁考察的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通过“为国库生产”，不单单是救济私人企业的破产，而是通过积极地组织为国库生产，造成合法盗窃国库的体制。组织为国库生产的形式，就是前面谈到的分配制、强迫实行卡特尔和普遍劳动义务制。私人公司转化为国有公司，也是这个为国库生产体制中的一部分。所谓国家资本，并不给国库带来盈利，而是作为从国库提取税款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它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更成为典型的形态。对于这种形态，列宁并没有进行明确的分析。如果进一步地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中的国家垄断，不仅是用税收来救济破产的国有公司这个概念，而且好象还包含通过为国库生产以垄断税收的使用和增加官

僚式的排他性的巨额利润这两种意义在内[6]。

大家知道，以美国为典型的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拥有巨型产业军事混合体代表的“为国库生产”体制（当今，它受到官僚在研究开发、资源分配、产业军事合作、国家资本输出、劳动力流动政策、地区开发政策、教育政策等多方面的支持）和无数的政府出资公司，特别是拥有官民混合体制对“社会资本”的投资制度。可以说当今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是由官僚机构支持的通过“为国库生产”和“为救济破产和开发服务的政府出资法人”，动员税收和公的信用以及由政府金融机构和社会保险集中资金的制度。

但是，正如岛恭彦指出的那样，列宁分析的俄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具有“浓厚的战时色彩”，象今天这样的“为国库生产同“为市场生产”并存和政府出资法人（比起仅仅是独立的个别资本来，它具有由不断提取税收、公的信用和通货膨胀支撑的特殊性质），还没有成为考察的中心。其次，如果从今天来看，那时，地区开发和地区自治组织问题的研究也很落后，对于它们的考察都是留在第二次大战后才进行的。

尽管有这样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列宁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还是明确地指出了方向，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通过工农兵苏维埃，与揭露盗窃国库行为的同时，实行为国库生产体制、废除国有公司的商业秘密，并由下级公职人员和居民负责记账和统制，以及限制垄新，直到使官僚机构瓦解，而由一般公职人员和居民管理和监督从事专门职务的公职人员，从而把权力集中到工人和苏维埃，以实行大多数人统治[7]。列宁明确地指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方面由于为国库生产的体制和国有公司的发展，使根据完备的簿记和统计进行民主管理社会的物质基础成熟起来；与此同时，另一方面，把公务还原为记账和检查，通过

发展教育制度使一切居民终于可以轮流地参加公务，把管理社会的职能收回自己的手中，创造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基础。列宁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历史地位的规定，对于以后的研究，也有很大影响。

注　　释：

1.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 第73 172、175页。

2. 费·平内尔：《冯·格文涅尔先生的煤油垄断》，载《银行》杂志1912年第2期第1036页；《煤油战略》，第629页。参阅池上惇：《国家垄断的基础概念》（载池上惇所著《现代资本主义财政论》一书）。

3. 池上惇所著前书，第50页。

4.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中文版第793页。

5. 请看后面第四章第2节引用列宁的论述。

6. 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载《列宁选集》第3卷中文版第146页。

7.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3章第2节、第3节。

第二章　布哈林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论

前　　言

1920年，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出版了[1]。这本书使用了与列宁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概念稍有不同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这一表述。从我们已经做过的考察可以明了，这个概念与其说源自列宁论述的“为国库生产”问题，莫如说它作为“国营公司”，作为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的交错，是在平内尔的专卖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到了1929年，以Б·鲍里林为首的苏联经济学家对布哈林理论进行批判之时，这个“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概念受到了最为严厉的指责[2]。指责的根据是：布哈林的这个概念，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特别是与希法亭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具有相同的性质，它是含而不露地支持那种否认在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存在情况下存在竞争和无政府状态这种观点的。但是，应当注意的事实是，鲍里林等人的这种批判是在1929年进行的，而布哈林的著作是1920年出版的，此间实际上已经经过了接近十年的岁月。而且更为难以想象的问题是，列宁在布哈林的这一著作出版后曾经写了评论。评论虽然认为这部著作有许多缺点，但其结论仍然承认它的积极意义，说它是一部“辉煌的作品”[3]。尽管如此，批判者仍然只把评论中“列宁批判布哈林”的内容抽出来，作为批判布哈林的论据。大家知道，布哈林于1915年发表了《世界经济与帝国主

义》[1]，序言是列宁写的。列宁死后，布哈林是与斯大林并列的苏联领导人，是担任过联共和共产国际重要职务的人物。1928年以右倾错误为由被革职，翌年，作了自我批判后复职；1937年再次被打倒，翌年，被加上托洛茨基派罪名处决。从这样的经过来看，于1929年追溯到十年前的著作批判布哈林的理论，并把它同希法亭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结合在一起进行责难，是有些牵强附会的作法，难免使人觉得这是一场有些不讲道理的论争。如果硬要探索法希亭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在经济理论上的根源，虽然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头一个十年，但它作为概念确立下来，却是在1926—1927年（社会民主党基尔大会）。而苏联的鲍里林等人，作为对于发生在德国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的批判活动的一个环节重新提出布哈林十年前的理论，企图以此论证布哈林与希法亭具有共同性。而且，如果布哈林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概念与希法亭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概念是同一的，那末，在这个概念问题上只能说布哈林反而走在了前面。

尽管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在这里还是要研究“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概念，这是因为我们认为，下面将要看到，这个概念既是一个区别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的概念，同时也是可以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区别开来的一个折衷的概念。当我们规定当今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垄断与国家的混合，以及国家主权在世界市场上的交错时，这个概念也包含着对于值得予以一定考虑的各种现象进行说明的线索。与此同时，它也包含着一定的对于自由竞争、垄断和国家之间的联系的不够充分的理解，但它还可以成为正确地阐明这种联系的线索。

注　释：

1. 尼古拉·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一部分　转化过程的

一般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

2. Б·鲍里林：《列宁论〈过渡时期经济学〉》，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Ⅱ1929年2月—12月第6册。

3.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65页。

4. 尼古拉·布哈林：《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1915年。

Ⅰ 金融资本与“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

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出版的五年前，出版了题为《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的小册子（附有列宁的序言），在这里，已经谈到了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因此，我们首先根据布哈林1915年的著作讨论一下产生这个概念的根据。

一般认为，布哈林的这部著作主要依据的先驱性的著作是希法亭的《金融资本》（1919年）。

“愈来愈多的工业资本不属于运用工业资本的工业家了。工业家只有通过银行才能支配资本，对于工业家来说，银行就是这种资本的所有者。另一方面，银行也只好把自己愈来愈多的资本固定在工业中。因此，银行愈来愈变成工业资本家。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变成了工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我把它叫作金融资本。”[1]

以上是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阐述金融资本定义的一段话，列宁在《帝国主义论》里指出：“这个定义不完全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指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即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就会造成垄断，而且已经造成了垄断。”[2]布哈林在对于各国生产集中作了分析之后引用了希法亭的这个定义，

也谈到了银行集中，然后，深入到国营企业和地方公共企业的作用上，列举了德国采煤业、铁路、邮政、电讯、林业、水道、煤气、电力工业、国立银行等事例，他说：

“以这样明显的规模组织起来的这种制度的一切部分——卡特尔、银行和国营企业，处于相互之间不间断的混合过程。这个过程随着资本主义集中的发展而加快其速度。而卡特尔和康采恩的形成又立即造成了贷款给企业的银行的共同利害关系。银行则对于接受它贷款的企业之间停止进行竞争一事深加关注。同样，银行的任何合作也都会促进工业集团间的结合。最后，国营企业也日益增加其对于大金融集团和工业集团的依存程度，反过来也是一样。这样一来，集中和组织化过程的各个方面，互相刺激，遂创造出一种非常强烈的趋势，使整个国民经济在大金融寡头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下，转变成巨大的结合企业，从而转变成垄断国民市场的、高度的非资本主义形态生产组织化的前提的一种经济”[3]。

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布哈林使用了“卡特尔、银行、国营企业”“混合”这个概念，所以，与希法亭认为金融资本就是工业与银行实现了一体化相对而言，布哈林是把混合概念作为工业、银行、国营企业以及国家领导实现了一体化而使用的。如果可以用布哈林的这个概念表述“金融资本和国家混合”，那末，他确实是从“金融资本和国家融合”这个意义上把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的。

那末，布哈林是从“克服无政府状态，消灭自由竞争”这个意义上使用“混合”概念的？还是认为尽管“混合”，但依然保留着作为资本主义一般基础的竞争形式的框框呢？判断这个问题，接着就势必影响到对于“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概念的评价。还有，比较一下布哈林的“混合”概念同列宁的这个概念，是一项

有意思的工作。为此，就要首先考察一下布哈林是怎样把“混合”概念发展成“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

布哈林在研究了资本集中形态之后说：

“集中过程的最初形态，是个人企业的资本集中。这种形态，直到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还占统治地位。这种场合，社会资本的积累，表现为作为竞争者互相对立的个人企业资本的积累。股份公司的发展，便利用多数个人企业家的资本成为可能，从而根本上推翻了个人企业的原则。同时，股份公司的发展还创造了强大的垄断式的企业家联合的必要条件。这种场合，资本集中采取了另一种形态，即托拉斯的集中。资本积累已经不再增加个人生产者的资本，而成为增加企业家联合资本的手段。积累的速度在异常地加快。远远超过资本家小集团所必要的巨大数量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进入了运动的新的循环。……各个生产部门以各种方法，结合成一个统一的高度组织起来的集合体。金融资本把整个国家捆在铁锁链上。‘国民经济’转化为一个强大的结合托拉斯，而且出资者是金融集团和国家，我们把这样的组织叫做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是更为广泛得多的社会经济领域即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4]。

布哈林按照个人企业、股份公司、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这种资本集中形态的顺序，说明了“混合”的必然性；通过把“混合”和“生产集中形态”结合起来，说明“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这种方法，同第二次大战后东德齐香所用的方法十分相似。其理论上的根据，大体上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述的内容相一致。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发表的这本书里指出，“工厂内部的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和“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矛盾的扩大，产生了危机，增强了通过小资本家的破产而实现强大的资本集中的趋势，增强了资本向股份公司形态和托拉斯以及国

有化发展的趋势。他说："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抗，要求承认它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必要性，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一切可能的限度内，愈来愈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待。"[5]

布哈林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如果是表述帝国主义时代巨大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那末，就这个概念本身的性质来说也许是不应直接受到批判，说它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或"忽视了垄断时代的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等等。但是，对于根据资本集中的形态把握金融资本与国家之间联系的方法，作进一步的考察时，不能否认这种方法也有一定的界限，如果忽视这个界限，就存在着得出极端的结论或模棱两可的结论的可能性。

认真地考虑一下，资本集中的形态，是在某种工业部门——恩格斯提出的例子是碱生产等——的集中形态，这个概念不能直接说明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与自由竞争一般基础之间的联系；其次，它也不是表述垄断组织统治的钢铁、煤炭等工业部门与残存着自由竞争的有关加工部门之间关系的概念。因此，对于金融资本与国家混合问题，它能够分析国家资金和民间大公司资金合成一体使用的形态，但当分配和运用这些资金时，私有制、商品生产和自由竞争这些资本主义的一般基础是怎样施加影响的呢？这个概念就不能分析了。因为国家的发展，是以垄断企业和局外企业之间以及垄断企业相互间的私人竞争使社会分裂这一事态为前提的，即使税收等财政活动给予大企业等以获利的方便，但这正是以私人竞争使社会分裂为前提的，决不会排除这个基础。如果忽视对于这个基础过程的分析，就很容易认为这个概念是主张："在国内，无政府状态已被克服，出现了组织化的经济，只有国际上还保留着竞争"；也就很可能认为布哈林主张这样的图

式：国内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国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无政府状态的竞争。实际上，布哈林一方面使用过在国内市场上似乎已经不再存在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的表述。例如，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第一章里说："金融资本消灭了资本主义大国内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6]。这毕竟是他下的判断，所以列宁也在他的评注中写上："没有消灭"[7]。鲍里林也强调这一点。同时，布哈林还谈到竞争的三种类型（横的竞争，纵的竞争，联合的竞争[8]），说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不是单个企业，而是"联合制"，"无论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或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竞争，都根本没有被消灭"[9]。他即使特别强调"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这一方面，但看来他似乎反而重视竞争形态的变化（联合的竞争问题）。布哈林所说的横的竞争，意味着同企业之间的竞争，他认为在金融资本形成以前，作为市场竞争的横的竞争是最典型的形式[10]。而纵的竞争，则意味着不同种企业间的竞争，例如，钢铁资本向汽车资本出售钢板时二者之间的竞争。这种场合，并不是用降低价格的方法使竞争得到解决，而是抵制，拒绝出售，拒绝购买等直接的压力起着重要的作用。"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出现，使现代典型的纵的竞争和联合的（混合的）竞争，使使用"直接的力量的压迫的方法"[11]进行的竞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形态。布哈林总结了国内市场竞争和世界市场竞争的不同，作出如下概括：

"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从不合理的体系转变为合理的组织，从无主体的经济转变为经济的主体。这种转变是由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资产阶级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的结合造成的。同时，无论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或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竞争，都根本没有被消灭。这些现象不仅保存下来，而且通过在世界经济范围内自身的再生产而深化了。世界经济体系

同以前的国民经济体系一样，是盲目的、不合理的和‘无主体的’”。[12]

很明显，布哈林的这一结论，对于“垄断与竞争”关系的评论是功过兼半。因为这种论述，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消灭了国内竞争，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他要积极地论述金融资本时代竞争形态变化的问题。因此，以鲍里林为首的布哈林的批判者们，如果希望从争论中得出积极的结论，看来有必要下决心正确地阐明金融资本时代的竞争与以前的竞争有那些不同？而不是单单强调自由竞争和无政府状态这些一般的基础问题。把布哈林理论与列宁学说对比时，如果也以这一点为根据，则是富于建设性的。把它作为理解列宁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重要背景之一，也取决于这一点，而且它还是历来日本经济学研究中不见得搞清楚了的一个论点，对此，在下一节里再做些考察。

注　释：

1.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68页。

2. 同上。

3. 布哈林：《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见前日译本第103、104页。

4. 同上，第186、187页。

5.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3页。

6.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4页。

7.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页。

8.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6页。

9. 同上，第8页。

10. 同上，第6页。

11、12同上，第7页。

Ⅱ 垄断与竞争

布哈林把金融资本形成以前竞争的基本形态看作横的竞争，而认为转化为纵的竞争和联合的竞争是金融资本时代竞争的基本形态。列宁是怎样区别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竞争与金融资本统治时代竞争的呢？在这一点上，以鲍里林为首的布哈林的批判者们，根据列宁的观点，以强调垄断和金融资本时代自由竞争并未消灭，仍然存在垄断组织之间的竞争、垄断组织内部的竞争以及垄断组织与非垄断组织之间竞争的形式，展开了对布哈林的批判。

特别是M·乔尔森探讨了从1915年到1920年列宁对布哈林关于纲领问题的论点，作出了如下结论。他指出：列宁主张，在金融资本统治时代制定改革资本主义的纲领时，仅仅说明金融资本统治的最新特征，仅仅站在消除和改革它的立场上对它进行分析，且把叙述限制在金融资本的最新特征上，这是不够的，而应当站在消除和改革旧资本主义即自由竞争支配的资本主义的立场上进行分析，叙述应当从旧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基础开始，叙述作为它的上层建筑且从它那里产生的金融资本的特征。[1] 从收录在《列宁全集》里列宁的“材料”来看，也可以认为乔尔森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例如，根据列宁在1917年4—5月写的《修改党纲的材料》，他的主张如下：当时，由波格雷波夫、奥波科夫、索科利尼科夫组成的党纲小组，在修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时，似乎主张删去叙述资本主义的“最主要最本质的特征”部分，而把中心放在分析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上。列宁反对这种主张，他说：

“目前拟定的党纲总纲的内容是：叙述和分析资本主义这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最主要最本质的特征。这些特征并不会因帝国主义即财政资本时代的产生而根本改变。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继续，是它的最高阶段，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某些方面）的阶段。

“因此，分析了一般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再分析帝国主义，不能认为是‘机械的’。其实，帝国主义没有而且**不能**自下而上地**改造**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矛盾复杂尖锐起来，使垄断和自由竞争‘搅在一起’，而**不能消除**交换、市场、竞争、危机等等。

“帝国主义是衰朽的但还没有完全衰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但还没有死亡的资本主义。不是纯粹的垄断，而是垄断和交换、市场、竞争、危机并存，——这就是一般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的特征。

“所以，完全删去对交换、商品生产、危机等等的分析，用对帝国主义**整体**的分析来‘代替’，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整体并不存在。存在的是从竞争到垄断的**过渡**。因此，保留对交换、商品生产、危机等等的总分析，再加上对**不断增长**的垄断组织的说明，会使党纲更加正确，更能确切地反映现实。正是竞争和垄断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原则’的结合才是帝国主义的本质，正是这种结合在造成崩溃，即造成社会主义革命”。[2]

引用的文字有些长，但是这一段叙述，出色地概括了列宁的基本立场，即否认垄断组织的统一支配，重视垄断与竞争的相互关系，因此，特把整段文章抄录在这里。乔尔森举出布哈林，说他系统地展开了反对列宁这一立场的观点，并根据党的大会的会议记录等予以论证。他指出，布哈林在党的第八次大会上，提出“从纲领里删去一切说明旧资本主义事项”的提案，并引证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州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机关报《斯巴达克》第2期（1917年5月出版第1期），作为根据。

《斯巴达克》第2期说："各国的经济资产，日益变成少数大资本家阶级的共同所有，从前分裂的无组织的资本主义，正在被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所取代"。据此，乔尔森接着说：

"因此，远在社会民主党的最新的'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理论之前，这个词就已经由布哈林应用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了"。[3]

关于垄断与竞争的关系，布哈林即使设想在国内是"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但也不能因此就说他否认垄断阶段存在竞争。根据乔尔森的文章，布哈林在《斯巴达克》第1期上说：

"现在，资本家之间竞争的特征，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就现代资本家国家来说，竞争完全转移到国外竞争领域，即转移到同外国资本家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的领域"。很明显，这一段叙述并未"否认垄断阶段的竞争"，而是说"它形态的变化"。不过，他对于这种变化的说明，同从"横的竞争"转变为"纵的竞争或联合的竞争"的说明一样，是从形式上即从竞争领域从国内市场向世界市场移动上把握的。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只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在布哈林看来，垄断与竞争的关系，是竞争发挥作用的领域发生了从国内市场到世界市场的变化，而忽视了在国内市场本身内部的垄断与竞争的关系和在世界市场本身内部垄断与竞争的关系。而且，既然是讨论垄断与竞争的关系，不谈到这一点，就很难得出积极的结论。只要布哈林预感到竞争的特征在垄断阶段同以前的阶段在形态上有所不同，他提出这个问题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个问题，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垄断形成以后仍然存在竞争，这正是资本主义垄断阶段固有的特征。

但是，布哈林论述竞争与垄断相互关系时，却以在国内是有

组织的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上是无政府状态竞争的进一步激化的形式，把问题归结成竞争发挥作用的领域的变化。布哈林的批判者们指出，如果把这个逻辑贯彻下去，在世界市场上一旦形成垄断，就会出现可以叫做“超帝国主义”的情况，就会出现一种世界的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这是触及到布哈林理论的这个要点了吧。

那末，如果垄断就是在国内市场也不能排除竞争时，应当怎样规定垄断与竞争的相互关系呢？

在这一点上，布哈林的批判者们，根据列宁的观点，停留在一般地指出：竞争存在于垄断组织之间、存在于垄断组织内部和垄断组织与非垄断组织之间；由于竞争仍然存在，工厂内部生产的组织性与社会分工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便日益激化，危机在激化，产业部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在加剧起来。乔尔森也只是引证了我在本节开头部分摘录的列宁在《修改党纲的材料》中的主张，对于布哈林做了批判。但是，仅仅承认在垄断阶段也存在自由竞争和一般的竞争，难道能够从同前垄断阶段的自由竞争的对比上展开关于垄断与竞争相互关系的论述吗？其次，仅仅说垄断的增强加剧了工厂内部生产的组织性与社会分工的无政府状态，就只是使人看到垄断以前就已存在的工厂内部生产的组织性与社会分工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在量上的扩大。这看起来似乎未必与就国内市场来说明垄断阶段固有的竞争的特征这一课题相符合。

那末，我们就不得不再进一步地提出如下问题，即假定列宁是以不同于布哈林的形式考察了垄断阶段固有的竞争的特征时，那将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据我看来，列宁是以与布哈林完全不同的形式把握垄断阶段竞争的特征的。我认为两者的区别在于：布哈林注意于垄断阶段生产集中的形态，即卡特尔、托拉斯和国营企业等企业形态；与

此相反，列宁则把焦点放在支配他人无偿劳动的资本家是怎样占有生产集中和生产社会化发展的成果的，并因而使少数资本家统治范围扩大下去的。也就是说，布哈林注意的是企业形态即资本关系的现象形态，而列宁注意的是在企业形态背后的“通过推动生产社会化而占有他人无偿劳动的关系”即资本关系的本质。如，在《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中，列宁对布哈林给阶级下定义的地方，写了评注，二者的对比如下：

布哈林说：“……阶级首先是在生产过程中被共同的条件、共同的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在分配过程方面的全部后果联结起来的人们的集团”。

列宁的评注：“阶级首先是以在社会生产机构中地位不同，某个集团可以把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攫为己有这一点上相区别的‘人们的集团’”[4]。

只就这里的叙述来说，布哈林的阶级定义是把共同利益集团这种特征推及到一般，而列宁的评注，显然是要把某些人们对他人劳动的支配关系引进阶级的定义上。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商品生产和私有制作为全部经济的基础的，因此，如果某些人们企图在这个全部经济的基础上加强其对于他人劳动的支配，一方面就要在生产领域集体地雇用他人；另一方面，在生活领域则要迫使“他人”不断地丧失生活资料，去工厂等处寻找职业，同时，势必想方设法使商品货币关系全面地渗透到生活方面，为资本扩大市场。得以在劳动场所支配“他人劳动”的根据在于，生产资料私有的人们，把科学技术成果引进生产场所，组织机器与工人之间的竞争，高效率地攫取剩余价值。而处于与机器竞争状态下的工人，在生活领域里经常作为相对过剩人口，连生活资料也要由资本家阶级进行支配，地区的“安定的生活”不能得到保证。这种情况，将起到通过对于生活领域的支配以补充对劳动场所支配的

作用。在生活领域贯彻资本支配的形式有：第一，使劳动者脱离土地的所有和占有；第二，剥夺在家庭内自由劳动的余地，吸引妇女、儿童走上工厂等地，摧毁家庭存在的基础；第三，终于使夫妇分居，破坏了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导致性的、道德的败和。然而，劳动者从土地的所有和占有获得了的自由，使自然经缺退，劳动者的一切生活资料——衣、食、住——都作为商不得不向资本主义购买；于是，资本的市场扩大了，交通、流通、金融等业务也扩大了，劳动者的生活也不得不与支付和保存货币密切地连接起来。大工业的革命作用，剥夺了保育、家务劳动以及孩子游戏等过去属于家庭内的自由劳动，使其转变为工厂内部的劳动和妇女、童工的劳动。这种革命作用不得不创造出社会分工的一个分支，即保育、裁缝、食堂、学校教育、图书馆、医疗等业务。这就扩大了资本活动的范围，即扩大了服装、食品、制药等加工业务，发展了教育、出版、文化事业，使其成为社会内的一大产业。

其次，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解体，前所未有地加大了劳动者的流动性，促进了交通、通讯机构的发展，促进了通称大众娱乐的大型旅游业的发展，前所未有地扩大了资本的活动范围。

简言之，在劳动方面科学技术的应用，生活方面商品货币关系的扩大，可以说是扩大对于他人无偿劳动支配权的两个重点（如果看一下列宁为准备《帝国主义论》而写的笔记，不难发现他仔细研究这些现象的痕迹。但对于这一点进行详细的讨论，不属于这里的任务）。

列宁写的《帝国主义论》，正如他在序言里谈到的那样，由于是“考虑到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而写的”，因而在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则做了“最必要的补充”。我们注意一下这个补充中特别是相当于阶级关系即支配他人无偿劳动关系分析的部分，就可

以看到，为了说明帝国主义战争的阶级性质，他指出：由于世界铁路的分割（1890年和1913年）、铁路网的建设和经营，“资本主义的线索象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把它变成对“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5] 当同托拉斯、银行，同钢铁、煤炭垄断组织等联系在一起的铁路，把‘分散’的企业联系起来时，各国金融资本的中心部门当然就可能通过“无数的密网”、“环视”国内和国际规模的社会内部的分工了。例如，金融资本就可能估计全世界的资源蕴藏量；就可以预测由于科学技术的共同开发而出现的新技术；预测全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的销售额；就可以掌握大公司控制的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就可以计算农产品供求的平衡[6]。

在私有制和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这种计算的可能性，是与少数大企业的营业秘密和营业自由联系着的，所以它不能成为整个社会有计划的经营和“组织性”的基础。但是，少数大资本如果把这种计算和营业秘密合为一体，使其成为赢利的新源泉时，当然就会出现与自由竞争时代的竞争方法性质不同的竞争。所以并不存在可以环视整个社会分工的拥有特权的工业和银行。但在列宁撰写《帝国主义论》的时代，以钢铁、煤炭为首的几个工业部门，已经形成垄断，企业的数目减少，容易缔结协定（卡特尔），而且通过技术开发和技术的联系作用产生了企业的联合制（康平纳）。结果，在钢铁、煤炭部门产生了占据特权地位的工业，它们在购买原料、雇用劳动力、技术开发、销售商品时，便可能收集有关工业和中小企业的情报和统计，做出计算和预测来。而大银行一旦参加信贷活动，就更加扩大了这个情报网。铁路以及电力工业再参加这种活动，则有关地区工业、居民、能源、土地等的情报，就成为更加包括一切的了。作为计算的可能性如此增大

的背景，有下述事实：重要工业的集中，即由钢铁、煤炭、电机、石油、铁路、银行中的少数或单个企业对于科学、技术、固定资本、动力、劳动力、资金和市场等的支配，“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一切可能的限度内，愈来愈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待。”[7] 就这个意义来说，在特定的工业部门，排除竞争，排除独立的竞争性的私人企业，提高工厂内部、企业内部的组织性，则成为保障社会内部分工中的特定工业的特权地位和创造出“计算的可能性”的根据。布哈林所强调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组织性，是一个表述存在于这种“计算的可能性”背后的生产社会化的概念，是设想着一切工业部门都完全排除了竞争性企业这样一种极端的状况的。理论上设想虽然是可能的，但在现实中存在的是垄断占统治地位的产业，有的如钢铁、煤炭那样发展得不平衡，而对于垄断力量不强的产业部门拥有统治力；有的如铁路垄断组织，对于尚未实现垄断的农业和其他局外企业拥有统治力。因此，实际上垄断是不能在一切产业部门都排除竞争，形成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因此，布哈林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形成的逻辑如果说的是排除了国内市场的竞争，那末，他就是把适用于一个产业内部形成垄断的逻辑错误地应用到国内整个产业上了。而列宁是把一个产业内部形成垄断的逻辑同在国内整个产业中竞争的新特征加以区别的，这一点才是区别列宁与布哈林垄断理论的分水岭。

如此看来，不能把布哈林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概念与希法亭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等量齐观。布哈林的概念虽有一定的限度和界限，但还是企图分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方面即国家资本新特征的概念。布哈林也写了列宁谈到的“为国库生产”的问题，但在这里却有片面强调军事生产对于生产力的消耗和破坏方面的地方；还可以看到他关于城市与农村、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特征做出的个别的饶有兴趣的论述，但从今天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展开的领域来看，难免受到时代的限制。由于围绕布哈林进行的争论，对于日本的哲学、技术理论、经济学方法论和再生产理论等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有待于今后予以说明的问题很多，但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概念有关因而必须提出的问题，则如上述。

注　　释：

1. M·乔尔森：《垄断资本主义，还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Ⅱ，1929年第6期第807页。

2. 列宁：《修改党纲的材料》，《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431—432页。

3. M·乔尔森所著前书第812页。

4.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木原正雄译大月书店1974年版第77页。

5. 列宁：《帝国主义论》，《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733页。

6. 列宁："从前是各个业主自由竞争，他们是分散的，彼此毫不了解，他们进行生产都是为了在情况不明的市场上去销售，现在就完全不同了。集中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可以对本国的，甚至象下边所说的，对许多国家以至全世界所有的原料来源（例如铁矿产地）作出大致的估计。现在不但进行这样的估计，而且这些来源完全操纵在一些大垄断同盟的手里。这些同盟对市场的容量也进行大致的估计，并且根据协定来'瓜分'这些市场。"（《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748页。）

7.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卷第317页。

第三章 关于希法亭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前 言

六十年代初，日本展开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争论，那时守屋典郎谈到了希法亭。他把德国式的现代资本主义和英国式的现代资本主义作了对比，同时也把第一次大战后国家与垄断资本的结合松驰了的英国，和改变了形式继续推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德国作了对比；指出，丧失了殖民地、面临最严重政治经济危机的德国，如果没有包含金融、财政、国有化和工会“参加”在内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不能渡过这种局面。他认为希法亭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就是渡过这种危机的意识形态。[1]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宇野弘藏早在战争结束后不久的1946年，就使用了“资本主义组织化”的概念。他认为，第二次大战后组织化的特征是应付失业和农业危机，因为这类问题，用区别于法西斯主义的民主主义的组织化，用金融资本的组织化原则不能解决[2]。第二次大战后的日本，在一定的意义上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难怪希法亭的影子总是在日本徘徊。因此，搞清楚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的含义和局限性，便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另一方面，在法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研究中，出现了

“经济的民主”的概念，但与希法亭的这一概念的意义不同，并于七十年代初在日本开始普及。本章对于希法亭的经济的民主这个概念的局限性也进行一定的讨论，力求为今后的研究找出头绪来。[3]

注　释：

1. 守屋典郎：《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于其历史和论争史的考察》（《日本经济分析》第2卷，大月书店1959年），第82页。评论这篇论文的有：古爝义和：《谈日本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经济评论》1960年7月号）第19页。

2. 宇野弘藏：《资本主义组织化与民主》（《世界》1946年5月号）。

3. 参阅向井喜典、池上惇、成濑龙夫编《现代福利经济论》，青木书店1977年版末章。

I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与经济民主

随着战争经济的历程而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产生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还是产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不断地被提了出来。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每每是与一种进化论的社会观结合在一起发展而来的。这种社会观认为，社会本身具有缓和社会分裂和对立特别是缓和阶级对立、组织和统一社会内部对立状态的力量。我们在讨论井汲卓一的观点时已经说过，认为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能够缓和阶级对立的观点，总是一种包含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货币权力和官僚机构的错误评价在内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希法亭认为，国家对于货币制度的统制，可以有意识有目的地代替黄金的货币作用[1]；认为资本主义的组织性，就是扩大有意识地统制的范围。希法亭是第一个规定有组织的

资本主义概念的人[2]。关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定义，他说：

“战争和战争后期，在经济上意味着资本集中趋势的异常发展，强有力地推动了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发展，从而宣告自由竞争时代的终结。大型垄断组织愈是发展成经济的绝对的统治者，它同集中了社会资本、自由地操纵经济的银行也就愈是密切地结合起来。从前分散的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则向着以金融资本形态统一起来的方向发展。这意味着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过渡。”[3]（着重点为引用者所加）

这个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造成了大企业劳动过程的社会化和工业部门之间的密切关系，随着有意识地统制经济范围的扩大，通过由托拉斯有计划地分配新的投资和对于高涨阶段固定资本更新的控制，通过大银行的信用统制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等等，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稳定程度得到缓和，至少也使波及到工人的不稳定的影响得到缓和[4]。

希法亭主张，有意识地统制经济的范围的扩大，意味着统制和被统制、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即金字塔式的阶层关系变成了中心；意味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那样的无政府状态的相互竞争的关系，已经不再占统治地位了。在这个金字塔式的阶层制度的社会里，如果危机缓和了，经济的稳定程度提高了，那末社会上劳资对立关系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希法亭说：“在这样按金字塔式阶层制度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关系也同时受到修正，它将继续具有更加稳固的性质，失业几乎不再构成威胁，即使失业了，失业保险也会使其缓和。”[5]

其次，希法亭还提出一个与失业保险并列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特征，这就是由于“经营组织化的科学方法的引进，工人群众的分工和专业化在发展，工人群众将由与国家公务员性质类似的“属于被划分为不同等级层的职员”[6]所构成。再加上他考虑

到当时美国出现的科学管理方法正在全世界推广，生产管理参谋班子的确立，工作岗位组织机构的改组，伴随专职制度而来的职务级别和分工新体系的普及等等，以及他着眼于与国家公务员和一般职员作用提高的同时出现的劳动力构成的变化，都是引人注意的。[7]

再次，希法亭提出了社会改良问题，把它作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第三个特征。他谈到了老年、伤残军人和失业的保险，以及由于劳动时间的缩短而形成的工人待遇相对的良好，等等；说这些都是使工人群众维持保守作用的东西，都是力图使工人阶级适应这种经济体制的东西[8]。希法亭对社会改良是这样评价的：他不认为社会改良是扩大工人阶级生活时间、使他们从单单谋生存的愿望产生了作为人的发展的愿望的一种积极的契机；反而认为社会改良是使工人阶层保守化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把工人阶层摆到了属于资本主义体制内部力量这种地位之上[9]。

总之，希法亭认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稳定了经济，减少了失业的威胁。通过职务级别的组成使工人群众职员化或脑力劳动者化；通过社会改良使工人生活组织化和“体制内化”，从而带来了“劳资关系”的稳定局面。所以他认为，由战争经济带来的生产力的进步和卡特尔、托拉斯发展的结果，并未导致社会分裂和阶级对立规模的扩大，反而使社会实现了稳定和统一，缓和了阶级的对立。这不是说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内部不再有对立了，而是比起在所有制问题上的阶级对立来，希法亭更加重视统治与被统治这种阶层式的上下关系的结果。[10]如果把这一点作为前提，就没有必要认为围绕所有制的权力问题是克服社会分裂和对立的关键了。他基本上认为阶级对立已经缓和了，就是说认为围绕所有制的对立已经不再使社会分裂和解体了，只要把上下的统治关系变成“民主”的关系就可以了。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认为，由金融资本组织起来的经济组织是社会的核心组织，主张与其说保险制度、信用制度、统制企业的机构等等是国家政权组织，莫不说它们显示了经济组织的优越性，是国家组织转化为经济组织。因此，阶级斗争特别是围绕所有制和政权的斗争的重要性隐而不现了，只有经济组织的民主化才是克服阶层统治的上下对立、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在希法亭看来，这就是所谓“从科学社会主义”向“建设性的社会主义”[11]的过渡。“经济的民主”[12]这个概念，便作为一个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不可分离的概念而出现。

必须充分地注意，这里所说的“经济民主”概念，同最近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研究中所使用的“经济民主”，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13]。当代日本使用这个概念时，它意味着：由居民自治和民主运动的力量对垄断组织和官僚机构进行限制，对它们的营业自由与营业和行政秘密进行限制，并由多数人向少数人进行民主的限制；意味着它是去掉少数人私有制弊端的关键。它还意味着，在对于实际存在的垄断物价、通货膨胀和贪污渎职正在日益促使社会分裂和对立这种实际情况认识的基础上，站在承担社会生产力的大多数人的立场上，为消除大多数人同凭借私人占有财富而获得利益的少数人之间的矛盾而进行的一种努力。这就当然要区分两种不同的经济民主了，一个是承认社会分裂为阶级，对于货币权力和官僚机构的实际情况有了充分认识的经济民主；另一个是基本上否认社会分裂为阶级，对有意识地统制货币和扩大有意识统制的范围持乐观态度的经济民主理论。

那末，希法亭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对于国家与经济或官僚机构与金融资本的关系，是怎样理解的呢？

在上述经济民主理论看来，承担生产任务的生产者在有组织

的资本主义内部，势必起极大的作用。他们为了实现阶层社会上下关系的民主化，就必须依靠“加强其对于指挥生产的关注”[14]，而不是依靠阶级斗争，这就必须提高他们能够分担生产任务的能力。这样一来，受教育的机会均等；使人人得以平等发挥能力的选择职业机会的平等[15]；不是提出空论，而是作为生产政策的执行者对于政策提出有效的建议的能力的培养，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希法亭认为，战争经济不仅仅促进了国家与大垄断组织的结合，还造成了没有被统治者、工人和工会的合作，就不可能进行战争和生产的状态，从而显著地提高了他们承担责任的能力。“国家被迫同生产者进行协商，强制对于目的的实现并无效果，国家需要生产者组织的自主的合作。”[16]

与生产者组织特别是工会对于国家的作用增大相并列，希法亭强调，在战时和战后，“职员阶层、工程师、政府和民间的工作人员”数量的增加及其作用的重要[17]。给人们的印象是，垄断与国家的混合，加强了官僚制的独立性，加强了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中其重要性日益增长着的官僚阶层的作用，而不是加强了私有制的力量。与工会作用的增大相对比，战争经济因粮食不足等的结果，扩大了克服农业危机和使小生产保留下来的可能性，这就反而扩大了工业和农业生产力的差距[18]。通过农业革命以扩大工业产品市场，对于组织化的经济来说，其重要性将会与日俱增。

上述希法亭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是对于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关系所做的颇为大胆的规定。它把下述过程作为经济的民主，与变革体制的理论结合起来。这个过程就是，在经济方面金融资本的阶层式的上下统治体制，把国家和工会纳于其体制之中，以及由生产者组织使政府和民间的官僚制民主化。希法亭的这个理论，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由于认为资本集中的过程，是实现经济稳定和劳资关系稳定的过程，因而预料围绕私有制的阶级对立将会缓和而不会激化；

第二，由于把保险制度、社会政策、缩短劳动时间等社会改良措施，同工人阶层的保守性结合起来，因而从这里也预料阶级对立等将会缓和而不会激化；

第三，认为由于战争经济，由于按照科学管理方法组成工人阶级的等级制，官僚制在公私两部门的发展以及生产者组织作用的增大，将使社会由按阶级组成转变为按等级制、官僚制来组成。他重视的是阶层的上下统治关系，而不是阶级对立的激化；

第四，根据使这种统治关系民主化的经济民主，提出实行"建设性的社会主义"的意见。

而且，希法亭的这种分析，一贯是以"生产者组织"具体地说是以工会问题为中心的，仅就这篇卷首论文来说，他的研究就缺少居民的地区性划分与全国规模的工会的组织性和集中性之间联系的部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自治体政策本身是一项值得讨论的课题，这里姑且不谈）[19]。另一方面，众所周知，战后日本关于自治体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造成的中央集权化的倾向，同拥有全国中心的工会，同各种自治团体的组成以及以这些地区组织为基础的地区自治体的联合，同在地方自治体确立民主主义的愿望等等不断地结合起来。工厂工人总是居民运动的中坚力量。因此，针对国家权力机构集中化的倾向（特别是针对压制地方自治和"转包工化"的倾向），集中于全国性的自治团体的力量同各自地区组织的地方自治力量双方结合起来，对于国家政权内部的公务活动（下级公务员、专家和议员等），开始施加巨大的影响。他们企图对属于集权式国家政权中枢部门的特权官僚阶层，对于作为货币运动中心的大银行的资金流动，对于大企业的财源

和人事进行民主的控制[20]。希法亭的理论构成，作为分析这种多层次的社会关系和权力问题的方法，是不适当的；可以说，这种理论构成，很难以分析国家和垄断组织对于地区的统治为媒介，实现其对于整个社会的分析。

希法亭所以建立了这样的理论结构，看来与这个问题有密切的关系：他虽然是一个“社会改良主义者”，但对于改良的评价却又很低，只认为改良仅仅会导致工人阶层的“体制内化”。他全然没有这样的认识：在大企业和官僚组织的“外部”出现的全国性的工会和自治组织，通过民主法律的制定并同维持地方自治的力量联合起来，以提高居民欲望的水平，使他们把自己的单单是谋生的欲望提高到高度文化的欲望和实现本身发展的欲望；这些组织同国家政权内部的公务劳动相配合，增强了同大企业和特权官僚对立的独立力量。勿宁说希法亭观点的特点是，他认为因社会改良而实现了“体制内化”的工人，已经不能离开企业和官僚的力量而独立，只有在其内部才拥有实力。就这个意义说，希法亭是一个“失败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者。本来，由于社会内部的对立特别是地区的民主力量和以全国规模集中起来的居民民主力量的存在，改良措施势必把社会内部的对立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上。六十年代后期，日本资本主义出现的这种特点，看来给评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争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继承由法国提出的、扎根于日本的经济民主概念，不消说是同对于改良的积极评价结合在一起的。

因此，根据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的立场，评价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时，就要：

第一，论证资本集中的过程并未使劳资关系得到稳定，而是使社会出现更大规模的分裂和对立，加剧了劳资关系的紧张程度；

第二，论证对社会改良不能作消极的评价，不能说它仅仅导致工人阶级的“体制内化”；论证改良激发了人们从谋生的欲望发展到享有高度文化的欲望，这反而促进了社会内部的对立；

第三，论证工人群众按等级组织起来，并不能取代阶级对立，只不过意味着作为阶级对立进一步发展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和对立的发展；

第四，必须通过对于国家政权这个少数人私有制的保卫者的作用的单独分析，通过对于垄断组织的发展与国家政权的发展这二者存在着互相联系的论证，批判“把国家政权与地区割裂开来，使它湮灭在经济方面的金字塔式阶层制度中的论调”。

但是，历来国际上关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问题的争论，虽然对于上述第一个论点根据事实积极地进行了批驳，但对第二及其它论点却不见得进行了充分的批驳，勿宁说倒是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唱着一个调子，片面地强调国家与垄断的混合方面，而对资本集中与国家政权独自的运动规律之间的关系，则不能积极地讨论，这种情况甚至可以说在多数场合里都是如此。这也是使争论重新出现的消极的原因之一。例如，三十年代批判了希法亭等人社会改良主义的瓦尔加，他举出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的观点有：竞争消灭了，经济实现了计划化，危机消除了，国家作为权力机构与其说驾于社会之上不如说进入了社会内部，根据经济民主原则领导经济和对剩余价值进行再分配，由国联维持国际和平（其根据是国际卡特尔），超帝国主义，等等。[21]

瓦尔加的这种见解，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具有的阶级协调的性质，但不能说它勾划出一种轮廓，能够对于前面提出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的四项基本特征分别地做出了确切的研究。因此，瓦尔加在积极地进行批判时，也只停留在确认这样一些观点上：垄断的加强使竞争和无政府状态更激烈了，带来

了技术的进步以及工业和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使社会内部阶级对立进一步尖锐化。瓦尔加说："由于垄断组织的形成而减少了互相斗争的各个资本主义企业的数目……，相反地，却使垄断企业与未组织起来的小资本家群众之间的对立尖锐起来……；还使社会消费力与合理化的垄断企业生产能力之间的矛盾，使生产可能性与价值增殖可能性之间的矛盾，使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结果，整个工人阶级群众与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日益尖锐，从而可能导致即使不发生对外战争也很紧迫的革命形势的形成和资产阶级的垮台。"[22]

其次，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哈林认为，竞争在国际范围上不但未被排除反而激化，而在国内则被排除，形成了国家与托拉斯混合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瓦尔加评价这种看法是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的妥协。[23]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1929年的大危机，三十年代的长期萧条和第二次大战的开始，是根据如下事实发生的：垄断组织的加强，无论在国内或在国际上都以空前的规模加剧了资本之间的竞争，不但未排除危机和实现稳定，反而使失业、不稳定和国际上的对立加剧起来。因此，瓦尔加肯定的基本观点和《世界经济年报》等刊物上的丰富的实证资料，使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丧失了它的影响。这是根据第一次争论的事实得出的结论。

注　释：

1. 希法亭：《金融资本》第Ⅱ章。玉野井、石垣译：《希法亭〈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法政大学出版局1955年。

2. 日本关于希法亭的研究史和文献，见细川元雄：《关于特殊文献汇编的问题——与希法亭文献目录汇编有关的问题》（《经济资料研究》第3期1970年9月）。

3．希法亭：《时代问题》，载《社会》杂志第1卷1924年第2页。据上述细川的看法，这篇论文阐述了后来在1927年基尔大会上作为党的理论被公认的观点，即“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参阅W·戈特沙尔希：《希法亭》，日文本译者为保住、西尾、弥涅耳瓦书房1973年版第5章。

4、5、6．希法亭所著前文，第2页。

7．参阅池上惇：《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计划化”和“合理化”的意义》（载池上惇：《现代日本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汐文社1972年版），第123页及以下各页。池上惇：《现代资本主义财政论》有斐阁1974年版第258页及以下各页关于M·韦伯对科学管理法评价部分的评论。

8．希法亭所著前文，第3页。

9．这一点历来未受到注意，但就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的逻辑构成非常类似主张工人阶级“体制内化”的急进主义来说，则是重要的论点之一。历来批判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的评论，都急于批判它的改良主义，而没有注意到希法亭对改良具有的积极意义评价过低，这也是导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争出现混乱的一个原因。例如，请看井汲卓一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现代理论社1971年版第68页）。他在这本书中说，我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有斐阁1965年）一书中，关于要对改良的意义做出积极评价的主张，是对“生产关系无变化论”即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私有制生产关系本质是不变的观点的修正。他没有详细地展开论述，所以他这样说法的真正含义并不明确，但我在这里仅仅指出：主张改良的积极意义，同认为资本主义下的改良在社会内部产生了更大规模的对立的观点并无任何矛盾，也同认为无论少数人依凭私有制占有财富或是由工人阶级和居民的联合造成的大多数人进行统治的条件，都比过去有了进一步发展的观点，没有任何矛盾。

10．社会学与其研究阶级对立不如研究统治问题，是G·西梅尔和M·韦伯研究统治的社会学中一贯探讨的主题，是与这样的观点联结在一起的：统治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被统治者的心理中存在着接受统治的因素。例如，阿闭吉男的《M·韦伯政治社会学的思考》（《理想》1975年2月号）。希法亭也把社会心理学作为组织科学予以重视（希法亭所著前文

第5页）。

11、12. 希法亭所著前文，第3页。

13. 池上惇：《财政危机与居民自治》青木书店1976年版第66—67页。

14. 希法亭所著前文，第3页。

15. 同上，第4页。

16. 同上，第10页。

17. 同上，第8页。

18. 同上，第8、9页。

19. 马克斯·克瓦尔克：《自治和普鲁士政府》，载《社会》杂志第1卷1924年第145页。

20. 参阅池上惇所著前书。

21. 瓦尔加：《垄断形成问题与"组织化的资本主义"学说》（经济批判会译：《世界经济年报》第7期丛文阁1930年版第52页），引文见第75页。

22. 同上，第76页。

23. 同上，第74页及以下各页。

又当时大体上与瓦尔加持相同立场批判"社会国家"观点的文章有：π·拉宾斯基：《"社会国家"的发展阶段和方面》（《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Ⅰ1928年第4期第26页）；π·列昂节夫：《"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与"经济民主"》（《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Ⅳ1929年第5期第660页）；M·乔尔森：《垄断资本主义还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Ⅲ1929年第6期第807页）；R·格贝尔：《论"和平工业"与"经济民主"》（《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Ⅲ1929年第2期第246页）。

Ⅱ 社会国家还是阶级国家？

根据已故服部英太郎的看法，希法亭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是以第一次大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存在的国家资本主义因素和趋势的发展为其

认识的基础的”[1]。诚然，希法亭在1927年5月基尔大会上的报告中，论述国家与经济的关系时，他的认识也是面向国家对于商品货币市场的干预和国家在劳动市场上的干预的。他说：“我们最近经历了谷物价格的暴涨，因此，必须向群众讲清楚，就连面包和肉类的价格再也不单单是经济价格，而且是由政治权力规定的政治价格（说得对！）；而且如果群众希望这个问题有某些改善的话，就迫切需要由他们掌握主动权，推动或支持能够由这些政治因素降低和废除经济价格的政策。”[2]

在1926年，即希法亭作这个报告的前一年，德国社会民主工会就已经表明了态度，要对于第一次大战后德国的通货膨胀政策和尔后“相对稳定时期”的“历史性的产业合理化政策”予以合作[3]。如果希法亭的上述主张，最终仅仅是表明了对于德国垄断资本克服通货膨胀政策和合理化政策予以合作的话，就必须指出，群众通过国家干预价格对阶级斗争的进一步发展来说，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的。本来，经济的民主政策，只要对于垄断资本的营业自由和营业秘密不进行干预，它就不可能奏效。因为从取得了巴黎公社和俄国革命经验以来，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了。[4]

社会化是在提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概念之前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指导思想之一。根据已故服部先生的看法，这个思想纯系“空谈”[5]，其根据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德国来说，革命后的四年里，并未出现国家化的倾向，反而坚持了脱离国家化的倾向”，而“作为魏玛宪法第156条所预见的东西，除了德国全国煤炭协议会和德国全国钾协议会以外，任何东西都没有剩下”[6]。但是，无论“社会化”思想或是代替它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与其说它们讲的是建立统制垄断组织营业自由和营业秘密的民主机构，莫如说是把重点放在工人力量超过了资本家力量这一认识上面，说这是因为工会职能扩大了，在全国或企业都由劳资双

方“共同决定”问题的结果。希法亭在我们前面引用的文章里接着说：

“而且，更为重要的新的问题，是国家在与工人阶级命运直接有关的领域，即劳动市场里的统制。由于革命的爆发，我们有了工资的保障，从而意味着这种统制可能对于劳动市场的需求与供给进行完全的限制。”[7]

根据已故服部先生的看法，工会参加政权，和“根据社会自治原则的劳资共同决定权”（魏玛宪法关于社会的原则规定），是“国家本身一方面采取推进工会的手段，另一方面又采取把工会组织到国家机构之中使其为国家目的服务的手段，以至于成为社会体制的核心”[8]。因此，上述事态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工人可能在恢复其体力的同时，提高他们作为阶级所需要的知识水平和从事社会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又是力图同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批判和反抗活动相对抗的社会政策”[9]。在这两个方面中，占据优势的是前者即通过民主改良扩大工人阶级进一步发展条件的方向呢？还是后者即工会变成权力机构的一部分，如已故服部先生指出的那样，终于转变为法西斯主义的“强迫实行工会”呢[10]？只有指出区分这二者的分界线来，才是当时最重要的课题。就说明这个分界线来说，一般认为当时有绝对重要意义的问题是：研究通过经济政策和财政手段限制垄断，研究承担限制垄断任务的公务员工作的内容，以及由包括集结在工会中的工人在内的居民对于这种工作的民主监督问题[11]。但是，无论希法亭或他的批判者们，对于这些问题都未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诚然，当时参与论战的人们都表示了对于能否通过工人和工会民主监督国家政权这一问题的关注。例如，希法亭只是强调，现代国家把它的干预范围“越过了社会政策范围”，扩展到“经济政策和领导经济的范围”[12]，他还引用英国文献为例，说文献写的不是

国家，而是政府[13]；并举出构成国家要素之一的国民本身，不遗余力地证明，国民能够通过政党左右国家。而且还强调说，马克思也强调了十小时劳动法的意义，就这一点说，他是同马克思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的[14]。批判希法亭的论者则强调，国家不过是脱离社会成员自主活动的、从社会中产生、驾于社会之上的阶级压迫的机器，并不能如实地反映社会成员的愿望。已故服部先生还根据德国的实际情况指出："不能忽视，'民主制'的德国不是别的，正是处于这一次大战后资本主义全面危机形势下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15]。坚持这一国家理论原则并且为了居民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把国家政权当作监督垄断的手段予以有效利用的条件是什么呢？谋求实施魏玛宪法中的民主条款的国民运动，同与居民对立的国家政权的各种机构的联系在于何处呢？为了研究这些问题，前面已经说过，就必须研究居民监督公务员工作所需要的具体条件。而且，即使尝试从理论上研究国家论，也必须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作为脱离社会成员自主活动的公共权力的国家的作用，同马克思在工厂法中分析的作为"社会对于资本的限制"和"有意识的反作用"，即他着重写的保卫居民权利的法律的意义之间的关系；所谓压迫机器即军队和警察的职能，同承担保护居民权利和发展任务的工厂视察员、工人教师等的职能之间的关系[16]。但是，由于当时国际论战尚未成熟，就是对于国家本质问题，也只能回到极为初步的原则上反复地展开争论。瓦尔加问题的论战，将会直截了当地揭示出其中的情况。

注　　释：

1. 服部英太郎：《德国社会政策论史2》上册，日本评论会1949年版第17页。

2. 希法亭：《社会民主党在共和国中的任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

基尔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5月）。这本小册子见《社会》杂志1927年第2分册附录。

3. 服部所著前书，第5页。

4. 参阅池上惇：《列宁与经济民主》(《财政危机与居民自治》见前)，第62页。

5. 服部所著前书，第13页。

6. 同上，第17、18页。

7. 希法亭所著前文，第6页。

8. 服部所著前书，第4页。

9. 同上，第425页。

10. 同上，第428页。

11. 参阅列宁：《实行社会主义还是揭露盗窃国库的行为？》（《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5卷第52页）。书中列宁讨论了在战争经济造成资本主义危机下面，怎样才能把居民民主地联合起来，以限制大企业的投机和不正当的利润。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各国同样面临的必须解决的共同问题。例如，在第一次大战中一跃而成为世界债权人的美国，也发生了以退伍军人为核心的取缔暴力的社会运动（参阅池上惇：《现代资本主义财政论》第113页）。

12、13、14. 希法亭所著前文，第7页、第8页。

15. 服部所著前书，第424页。

16. 池上惇：《居民的相互竞争与居民的全面发展》（《财政危机与居民自治》见前），第36页及以下各页。

第四章　瓦尔加争论中的国家和垄断

Ⅰ　总资本家的国家和垄断资本的国家

瓦尔加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的最严厉的批判者之一。1946年出版了他撰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变化》一书[1]，约一年半后，苏联科学院所属经济研究所和莫斯科大学经济学系联合召开了批判会（1947年5月），从此以后，瓦尔加就受到苏联经济学界严厉的批判。最先把这次争论向日本作了系统介绍的是平馆利雄，他指出，这次批判是当时苏联涉及经济、哲学、文化、艺术各方面的“文化清洗”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把这次瓦尔加争论的性质和结果概括为如下三点[2]：

（1）批判了瓦尔加对关于世界资本主义问题的正统观点（特别是列宁和斯大林）所持的修正主义态度；

（2）不仅是瓦尔加，他所主持的“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的所有研究和研究方法，都遭到了严厉批判，该研究所于1947年底被合并到“经济研究所”；

（3）争论的开端是如何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一般危机的特征问题。

瓦尔加的这本著作分为如下各章：①

第一章　资本主义各国战时经济中国家的决定作用

① 据吴清友译生活书店1947年10月初版中文译本分为十五章。——译者注

第二章　战时统制经济的本质及其限度

第三章　生产与资本的集中和积聚

第四章　战争时期的贫困化趋势

第五章　劳动力的问题

第六章　生产的各种问题

第七章　战争时期的分配和消费

第八章　资本主义的国际分工和对外贸易的变化

第九章　战时和战后的殖民地问题

第十章　战后时期经济循环过程的变化

第十一章　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3]

据说这是一本极为概括的书，据平馆的介绍，瓦尔加的主要论点如下：

第一，资产阶级国家在战争经济中改变了它的作用。因为国家通过自由市场机制决定生产、分配和消费问题已难维持战时统制经济，在“总体战”中，产量的决定，原料、劳动力和粮食的分配必须由国家决定，否则就不能维持社会生产力。

“简言之，作为全体资产阶级组织看待的资产阶级国家不得不企图把个别企业主及个人的私人利益强迫地服从作战的利益”[4]。这是平馆对瓦尔加上述见解的概括①。瓦尔加这个观点在争论中遭到了最严厉的批判。据平馆的介绍，批判意见认为，瓦尔加“从马克思主义的旧观点出发，说资产阶级国家代表作为阶级整体的全体资产阶级的利益”[5]。而要分析现代国家，只有斯大林的见解，即尽管存在“民主主义”的议会，但是一切资本主义政府都受各大银行控制，议会虽然确信是自己在控制着政府，可是实际结果却是大金融资本的联合组织事先确定内阁成员并控制他

① 据吴清友译本，此段是瓦尔加本人的一段概括的话。——译者注

们的行动[6]（参照《列宁主义问题》）才是正确的。可以说这样阐述国家是垄断组织的工具的观点过于片面了。而对马克思的国家论本身的研究和对国家的现代特征的具体分析，据介绍来看，批判者们并未谈到[7]。

第二，战争经济虽然促进资本集中，但战争带来了大规模的资源浪费和生产能力的消耗，因而出现的不是生产过剩而是生产不足，所以商品市场的实现困难却消除了，尽管是暂时的。因此，出现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剩时的贫困不同的贫困现象，即基于生产不足而带来的物资、粮食缺乏的贫困，因而推测这将会影响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循环[8]。这个论点被战后经济停滞论所继承，就是说认为，由于战争推迟了生产设备的更新，由于战时限制消费的储蓄统制，战后发生了“被延期的需求”，生产过剩危机未立即表面化。可是当时瓦尔加的这个论点，也受到了形式主义式的批判，说它对在商品实现问题上的无政府状态的作用估计过低等等。还批判了这个观点对生产不足以及由此而来的贫困化强调有余，而对战时经济中资本家的积累财富估计不足。

第三，主张人民民主主义经济基础是国家资本主义。战时统制经济中国家作用增强了，如果同私人利益对立的国家的上述性质发展时，那末，作为国家资本主义，把这个国家置于大多数人民支配之下，人民民主主义即可确立起来[9]。据平馆的介绍，瓦尔加在自我批判当中举出，他作出人民民主主义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其经济基础的判断的根据是，“把战时经济中工人的作用仅仅看作一种生产要素而置于阶级斗争之外的这种片面性的研究，忽视了两种制度的斗争，错误地认为在民主阵营内部这种斗争在战争时期已经‘停止了’；对人民民主主义各国农业改革的结果作出了不正确的估计等等”[10]。由此可见，瓦尔加可能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组成是很广泛的，不只是工人阶

级，连一部分资产阶级也都包括在内，这种力量掌握了作为国家与经济的结合物的战时统制经济中的国家资本主义而建立了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结果，就是说，被他这样理解的国家和经济的结合物，在产生了战时经济、国家作用起了变化的情况下，已经具有了与私人利益相对立的性质。

批判瓦尔加这个论点的人们，认为在他的分析中缺乏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他们主张，人民民主主义是一种虽然残存着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但又是在扩大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向社会主义转变中的过渡时期的经济；苏联的援助和工人阶级掌握政权是这种过渡的保证[11]。这个争论之点与第一个论点密切相关，由于对国家作用的理解不同，无疑对结论的评价也就有很大的出入。然而由于是用片面性的引经据点的方法进行的批判，在这一方面人们也当然不可能对其在理论上的进展寄予多大希望。

第四点是殖民地的变化问题。瓦尔加特别注目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英国和印度的债权债务关系发生逆转的情况而预测印度将由殖民地向半殖民地过渡。批判者们强调，仅仅靠债权债务关系的逆转，英国的殖民地统治是不会动摇的[12]。

第五点是，瓦尔加企图把资本主义一般危机下的资本主义国家引进计划化的尝试，同前述国家作用的变化结合起来研究问题；而批判者们则片面地强调无政府状态的一般性和矛盾的激化这二者之间的对立[13]。

虽然概括说来包括上述五个论点，但是瓦尔加争论的中心问题却是第一个论点，即集中于“资产阶级国家作用的变化”上，这个问题看一下瓦尔加本人于六十年代的总结就清楚了[14]。四十年代，瓦尔加起初拒不接受批判，后来还是全部接受下来并作了“自我批判”。然而，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进行了有名的斯大林批判。对斯大林历来主张的新特征以至于包括在

总危机第二阶段中资本主义生产力再也不能发展了的论点在内，都进行了积极的批判[15]。在这个新潮流中，瓦尔加又发言了，他回顾了当时的争论情况，并从自己的立场对这场争论作了总结。

注　释：

1. 这个文献关于争论点虽有多次介绍，但在日本从未翻译出版。围绕这本书的争论，曾以《关于瓦尔加理论的讨论（关于瓦尔加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的讨论）》为题，作为世界经济研究所所内资料而被译出（1948年）。此外，世界经济研究所介绍的，还有《反对有关帝国主义各种著作中的改良主义倾向》（《关于瓦尔加的自我批判》，所内研究资料1949年7月），《资本主义国家战时经济中国家的决定性作用，瓦尔加公开信，真理报3月15日》（《世界形势时报》1949年6月）。

2. 平馆利雄：《一般危机的问题——世界资本主义论争》劳动文化社1949年12月，第4页。

3. 同上，第11页。

4. 同上，第16页。

5. 同上，第76页。

6. 同上，第77页。

7. 瓦尔加本人重视包括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内的关于法国资产阶级国家的分析，注意阶级力量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可参照瓦尔加著，村田阳一、堀江正规译《资本主义经济学的问题》①岩波书店1966年第34页以下各页。又该书中所载堀江正规的评注是最概括的瓦尔加论。

8. 平馆所著前书，第79—82页。

9. 同上，第82页以下各页。

---

① 本书中文译本题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集》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译者注

10.同上，第170页以下各页。

11.同上，第83—84页，第169—170页。

12.同上，第84—88页，第165—167页。

13. 同上，第168—169页。

14. 瓦尔加所著前书中文译本第36页以下各页。

15. “应当说，认为资本主义总危机意味着完全停滞、意味着生产和技术进步的停止，这种想法（这是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的，它修正了列宁的观点——引用者注）始终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观点不相容的。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的总的腐朽趋向并不排除技术进步或者在某一个时期内出现生产增长的可能性。……”（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第11—12页）。

Ⅱ 为自由市场的生产和为国库的生产

1965年莫斯科刊行的瓦尔加的最后著作《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论文集》的序言，对这本著作的基本性质叙述如下：

“这本争论性的书，也是旨在反对不加思索的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不久前还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著作中广泛流行”[1]。并且在本书的第二篇论文《关于资产阶级国家问题》中，瓦尔加回顾了“1947年的大辩论”，又指出“今天，在有了十六年的经验并对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以后，越来越明了为什么这次讨论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主要原因在于，对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某些基本原则没有注意或注意不够。因此讨论的进行缺乏具体的历史的分析”[2]。

“序言”又对“争论”的核心即国家问题作了四点评论。

“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象我书里所说的，是整个资产阶

级的国家，还是象反对这种看法的人所说的，仅仅只是垄断资产阶级、金融寡头的国家？”[3]

瓦尔加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乍一看，似很折衷，就是“这两个论点都正确，又都不正确，视具体历史的情况而定”[4]。具体根据如下：

“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国家这一论点，一般地说不对。这种国家在‘正常’条件下，也就是说当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没有遭到真正危险的时候，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一切对外政策、经济与税收政策、甚至社会政策，都是为垄断资本的利益服务的；这种种政策的目的，在于能够按照现代技术的要求剥削工人阶级，并巩固这种剥削。甚至那些初看起来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法律，例如普及学校义务教育，实际上也是为了追求资本家的利益。因为资本家现在比以前更加需要有专门技术的工人”[5]。

“而我们所说国家是整个资产阶级利益的表达者这个论点，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存在遭到直接危险的时期是正确的。随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经常受到威胁，因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日益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重要的职能。我们可以这样提出问题：美国这个国家不惜一切手段来保护资本主义制度、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剥削关系，这难道只是为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干的吗？显然不是。很明显，希望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的是直接或间接靠剥削工人阶级而获得收入的一切阶级与阶层。在这类人中除了垄断资产阶级、非垄断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银行家、投机商与食利者以外，还有农村资产阶级（大农场主）以及一部分高薪官吏、职员、工会首领，律师等等”[6]。

瓦尔加把国家分为“正常”条件下的国家和“危机”时期的

国家。后者，因为发生了保护资本主义制度和保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问题，而成为包括垄断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体资产阶级的国家。所以作出这样的解答，是因为以承认垄断组织和国家的相对独立性为基点的，这是不错的吧[7]？视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为垄断资产阶级国家的人们（批判瓦尔加的人），反复提出国家和垄断组织是一个整体，国家从属于垄断组织，垄断组织以国家为工具的论点。就这一点来说，是把国家的相对独立性估计得太低了。如前所述，由于批判者们强调了马克思的国家论同斯大林的国家论的不同，这个观点的消极面肯定是更扩大了。瓦尔加与此相反，强调了危机愈是加深，区别于垄断组织的国家的一般性质，它的相对独立性就愈是成为问题，这的确揭示了真理的一个方面[8]。

然而，靠这样一种相对主义的说法，即在“正常”条件下国家是垄断的国家，在“危机”的条件下又是全体资产阶级的国家，对哪一方都承认它有一定的真理性这种方法论，虽然可以大体说明现象问题，可是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危机”，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再者，那种一遇到“危机”，如不能保护全体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会崩溃，垄断组织的利益也保护不了等说法也不尽然。实际上愈是遇到“危机”，由于垄断经营方面的危机也会发展，所以，政府也就愈是为少数大垄断集团谋取各种特殊的方便，这种趋势的出现是完全可以估计得到的。假如，“平时”也好，“危机”的条件下也好，把垄断组织和国家的关系问题，首先进行一般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再就它在“平时”和“危机”时期各自的表现形式分别加以论述，就可以把握了比较一般的、基本的趋势的基础上展开论述；只是对各种局面的特征分别承认其相对的真理性，恐怕问题是不会得到解决的[9]。前面已经指出，对国家论本身不作更深入的研究，不研究垄断的发展同国家的运动规律的关系问题，理论上的

进一步的展开将会是困难的。

这个问题姑且不论。关于国家问题争论中的第二点，瓦尔加说："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垄断资本的国家是否有可能在一定情况下，例如在总体战经济条件下，采取违反个别垄断组织利益的行动。我说有可能，而批判我的某些人说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10]。

瓦尔加对这个问题也同第一个问题一样，解答是有条件的，他主张资本主义处于存亡关头时，为了不被战败，垄断资本的国家就不得不反对为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妨碍战争进行的每个垄断组织，而愈加为所有垄断组织的共同利益行动[11]。据瓦尔加看来，资产阶级在剥削工人阶级剩余价值这一点上利益是一致的。可是在"分配形成利润的剩余价值"时，基于竞争的原则，就要求按力量大小分配利润。从而他认为，就整个垄断资产阶级来说，在追求以下述三点为中心的垄断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这一点上是能够取得一致的。这三点是：（1）维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2）把工资压缩到尽可能低的水平，（3）减少垄断资产阶级所承担的赋税，并把赋税的重担转嫁到其他阶级和人民的身上[12]。瓦尔加认为，因为这些既维持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又从整体上增加了剩余价值，减轻了垄断组织的负担。可是一到涉及利润分配问题时，垄断组织的特殊利益就严重对立起来。重要产业部门价格的提高同加工部门的垄断组织之间的利益对立，围绕一定的由国家所提供的市场、资源的分配问题上各垄断集团的利益对立，进出口的分摊和关税率的决定方面的利益对立，又把政府各部门卷了进来而展开斗争[13]。这种矛盾和对立，随危机的加深、垄断资本经营状态的恶化和因财政危机而来的财源的受制约，而愈加增大起来，所以瓦尔加就得出如下的结论：上述事态的当然结果是，维护垄断资本共同利益的国家同从有限的市场和特殊的方便方面

获得利益的各个垄断组织之间的对立在扩大。

在这第二个论点上，瓦尔加也同第一个论点一样，把危机的加深看作垄断组织和国家之间共同利益增加的趋势，一贯强调垄断组织和国家有即使丢掉特殊的、个别的利益也要保护共同利益的趋势。

而且贯彻这个共同利益的过程，据瓦尔加的看法就蕴藏着前述垄断资产阶级三点共同目的中的前两点即保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创造以压低工资为中心的剥削剩余价值的条件，同后一点即对垄断资本有利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两者之间的矛盾的进行过程。他说：

“在争取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这个第一个主要目的的斗争中，垄断组织得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那些完全地或部分地靠剥削劳动而得到收入的阶层的支持，即得到非垄断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小资产阶级以及职员中的高薪阶层、官吏和被收买的工人官僚和工人贵族的支持，简言之，得到了那些不愿意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的支持”。

“在实现另一个主要目的即靠国家来进行对垄断资本有利的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时，垄断组织损害到那些支持垄断资产阶级达到第一个目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阶层的利益，把这些阶层变成了垄断组织的敌人，从而有可能建立一个劳动人民和受垄断组织压制的资产阶级各阶层反对垄断资本统治的广泛阵线”[14]。如果说加强垄断的共同利益包含这样的矛盾过程，那末，硬说国家从属于垄断这个斯大林的观点，对瓦尔加来说，无疑是无法接受的无视现实的立场。

瓦尔加的第三个论点是：

“我在书中写道：‘国家在战时经济上具有决定作用’。……反对这种意见的人说：‘并非国家，而是垄断组织是战时经济的决

定力量'"[15]。这个论点，若是以虽然说是战时国家，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仍不过是阶级的国家这个事实作为前提，就可以看作如同瓦尔加所说的那样，是由于简单的"概念混淆"而引起的争论。主要论点是集中在第一、第二两点上面。

"最后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计划化的可能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讨论时也表现出教条主义而没有作具体的历史分析。所谈的不是计划经济，便是生产的完全无政府状态"[16]。

瓦尔加举出即使最富有的国家美国，在战时也实行了资源分配制的事实强调指出，暂时可以实行和"完全无政府状态"不同的"计划化"，然而，这是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根本不同的东西，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所能作的事，只是给资本家下命令和指示[17]。据他看来，"资产阶级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活动所造成的状况，根本不同于构成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基础的为未知市场的生产"[18]。

瓦尔加的这种微妙的表述，是对关于战时统制经济中的垄断、国家和无政府状态的理论问题已经得出了一定结论的。瓦尔加早在1946年的旧著中，在论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计划性"和无政府状态的关系时，就经常参考了列宁的如下论述[19]。列宁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说：

"资本家为国防即为国家工作，这已经不是"纯"资本主义了（这是明显的事实），而是国民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纯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商品生产是为**不可知的**自由市场工作的。为国防'工作'的资本家则完全不是为市场'工作'，而是**按照**国家**订货**甚至往往是为了得到国家贷款而'工作'的"[20]。

列宁的这段简明的论述，是在1917年6月，把克伦斯基政府下的垄断与官僚机构的结合和窃盗国库行为的揭露作为当时俄国社会的民主化的中心问题而提出的。在这个阶段列宁驳斥了在俄

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强调揭露窃盗国库行为以及确立对付它的民主的统制管理机构这种民主的任务才是重要的。他认为为国库进行生产不是为自由市场而是按照订货进行生产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就与“纯”资本主义不同。然而，因为只要是资本主义，在这个为国库进行生产当中，就贯串着从国库获得利润这种形式的私有制原则，所以才企图使这个原则得到官僚的保证，在营业秘密的名义下偷偷地赚钱。因此在前边我引的那一段话后，列宁接着又说：

“我们认为，掩盖这种特别交易中的利润量，攫取高于实际参加生产者必需的生活费的利润，就是盗窃国库的行为”[21]对这种盗窃国库行为实行民主统制管理的内容是：“颁布一项法令，取消与国家订货或整个国防订货有关的各部门的商业（包括银行）秘密，……法令颁布后，立即制定一项法律，规定凡对下列享有全权的个人或团体隐瞒有关商业秘密的文件或事实，无论直接隐瞒或间接隐瞒，均予以刑事处分”，这里所谓享有全权者，当然是指工人代表苏维埃、工会、政党而言[22]。

因此，为了把瓦尔加所提出的问题深入地探讨下去，就必须对合法保障国防供应中的垄断利润的机制，和由居民代表进行对盗窃国库行为的民主的统制管理的意义，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可是问题的讨论，只停在入口处，正如瓦尔加所指出的，仅仅强调了一般的“无政府状态”就结束了。

注　释：

1. 参照瓦尔加著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等译《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序言第1页。

2. 同上书，第36—37页。

3、4. 同上书，第37页。

5. 同上书，第37页。

6. 同上书，第37—38页。

7. 同上书，第45页。

8. “垄断资本和国家都是独立力量，它们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联合起来。这不象斯大林所断言的和我国某些经济学家至今一直教条主义地重复那样，国家只单方面‘从属于’垄断资本”（同上书，第45页）。

9. 池上惇：《现代国家与国家垄断——以回顾瓦尔加理论为中心》(《日本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汐文社1976年）第257页及以下各页。

10. 瓦尔加所著前书中译本第38页。

11. 同上，第45页及以下各页。

12. 同上，第46页。

13. 同上，第46页及以下各页。

14. 同上，第50—51页。

15. 同上，第39页。

16、17. 同上，第40页。

18. 同上，第41页。

19. 平馆所著前书第14页。

20. 列宁：《实行社会主义还是揭露盗窃国库的行为？》（《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52—53页）。

21、22. 同上，第53页。

Ⅱ 瓦尔加争论的意义和局限性

这些争论与前一章围绕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问题的争论性质显著不同。围绕希法亭的争论是修正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激烈论战，而这次争论则具有科学社会主义内部理论分歧的性质。前者是同总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引人瞩目的现实相对比当中解决的；而后者却是经过长期的停顿和中断之后，在能够从当事者

本人听到一定的结论的情况下结束的。瓦尔加对四十年代他本人的自我批判说："最后，我想说明，当时我是被迫承认了书里的错误，以结束讨论。这不是因为在苏联有什么压力迫使我如此，而是因为资本主义报刊，特别是美国报刊，以资产阶级伎俩利用这次讨论进行政治煽动，用它来作反苏宣传，公然说我似乎遵循'西方路线'，把自己同共产党对立起来，等等。究竟是我或者是批评我的人在这一个或那一个问题上正确，当时对我来说已不是那么重要。但我不能容许，在我从事国际工人运动将近半个世纪以后而在资本主义世界面前被描绘成自己的党的反对者"[1]。

可是，尽管争论性质不同，但把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争论中提出的问题与瓦尔加争论中的问题加以比较，考察一下它们的联系，却是饶有兴趣的。

第一、希法亭讲了资本集中形成社会内部对立缓和的趋势，而瓦尔加却以战争经济中资本集中的进行制造了阶级矛盾进一步扩大的条件为论证的前提。这一点，可以说瓦尔加是以他自己参加过的苏联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论战作为根据的。在这个基础上，瓦尔加提出问题是，由国家提供市场和实行资源分配制，给私有制和商品生产带来了什么，或者同前述列宁提出的问题联系起来说，他掌握了考察应当叫作"合法的盗窃国库"这种资本集中的新形式，同竞争进而同阶级对立激化的关系的门径，这才是瓦尔加争论的最积极的成果之一[2]。可是，遗憾的是，无论批判者或是瓦尔加本人的论述，在这一点上都没有深入地展开。批判者的论点，勿宁说只是停留在后来斯大林的论文（1952年）所代表的片面性论点的框框之内，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的军事化、限制群众的消费和慢性的危机状态等。日本也有过片面强调经济军事化论的时期，以后又克服了这种倾向而继承了瓦尔加争论的积极方面[3]。

第二、关于对社会改良积极面的评价问题，无论瓦尔加或者是批判者，可以说都不那么“积极”。只是瓦尔加通过高度地评价作为人民民主主义物质基础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企图对所有制形式向国家所有制的转变在社会改革上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给予高度的评价。在评价作为社会改良一种形式的国有化的意义上，可以说瓦尔加的态度是极为积极的。但他没有对缩短劳动时间、提高教育水平、反垄断的立法等这些构成居民的发展和反垄断统制的门径的社会改良措施，都没有作出肯定的评价来，看起来他勿宁说只强调社会改良归根到底是与流动资本的利益相联系这一面。

第三、关于工人群众组成等级、官僚机构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的新形式的评价，瓦尔加认为，战时国家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的国家只有得到整个小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阶层的合作才能实行统制管理，可以说他只在强调被生产活动异化出来的阶层增加的意义上，强调官僚机构的扩大趋势以及它对垄断资本的相对独立性[4]。可是现代社会脑力劳动作用的增加同阶级统治有何联系，同社会变革又是什么关系，他都几乎未加分析。

第四、关于垄断的发展与国家权力的相互关系，瓦尔加虽然指出了两者的关系随“危机”的发展而变化，指出了或是由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变为整个资产阶级的国家，或是产生垄断的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对立等。但几乎没有涉及到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垄断统治和资本积累、财富的再生产与阶级关系的再生产的分析，关于家庭和居民生命的再生产同国家权力扩大的关系以及关于分析国家时不可缺少的地区性的研究等等。因而，也就未能作到从理论上对居民自治和民族自决等民主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但是尽管存在以上所述的不足之处，这次争论的成果还是使人们认识到，应该接受瓦尔加提出的问题的积极因素，并使之进

一步发展下去。虽然后来的争论不见得是朝这个方向发展下去的，但是涉及战后资本主义新特征问题的理论探讨却有了积极的展开。这就是围绕齐香的争论的开始。

注　　释：

1. 瓦尔加所著前书中文译本第42页。

2. 对瓦尔加来说，生产各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的激化，尤其成为理论上的重要的媒介（同上书第52页及以下各页）。

3. 参照岛恭彦：《军事费用》岩波书店1966年，池上惇：《现代资本主义财政论》有斐阁1974年第2部分。

4. 平馆所著前书第17页。

第五章　关于齐香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

前　言

K·齐香理论的展开是以研究西德投资问题为背景的。因而齐香在展开论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想要搞清规定国家资金以及国家措施的收入再分配的规律，也就是说他想搞清楚的不单单是资本主义私人企业的投资，而且是由资本主义国家承担和投放的资本是以怎样的必然性产生的，并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起着怎样的作用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与赋税、国有有关的投资问题的理论化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产生私人企业投资和国家投资的区别，以及与可以看作两者中间形式的股份公司投资的区别问题。

还有，现代国家不仅采取财政投资贷款、补助金等直接利用国家资金的手段，也同时采取减税措施、从法律上规定投资等间接援助投资的手段，这就要求有一个能够统一地说明这两者的原理。

齐香对这种理论上的要求，提出了两个论点，企图以此来解决问题。

他的第一点尝试是，把私人资本家的个人企业、股份公司、垄断以及国家垄断，看作资本主义内部生产关系发展的不同阶

段，并找出规定这种发展阶段的规律性[1]。

于是，他提出一个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化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社会化的发展的设想，创造了一个简明的于公式：由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得到暂时的解决就是意味着新生产关系的形成。他说："生产力社会化的发展，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形式。就是说要求不断解决资本主义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2]。

因此，生产力规模扩大到个人企业难于经营时就产生了股份公司，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就产生垄断，再进一步就是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而出现的国家垄断[3]。若是这样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那就是说资本主义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创造出新的生产关系是为了延续自己的寿命，那末作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终于变成了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了呢？人们当然会提出这个疑问。所以，这个见解在我国、东德，都引起了很多反对的意见。例如O·克拉齐所介绍的讨论会上，对齐香进行了批判，说他"是根据维持现状（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部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观点研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会上出现了认为也应当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来考察的看法。齐香接受了这个批评，承认了机械地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先验图式的错误。据克拉齐的介绍说，齐香"在若干主要问题上同意了人们的批评"，"其中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阶段理论和资本主义矛盾自动消灭论"[4]。齐香在新的著作中引进的基本观点是"资本积累"这个一般的命题，企图从投资问题方面来把握国家投资，就是说把它看作作为积累过程的一个因素的筹措货币资本的形式这样局部的问题[5]。

他认为，在帝国主义阶段，基于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的规律，为了垄断组织的积累，而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这个过程

反映在投资问题上，破坏资本市场的自动调节作用，导致资本主义的腐朽化。这样，旨在实现垄断组织积累的国民收入再分配这个基本命题，就成了说明国家投资的理论基础[6]。

他的第二点尝试，企图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看作生产关系这可以说是一种方法论。众所周知，他认为对于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来说，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基础，并企图说明这个基础是如何成立的。他的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先验图式，最直截了当地显示了他的这个尝试。于是他就把财政投资那样的国家的直接投资，和诸如免税立法、促进资本积累的制度和法律等对于积累的间接援助，一并纳入生产关系之中。他说："帝国主义国家是掌握在金融寡头手中的囊括一切的社会组织。这种国家直接从属于垄断组织，如被拉进再生产过程时，当然，不是形成新的经济关系，就是修改既有的关系。由于国家进入再生产过程，社会生产就能达到更高阶段，生产就可以实现进一步的集中"[7]。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更加社会化的阶段，其特点是：

（1）通过立法作出经济上的规定——赋税、价格、卡特尔、工资等；

（2）国家旨在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各种设施——政府机关、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

（3）国家、省、自治体的预算。

他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样的措施，在成为上层建筑以前，是适应一定生产力水平的社会组织，是生产关系。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外是依据这种基础加强对经济的干预，确认和促进作为基础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此种情况可比之于货币制度以货币流通的客观规律为媒介，作为人的有意识行动而实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等等是独立于上层建筑的客观经济规律，上层建筑只不过以此为媒介而已）。国家转化

为基础的必然性，他最初是用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而来的生产关系的社会化予以说明的。

他承认了把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社会化的先验图式运用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上是错误的，那就会提出根据什么样的理论来说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这个问题。

与此同时，对于他的方法论，即首先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看作“生产关系”，然后，只是从证实这个运动规律并以之为媒介的角度来处理上层建筑问题，也有必要重新考虑。例如，先举出他在最近的著作中所使用的“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这个概念来说吧。他想用它来说明通过国家资金和法律措施的资本积累过程的本质变化，这时，他就陷于一种自相矛盾之中。就是说，一方面，根据历来的方法论，舍去上层建筑不论，企图根据生产关系变化的必然性来说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这样一来对生产关系的变化——具体地说就是国家经济职能的扩大——就不得不根据再生产过程的要求，即根据旨在发展生产力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新的社会组织的要求这种逻辑来加以说明。然而，这样就又回到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生产关系新阶段”这种旧的说法上去了[8]。

另一方面，他否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新的生产关系，企图用国家从属于垄断组织这个规定来说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9]。可是，从这个观点来看，为垄断组织利益而利用国家机关这一侧面，从而，上层建筑的规定，就不得不作为本质性的东西进入他的逻辑中来。

在他的理论中，上述两种规定未加统一地并存着。在讲“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时，就显示出：他的“上层建筑的变化，从基础的变化来说明”的论点，和“舍去上层建筑不论，先把它（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作为基础来把握”的方法论，这两者不见得能够一致起来。

在日本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在批判了齐香理论之后又该确立什么样的理论？还有，更为根本的问题即怎样理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这也是关系到对齐香理论的评价问题，如果把具有特点的议论加以集中归纳的话，它的中心点是，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看作“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还是看作在“资本主义体制危机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比垄断更高一级的社会化形式”？[10] 如本书第一部分所考察过的，若是想解决齐香理论的这个矛盾，不能不阐明资本积累与官僚机构的互相依存关系，但是，东德的争论并未朝这一方向发展，多数人停止在对古典的论点的重新证实上。下面就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

注　　释：

1. K·齐香：《论西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几个问题》，《经济学院年鉴》第1卷1957年（井汲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同前第25页及以下各页）。关于齐香争论的最为概括的研究，参照海道胜稔：《关于齐香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经济评论》杂志1960年7月号）。

2. 齐香著村田阳一译《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若干理论问题》，载长州一二编《现代资本主义与马克思经济学》大月书店1957年版第247页。

3. 齐香理论所依据的经典论述，主要有下列各段：

马克思关于股份公司说：“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的扬弃，……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495—496页）。

恩格斯关于股份公司、托拉斯、国有说：“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抗，要求承认它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必要性，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一切可能的限度内，愈来愈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而举出“股份公司”、“托拉斯”、“国有”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第3卷第317页）。

关于列宁，在与修正经济规律的联系上，他注意如下的一段话："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即商品生产虽然依旧'占统治地位'，依旧被看作全部经济的基础，但是它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749页）

4. 东德的批判论文如下：

O·克拉齐：《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的讨论》，《经济科学》杂志1959年第1期（包括齐香的自我批评）。

H·J·李希特尔：《论齐香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经济科学》杂志1958年第2期。

K·尼尔斯：《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经济科学》杂志1958年第2期。

此外，部分涉及齐香批判并尝试独自展开论述的有：

O·赖因霍尔特：《西德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统一》杂志15年度第6册。

J·L·施密特：《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统一》杂志1957年第6册；《西德战后的周期及开始的经济危机》，《繁荣·危机·战争》杂志1959年；《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的作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问题》杂志，J·L·施密特、K·H·多姆代出版第2期，柏林1959年。

5. K·齐香：《西德投资资金的基本问题》柏林1959年。

6. 同上，第5—10页，第40—43页。

7. 齐香：《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若干理论问题》，"W—W′"杂志第4—5期1956年第695—696页（村田阳一译前书第254—255页）。

8. 同5，第42，204页。

9. 同上，第42，200页。

10. 守屋典郎：《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日本经济分析》第2卷第6页；《战后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理论'》，《思想》1960年2月号。

I “阶段论”批判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新生产关系，是一个新阶段。对齐香的这种主张，K·尼尔斯则从垄断资本的最终发展的观点来把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换言之即把它看作典型的垄断资本主义。下面我们先考察一下她的这种见解。

她把阐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理论出发点，放在“作为帝国主义基础的垄断资本”上，指出“这种垄断必然要产生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从属于垄断组织的权力——发展的趋势。因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是“阶段”而是“趋势”[1]。

但在齐香的“阶段论”看来，股份公司、垄断、国家垄断这样的发展阶段，是由生产力的社会化所直接规定的“更具有社会性的生产关系”的一种表现。所以，与其说国家垄断的逻辑是从垄断的逻辑本身产生出来的，不如说似乎是更侧重于受生产力的社会化所规定的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认为这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一部分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展开论述得不够充分。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尼尔斯和齐香的立脚点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她并不反对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的社会化的“适应”这件事情本身。只是反对把它看作与垄断资本主义有质的差别的新生产关系，而是理解为垄断资本主义向其“极限”的发展。这种想法表明，她把垄断的形成看作对生产的社会化的一种“适应”，主张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特别是它的“第二阶段”的资本主义条件所形成的结果。因此，“现时，要想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妥善的办法是揭示国家从属于垄断组织及其必然性是来自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2]。

这个结论实际上是说垄断的逻辑发展与国家的干预经济归根到底是要一致起来的；是与齐香重视生产力发展因素的观点正相反的。这一点因与上层建筑论密切相关，以后再讲。

G·柯尔迈和尼尔斯同样，反对“阶段论”采取“趋势论”[3]。他特别注意以下各点：

（1）齐香把所有制关系与生产关系等同视之；

（2）但是，国有并不表示所有制关系发生“本质上”的变化；

（3）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问题，可以由分配关系的变化特别是财政和信用来说明；

（4）正如列宁根据世界市场的逻辑的、历史的必然性来为帝国主义理论奠定基础一样，必须阐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帝国主义的历史的必然性。

因此，他的论点中心在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没有所有制关系的变化，只有分配关系的变化”，在于要从财政、信用等次要的生产关系的发展方面说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基础。

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柯尔迈的见解与齐香有某种类似的地方，这就是重视货币和信用问题。齐香着眼于西德投资方法的变化、它的国家资金、自筹资金的增加，而把此种情况理解为与“生产力的社会化”相适应的筹措货币资本方式的变化即生产关系的变化[4]。

H·J·李希特尔重点地批判了齐香的所谓“社会化的双重过程”论。他批驳了齐香所主张的“生产社会化的一定阶段给生产的社会组织的……一定阶段即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发展阶段提供条件”，指出“这种表述把社会劳动的与生产关系同样看待”，而对哪种社会范畴决定性地规定生产关系”这个问题则没有明确的回答[5]。

他认为，齐香的看法是：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对于独立于所有制关系之外的、为技术结构所需的社会性劳动组织的要求”，还产生了管理人员和组织制度。说这是与技术第一以及对于官僚制度的资本主义的看法相同的。他认为，只就这一点来说，齐香就是“忘记了社会关系的本质标志”，对“本质性的经济关系”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并未深入谈到。

李希特尔还说，齐香虽然提出了由帝国主义国家所进行的国民收入再分配问题，可是实际上是“把流通方面的国民收入的分配同过渡过程割裂开来进行考察的”，“忽视了产品的分割和占有对生产关系来说不是规定性的，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才是规定性的东西”[6]。

正象已经考察过的，齐香提出国民收入再分配问题时，对此分配过程未深入到所有制关系上进行探讨，就那样地把它当作了生产关系，这一点正好证明了李希特尔的批评是正确的。只是，李希特尔没有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积极地探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仅仅片面地强调国家权力的规定性，所以有更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F·埃尔斯那对齐香的批判如下：[7]

（1）齐香不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而是从生产社会化过程的双重性质这种“次要矛盾”出发的。“次要矛盾”仅仅用暴力（例如危机）就可以解决，虽然是暂时的。反之，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无法解决”。帝国主义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的所有制关系并无改变”。

（2）关于国家与经济的关系，强调“从来没有过国家不干预经济的时代”以及国家在原始积累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3）他所主张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标志是国有化、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限制作用，和由国家规定资本与劳动的关

系。

在埃尔斯那看来，这样的基本标志如何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联系起来的是不明确的，他特别称国有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的重要”标志，在这一点上是与柯尔迈从信用关系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相对立的。

以上，概述了东德争论中的主要论点。他们在认为齐香的“阶段论”是错误的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如果进一步积极地展开下去，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意见也有相当的分歧。

下边进一步考察一下尼尔斯的见解，她以比较系统完整的形式对于“趋势论”展开了论述。

注　释：

1. K·尼尔斯所著前书第258页。

2. 同上，第259页。

3. O·克拉齐所著前书第110—111页。

4. K·齐香：《西德投资资金的问题》，《经济科学》4—1，1956年。

5. H·J·李希特尔所著前书第270—271页。

6. 他引用了马克思下述一段话来加强自己的论点：

“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上述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99页）

7. O·克拉齐所著前书第112—113页。

Ⅱ 垄断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尼尔斯认为，齐香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是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演绎出来的[1]。

这时，由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规模的扩大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社会化，使私人资本的经营越来越困难。然而，尼尔斯一方面承认这个规律在加深生产和价值增殖的矛盾，又说资本规模的扩大表现了同资本的“社会利用”的对立物即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因而得出下述结论：

“这个事实意味着，对于社会资本，资本不断变小起来的私人却拥有日益增多的自由处理的权利；意味着垄断组织的统治达到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过程”[2]。

她在这个基础理论里又引进了“总危机第二阶段”这个条件，企图以此说明，要不把垄断组织的统治和资本主义危机考虑在内，那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是不可设想的。她的结论是：“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就如同帝国主义战争的必然性一样，……是从垄断资本主义产生出来的”[3]。

她用上述两点批判了齐香的以所谓“社会化的双重过程”为基础的观点。关于第一点批判意见特别应注意的是，与齐香把“生产力的社会化”与“生产关系的社会化”分割开来之后，再把两者置于单纯的因果关系上的作法相反，她不是把社会资本的动员和利用看作生产关系的社会化，而是理解为私人资本的自由处理权的扩大。她对“生产关系的社会化”理论并没有在上述基础上作更深入一步的考察。比希特拉则依据列宁的观点强调了下述论点。[4]

他首先引用了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

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中下述一段话并企图加以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使劳动社会化，这并不是说人们在一个场所内工作（这只是过程的一小部分），而是说随资本集中而来的是社会劳动专业化，每个工业部门的资本家人数减少，工业部门的数目增多；就是说，许多分散的生产过程融合成一个社会生产过程”[5]。

比希特拉据此规定指出，齐香把社会化过程人为地分割成两种，即生产力的社会化和生产关系的社会化。可以说这与尼尔斯针对“更加社会化的生产关系”，强调扩大“私人资本的自由处理权”的观点是同出一辙的。就是说，尼尔斯认为，国家从属于垄断组织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固有的本质”，她从“掌握在若干名资本专制者手中的对社会资本的自由处理权”出发，断定“能使国家从属于垄断组织经济的权力即本于此”[6]。

可是这个“经济权力”概念的含义，应该怎样解释？

她说：“统治关系和与之结合在一起的暴力——这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状态来说是带有典型意义的”[7]。因此，她企图从垄断资本主义固有的在经济方面的统治、从属关系出发，把这种统治关系推广到利用国家权力的问题上。这与上层建筑问题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注　释：

1. 齐香：《关于西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若干理论问题》，《政治经济学问题》（《经济学院年鉴》1957年第31页）。

2. K·尼尔斯所著前书第259—260页。

3. 同上，第265页。

4. O·克拉齐所著前书第113—114页。

5.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卷第41页）。

6. K·尼尔斯所著前书第260页。

7. 同上，第265页。

Ⅲ 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从垄断的本质来说明或是从“生产关系的社会化”来说明的这种对立，当然要影响对于国家干预经济问题的看法。

如果按齐香的说法，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国家从属于垄断组织的权力”这个命题，历来许多人都认为这是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国家的“措施”，是为垄断组织利益服务的经济政策或“国家的一种方法”。然而，在他来看，这种看法是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当作一个“政治问题”，这“实际上就要以金融寡头制的主观的、自由的意志决定来说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各项措施”，这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作用和影响就变成只不过单单是“国家的政策”了[1]。他断定这种想法是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属于同一水平的东西。他提出了下述方法论代替这种看法。

这就是不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单单当作“政策”，而是当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以探求它为什么“在经济上是必要的，起什么样的作用”，把它当作“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一个阶段”来研究。据此方法论，他对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按下述顺序来理解的。

他首先根据“生产关系社会化”理论，说明国家势必成为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然后说“由于把帝国主义国家即统括全社会的权力机构引入经济后，才产生了使‘社会的经济领导机

构’的建立成为可能的、以更大的规模对于生产的社会性的总揽。正是从这里才产生了国家政策对再生产过程起决定性影响的可能性”。在这个新的生产中，金融寡头制获得了干预经济的更大的可能性。“对问题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观点来看时，就可以发现这里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阶段的特征”[2]。

柯尔迈肯定了齐香的这种提法，说这是“决定性的贡献”。他虽然批判了齐香的理论，但是对于齐香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看作“生产关系”却是赞成的。另一方面，李希特尔则反对把国家政策等放在生产关系里，专门注意于作为“政治权力”的国家的问题。

另外，尼尔斯因为是从垄断组织扩大了经济权力的立场出发研究国家权力问题的，所以，她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所以是生产关系，不是因为它是新的生产关系而是因为它是垄断资本主义。因此在她来说，问题是与金融寡头制的本质密切相关的。她说“它的职能在于，由于经济权力的利用，由于大规模的操纵金融和投机而占有了社会劳动的成果这一点上”，强调非生产的阶级、官吏、军队、官僚机构等等的寄生性。她认为这些因素使国民收入的分配发生了变化，但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并未添加上什么新的东西，只不过加强了它本来的寄生性。

那末，在另一方面如何评价国家对经济过程的干预呢？她把它看作在“资本和生产的高度集中和积聚”以及“经济权力集中”的基础上“金融寡头制所进行的对社会的生产和分工的统治”。她的结论是，这种统治虽然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最高形式，却是施加于经济及政治上的统治关系以及“暴力体制”[4]。进而尼尔斯又谈到了作为“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崩溃，从这个方面对国家权力作了如下的评价。

“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崩溃，迫使采取与金融资本的

经济方法相比更为典型的暴力和超经济的强制办法。但是这个办法的最现实的东西，是由国家进行的”[5]。

综上所述，齐香对上层建筑的理解显然是和尼尔斯的理解根本不相容的。前者首先找出使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关系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从证实这个生产关系在现实地起着作用，作为媒介促进着生产力这个观点出发来认识问题，从而，基本上只是从使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理解上层建筑的作用；而后者讨论的问题是，生产关系转化为生产力的桎梏，作为此种生产关系的强有力的维护者而出现的上层建筑。

当然，尼尔斯也并不反对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看作生产社会化发展的最高形态。她说：“假如只把阶级关系加以抽象化，把构成它的基础的所有制关系加以抽象化后的形式作为考察对象的话……，那末，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分工进行统制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就是从高度发展的生产社会化和经济权力集中里产生出来的。

然而，这只是表明了下述事实，即社会主义的客观的各种物质条件已经成熟了，因此，“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烂。”[6]（她还进一步谈到了总危机和经济军事化等，此处从略）

从以上考察，可以认为大体上已经搞清楚了齐香理论的基本内容和方法论上的问题。这就是：

（1）从考察生产关系开始探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不从自由竞争转化为垄断这种基本变化出发而是从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性”的先验图式出发，因而就不能把握垄断的经济权力和国家从属于垄断的这种情形。

（2）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向，在齐香看来，和垄断前的资本

主义一样，只是从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积极作用的方向加以理论化，而不能对在垄断阶段居统治地位的阻碍经济的发展和以暴力维持私有制的方面作出评价。

例如，象战争经济所显示的那样，关于国家干预经济，不能否认它在某种情况下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作用。然而，在另一方面，军事支出成为经济增长的负担，还有由于通货膨胀而浪费了社会的生产力也是事实。

断言现代国家在一切方面都是浪费的当然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通过公共投资等向使生产力发展的方向起作用是理所当然的。问题在于这种方向只是在从根本上和长时期地维持资本主义制度来看的限度内起作用。这一点也是政治权力在社会发展上的作用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区别问题。

恩格斯在说明权力的规律性的地方讲了如下一段话：

“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它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就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7]

齐香关于作为生产关系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种提法，从权力的两种作用这种角度来看，不能否认它是形式主义的方法论。那就是象已经考察过的那样，实际上对于政治权力只能从它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一个方面予以评价。从内容上看，也可以说未从垄断的逻辑出发而招致了这样的结果。他的方法论和“阶段论”，也是在这一点上紧密相连的。

注　　释：

1.他直接批判的对象是切普拉科夫，但似乎作为历史上存在过的理论对立而考虑到考茨基和列宁的论战。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来看，考茨基把帝国主义当作金融资本愿意采取的一种“政策”，列宁则企图以“垄断”这一经济上的规定作为阐述帝国主义的基础。再有，齐香在研究虚拟资本时，把希法亭当作批判对象。关于此点的论述请参看下列文献资料。

R·希法亭：《金融资本论》，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静田均：《考茨基的帝国主义概念》（《经济论丛》第75卷第5期）、《希法亭的帝国主义论（一）》（同上第78卷第4期）、《作为概念的帝国主义》（同上，第84卷第1期）、《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同上，第85卷第2期）。

2. 井汲卓一所编前书第46—47页。

3. K·尼尔斯所著前书第261—262页。

4. 同上，第263页。

5. 同上，第264页。

6. 同上，第265页。

7.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222页）。

代结束语

齐香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如果接受它的积极方面的话，可以说，就在于他强调现代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的基本特征是，在投资问题上以税收作为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然而就其消极面来说，可以说，他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上，却制造了一种方法论上的框框，使对于用权力维持已成生产力桎梏的生产关系这一方面的考察难于进行，因而不能把握现代资本主义

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的全貌。接受齐香的积极方面改正它的消极面的工作，理所当然的方向就必须是，把论证现代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的规律同与之并行的官僚机构的扩大，并且把这两者统一起来进行研究作为目标。可是东德的论战并未达到这一点。如前所述，更进一步的展开，应以扎根于日本、法国等的具体情况和研究的形式把论点深入展开下去。东德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没有同时对官僚机构作进一步的研究，这是它七十年代受到西德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一个原因。这一点和日本的研究情况稍有不同，下面我们就来考察。

第六章　关于欧洲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争论的主要论点（一）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的“复活”

前　言

最近，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研究领域里出现了若干新的特点。很遗憾，这些特点不见得是从日本资本主义现实中出现的争论问题的反映，而是以把外国的争论问题引进日本的形式表现出来的[1]。但也不能一概而论，谈这种动向仅仅是“崇洋媚外”症的复活。因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使经济思想方面的国际交流活跃起来，企图扎根于日本的科学经济学同从某种意义上说经过了锤炼的国外流行的思想进行争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应当看到，通过这种争论还可以使日本的科学经济学受到锻炼[2]。在从四十年代的瓦尔加争论到齐香争论（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过程中，日本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争论，逐步地摆脱了把国外的某一个争论问题拿到日本来进行争论的格式。对日本和世界现状进行分析，以扎根于日本的思想为准绳进行争论的作风，逐渐地定型了[3]。当然，这些分析和思想是否绝对的正确，还有讨论的余地。但对于这种动向的增强，还是应当给予高度的评价。本章的目的在于，对当前欧洲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争论的性质做些介绍，并根据上述观点进行若干评论。

注　释：

1. 玉垣良典：《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的根本反省》（《现代理论》1976年1月号）。

2. “玉垣提出问题的意义在于：他以当前现代资本主义战后体制已经崩溃的现实为基础，通过对过去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争论的总结，启示性地指出重新展开争论的时期已经到来。”（大内秀明：《为了重新开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争论》载《现代理论》1976年5月号第39页）

3. 参阅大内力：《日本经济论》上册，东京大学出版会1962年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版。一濑秀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研究》，新日本出版社1972年版。池上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中的国家》（加藤、古川、良知、鹫见编《现代资本主义与国家》有斐阁1976年版）。（仪我壮一郎：《现代日本金融资本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载前书）。

I　“融合论点”与“官僚制论点”的争论

当前欧洲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争论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在东德和西德的理论家之间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争论，焦点是能否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本质看作国家和垄断的混合。东德理论家主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国家与垄断的融合或混合，无论从经济理论还是历史学观点来看，国家都是垄断组织统治居民的工具[1]。这个论点是列宁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分析战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时确立的，以后每当争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时，它就被提了出来。而且通常的情况是，这个论点简直就象一张陈旧的石蕊试纸一样，被简单地用来区别事物。认为国家垄断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国家与垄断融合的（其中有若干微小的差别），便被称为“正统派”；低估融合意义的，虽然承认这种现象但不承认它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便被称为“异端派”。某种场合，这个论点是“正统派”用以攻击“异端派”的手段。某种场合，它又是“异端派”用以攻击“正统派”的手段。现在在东德与西德之间的争论的特点是，西德理论家主要把这个论点作为攻击“正统派”的手段提了出来。这同斯大林在瓦尔加争论中用它批判瓦尔加的时代恰成对比。

例如，玉垣良典作为他留学西德的成果，在《现代理论》杂志上介绍的J·科卡（西德比勒菲尔德大学）说：融合论点的理解是：“垄断权力和国家权力‘融合’成一个整体机构，由垄断组织……统治整个社会是这个机构的目的和职能。……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垄断资本统治机构的发展史。’

“这样被明显地奉为经典的观点，使人们对于国家机构或其各个部门具有相对独立性这一点难以理解；使人们对于作为整体的资本与国家机关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和利益冲突的探讨，难以进行。……这个观点减弱了人们对官僚制研究的努力。而在德国，官僚制决不能归结为仅仅代表企业主的利益，它是一种制度，也是一个社会集团。而这个观点使人看不清官僚制对于权力和国家的关注。”[2]

西德柏林自由大学集体编著的《垄断与国家》中收录的R·温克尔曼的论文说：

在阐明社会总的特征时，东德的研究缺少：

1．对非垄断资本家的分析；

2．“对于资本积累和社会化发展现阶段的再生产过程的总的研究。”[3]

这种看法实际上是说，总之，“融合论点”是一种僵化的教

条主义观点，即认为垄断加强了对于国家的统治和对居民一元化统治的体制；而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只有分析非垄断的社会阶层，分析社会总生产过程，以及分析国家垄断的相对独立性和研究官僚制，等等，才是必要的。

认为国家不仅仅是垄断的工具，而且也是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整体，或者说是具有综合调节整个社会利益能力的独立的存在；这种观点实际上不仅在这次争论中而且在历次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争论中都反复地出现，我们暂且把它叫做“官僚制论点”。

例如，本世纪二十年代，希法亭发行了《社会》杂志，极力主张“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概念，反对国家与垄断融合的论点。他在《社会》杂志卷首发表的题为《现代问题》的评论中说：

“战争把工人一起投进了战壕，同时，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在观念上都增强了工人阶级在国家内部的作用。……国家被迫同生产者进行谈判。因为国家需要生产者组织自发地予以合作，而强制对于完成此目的几乎没有任何作用。……自觉地认识到生产者组织本来就是国家责任的承担者，尤其开始认清了工会机构对于国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组织，它不仅与国家官僚机构有同等的权利，而且要更为重要，没有它的援助，生产问题就不能得到适当的解决。……”[4]

在希法亭看来，在战时经济中，官僚机构势必比垄断组织更为接近生产者组织。具体地说，它势必反映生产者组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的力量。而现在的工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並不承担垄断组织的责任，而是承担社会责任。

当时，正统派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上批判了希法亭的观点，他们当然是用“融合”论点批判的，他们严峻地指出，企图以生产者组织为背景，通过官僚机构的民主化推进社会

改革的希法亭等人的“经济民主”学说也好，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宣扬的“合作工会国家”论也好，都是一样的，实际上是区分不开的。其理由是，“资产阶级民主也好，法西斯主义专政也好，都不过是金融资本专政登场的不同形式而已”[5]。争论就是在这样的批判过程中进行的。

后来又经过了布哈林争论，瓦尔加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东欧革命，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在危机时期里，国家不可能单单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利益，为了摆脱危机，不得不以维护整个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场进行活动。他认为由人民来掌握危机时期的国家机器，便能够使它为整个社会服务。众所周知，这次争论，以斯大林的著名论文再次肯定“国家服从于垄断”的论点而结束。瓦尔加当时作了自我批评，在批判斯大林之后，他又重新肯定自己的旧说，说它有一定的正确性。无庸置疑，这也是对“融合论点”与“官僚制论点”争论[6]的一种评价。

五十年代末，南斯拉夫理论家[7]和东德齐香提出，所谓“融合论点”即使可以说明国家与垄断混合的这种政治上的事实，但不能论证国家干预经济的必然性，从而主张承担“生产关系社会化”任务的国家和官僚机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人们对于这种观点，至今记忆犹新。特别是齐香认为，如果生产力的规模扩大起来，所有制形态也势必相应地向更加社会化的形态过渡。这就是从个人所有制、股份公司所有制、托拉斯所有制到国有制等形态的过渡，从而强调更加集体化的所有制形态的重要性[8]。在这种场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便是反映更高水平生产力的、更加社会化的所有制形态的表现。从逻辑上理所当然地就一定要设想，在垄断组织统治国家之前，就已经存在着一种同垄断组织保持相对独立性的“经营和行政”组织，即官僚制度。我们在这里暂且不涉及到日本引进这个理论和争论的问题，从国际上看，这个理论的批

判锋芒，基本上没有超过“融合论点”的范围。

O·克拉契在齐香论文批判会上所作的结论，也还是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解为垄断对于国家进行统治的深化过程。[9]

在考察了上述经过之后，就会提出一个问题：以“融合论点”对“官僚制论点”这种形式进行的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本质的争论，果真是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现状的方法吗？因为我就是对于这种方法一开始就持疑问态度的人之一。所以让我们一面探索这一点，一面再回到争论的问题上来。

注　释：

1. 大野英二：《J·科卡〈战时阶级社会——德国社会史（1914—1918）〉》（《经济论丛》第116卷第5、6期1975年），第142—14页。丰崎稔：《作为现代危机论基础体系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的问题》（龙谷大学《经济经营论集》第15卷第1期1975年7月）。

2. J·科卡：《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还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永沼宗司译《现代理论》1976年2月号第77—78页）。

3. R·温克尔曼：《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原则和问题》。R·埃宾豪斯：《垄断与国家》1973年版第96页。

4. 希法亭：《现代问题》（《社会》杂志1924年第1期第10页。）

5. 鲁道夫·格贝尔：《论“和平工业”与“经济民主”》（《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Ⅱ1929年第279页。

6. 池上惇：《现代国家与国家垄断——以瓦尔加理论问题为中心》（《历史评论》1968年7月号），並参阅本书第2部分第4章。

7. P·斯威齐：《现代资本主义》，畠山次郎译岩波书店1974年第88页。

8. 参阅池上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有斐阁1965年第1章。

9. 参阅池上惇：《关于齐香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第2部分第5章（《经济论丛》第87卷第4期）。

Ⅱ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的“再生”

所谓“融合论点”与“官僚制论点”，都相应地抓住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侧面，这一点已经被欧洲和日本的争论本身所证实。批判融合论点的急先锋科卡，在批判东德论者时，一边极力主张：“不要持先入为主的观点，把经济和国家、社会阶级和国家机构的交错理解为‘融合’，而是从长期观点和在大规模行动领域方面说，把这种交错现象的扩大，同时导致在经济上和社会方面的统治集团与国家之间出现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的可能性，作为尚未解决的问题放在一边。”[1] 同时，他又把经济上和社会方面的统治集团即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也有同国家相融合的情况当作讨论的前提。

瓦尔加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集》[2] 中，对争论作了总结。书中在回答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国家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国家，还是金融寡头的国家时写道：“这两个论点要视具体历史情况而定，有时是正确的，有时是错误的。”[3] 其理由是：“当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尚未遭到真正危机的时候”，国家“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存在遭到直接危险的时期”，“国家才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国家[4]。在瓦尔加看来，根据危机深化的程度，国家或者与垄断资产阶级融合起来，或者代表总资本（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垄断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他自然要认定“融合论点”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侧面。无论科卡或是瓦尔加，都是相对主义者。他们都认为，在某种场合下，“融合论点”是妥当的；而在另外的场合下，则“官僚制论点”（主张代表总资本利益而与垄断组织保持一定距离的官僚机构的独立性）是妥当的。

不言而喻，对于上述两个论点采取这样相对主义态度时，如不能提出区别于这两个论点的更为本质的根本的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定义，其结果就要对于哪一个论点都不能做出正确的评价。A（融合论点）也好，B（官僚制论点）也好，都各自说了事态的一个方面，结论先保留吧。如果是这种看法的话，就需要提出一个更加本质的定义C来，尔后，再把A和B作为C在各种情况下的表现形式重新给它们下定义，针对A，只是强调B，虽然提出了异议，但不能说是展开了积极的论述吧！

科卡对于这个疑问的回答是："再生"了过去为希法亭所发明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概念，并使它可以总括下述各种特征：1．用一般"金融资本概念已经难以预言的垄新组织的增强；2．所有与管理的最高程度的分离，和"官僚制化"即管理职务业务的扩大；3．担任这项工作的"科学技术知识阶层"的增加和工人阶级构成的变化；4．工会与资本家集团订立集体合同意义的增加；5．通过"政治的经济社会化"，扩大国家稳定经济、平息社会纠纷的作用；6．加强了对落后国家经济开发的关注；7．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展，把居民组织到"体制内部"工作的进展；8．宣传"科学性"和"组织化"的意识形态的广泛流行[5]，等等，科卡"再生"这个概念时，慎重地附加了保留条件。他指出，希法亭和纳夫塔里等人主张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是"改良主义的核心概念"，是"为了设立社会民主主义目标，而对借助于国家统治使资本主义逐步发生转化的可能性，加以论定的概念"，但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幻想"。这种调合论的意识形态，就是科卡把"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作为一个自由的概念使其"再生"的根据。本书第一部分已经考察过，日本出现了宇野弘藏的看法，认为"资本主义的组织化"的加强，是针对金融资本已经毫无办法处理的失业和农业危机等问题的。

现在，科卡提出的问题的核心基本上也是这一点：金融资本的组织性不能概括的部分，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组织性中就可以确认，从而可见德国和日本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共同看法的。

希法亭在《现代问题》这篇论文中论述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时，他的根本观点是：力图论证由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出现，阶级斗争情况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出现了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根本不同的阶级斗争。他说：这是“从科学社会主义向建设性的社会主义的过渡”。[6] 马克思、恩格斯描绘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问题；这就是根据科学论证了占社会大多数人的工人阶级剥夺作为少数人的资本家，从而掌握政权的过程。希法亭却说，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使自由竞争结束，卡特尔、托拉斯的权力增大，遍及工业、银行、商业各方面的金融资本的势力扩大了，大企业内部劳动过程实现了社会化，有意识的组织和统治的范围也扩大了。不同于一般无政府状态的“阶层式地组织起来的经济”，通过限制投资和限制信用使经济得到稳定，通过健全失业保险、建立工业官僚制度和社会改良可能性的增大，使劳动问题稳定下来。结果，阶级斗争势必从直接夺取政权变为另一种形式，即把“阶层式地组织起来的经济”转变为“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经济”。[7]

这种场合，作为战争的结果而扩大了的“生产者组织”，特别是工会的作用是绝对重要的。实现经济民主时，如果实现了“出发点是人人平等”[8] 的原则，那末，民主作为在提供人人都可以发挥所长的劳动场所这种意义上的“选择职业原则”，就有了重要的作用。于是，为了使劳动群众获得可以成为社会生产过程控制者的教养和知识，就需要缩短劳动时间和实行高工资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必须提高工人阶级在工厂委员会中的地位，并使工会变成民主的生产政策的执行者。

以上是希法亭观点的梗概。这种观点论证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使阶级斗争形式发生了一大变化，使科卡所说的“改良主义”成为必不可免的。因此，象科卡那样，把去掉了改良主义灵魂的希法亭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作为研究对象时，就很难对于这个概念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之一，即“经济民主化”、“经济民主”概念和工会民主化的要求等方面的问题做出评价来。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所包括的“官僚制”，是导致压制自由的法西斯主义，还是停留在自由民主的范围以内，则是一个变化可能性幅度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就要成为研究的对象了。[9]

但是，同时也不能否认，从而出现了把科卡逼上有些片面性立场上的结果，就是说，逼迫他把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概念几乎变成了“官僚制”的同义词，因而把“官僚制”这一侧面变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概念，站在“官僚制”论点的立场上批判“融合”论点。与其说他采取把C作为A和B的本质进行讨论的态度，莫如说他认为B是比A更为本质的东西，以这种态度对B进行了批判。这样做即使承认A带有相对真理性，也明显地减弱了对于B的真理性的评价，这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科卡说明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概念，可以说只止于强调：官僚制作为超出了私有制和营业自由范围的社会组织，出现在企业和国家之中，并正在形成着上下不同的阶层。而关于这种秩序的组织者发展情况的考察，则转移到考察不同类型资本主义国家的部分进行。科卡慎重地回避了对于这种秩序的组织者是怎样和不能不互相对抗这个一般规律的考察。而希法亭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所要讨论的问题，正是与这一点有关。希法亭认为，随着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阶层秩序组织者的“生产者组织”，也势必按照规律强大起来。

科卡对于“融合论点”的批判，只停留在它的入口处，只停

留在单单提出异议的阶段。瓦尔加比科卡前进了一步，根据更加本质的论点既“危机的深化”，主张“融合论点”和“官僚制论点”的统一。但是，他在说明这个危机时，仅仅一般地强调，战争和革命的危机增加了资本家阶级维持其政治经济统治体制的困难。并没有采用全面地研究危机、国家和垄断组织相互关系从而得出结论的方法，只是区分了有时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有时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国家”这种不同的情况，未能作出比这更为充分的说明。

注　释：

1. J·科卡所著前书日译本，第78页。

2. 瓦尔加：《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集》1964年。

3. 同上日译本，第46页。

4. 池上惇：《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汐文社1976年版补论三；《现代国家与国家垄断》（《历史评论》见前）第2部分第4章。

5. J·科卡所著前书日译本，第65—66页。

6、7. 希法亨所著前文，第3页。

8. 同上，第4、5页。

9. J·科卡所著前书日译本，第80页。

Ⅲ　竞争与改良

日本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争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比起前述欧洲的争论来还要深入一步。它觉察到把“融合论点”和“官僚制论点”对立起来的方法本身也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为正如本书第一部分考察过的那样，如要说明垄断组织与官僚机构的混合和融合，就有必要阐明它的前提，即垄断资本积累过程与官

僚机构发展过程的相互关系。如果对此姑且置之不论，这里就需要首先指出如下各点。

第一，“融合论点”、“官僚制论点”、“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概念等，它们共同的地方是，把握竞争和垄断的关系时，都认为这二者是单纯的对立的概念，垄断等于组织化，竞争等于无政府状态，并强调前者在社会上和企业内部的优势。但是，最近关于国家问题的争论，也开始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垄断化愈是发展，现代国家反而愈是强调“价格机制”和竞争的一般框框，愈是使垄断组织之间、垄断与非垄断、政府与企业、劳资之间、工人与居民之间的互相竞争加剧，因而从经济理论上来说也应当提出，怎样认识“价格机制”和“竞争”的作用范围，正在扩展到历来认为处于价格机制作用之外的公共企业产品等问题上来。具体地说，在提出垄断国家还是总资本家即官僚国家这一问题之前，不是应当先讨论既创造了竞争条件又提供了按照实力大小进行统治场所的国家本身吗？[1]

第二，在提出融合论点还是官僚制论点这个问题之前，应当首先提出，在资本主义下社会和居民是否可能对于资本的营业自由进行监督（简单地说是改良）。在这种场合，什么是官僚机构和公务的职能呢？资本主义下的改良，不只是维持总资本和资本主义秩序的，它对于工人阶级和居民的发展将起怎样的作用呢？如果撇开这些问题，无论怎样论述危机问题，都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因为阶级斗争不单单是铁板一块的国家政权与铁板一块的工人运动的对抗，它总是包含着诸如工厂法之类的民主法律和站在居民立场上的工厂视察员之类的新问题，总是一个包含工人阶级力量向国家政权内部渗透的过程，这已经是从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为人们广泛承认的事实。就这个意义来说，在提出“垄断国家”还是“整个资产阶级国家”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提出：“资本

家阶级（包含垄断组织）统治工人和居民还是工人和居民向他们进行民主监督呢？”这应是一个更为全面的概括性的质问吧！[2]

首先，扩大你的视野——这是对于争论进行评价的首要前提条件。

注　释：

1. 池上惇：《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请看其补论三。

2. 参阅池上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中的国家》（古川、加藤、良知、鹫见编：《现代资本主义与国家》）。

第七章　关于欧洲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争论的主要论点(二)

——晚期资本主义论的问题

前　言

关于代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复活希法亭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点这种动向的出现，我们已在前一章研究过了。这种主张是把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侧面尤其是官僚制问题加以极端地夸大，使其成为说明一切现象的基本原理。其内容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争史上，甚至比瓦尔加观点还要落后一步。然而前面已讲过，在瓦尔加理论的批判性总结还未充分完成的阶段，科卡等人提出的问题将能成为促进深入开展争论的一个开端。

这一章谈一下E·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它是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相并列的另一个批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的典型。曼德尔于1972年由苏尔康普社出版了《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从其序言看，是他在1970—1971年同西柏林自由大学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基础上，为献给“西乌克兰托洛茨基运动的共同创始人”罗曼·罗斯德尔斯基而写的[1]。1975年又追加了最新资料出了英文版[2]。这里主要根据这个版本概述一下，曼德尔为什么拒绝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概念而主张代之以晚期资本主义的概念，以及由此产生了哪些争论的问题？

注　释：

1. E·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尝试》苏尔康普社出版1972年第9页。

2. E·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J·D·布雷斯译，新左派书店，1975年。

I "资本——劳动的命题"与"阵营间矛盾论的命题"

曼德尔在该书第十六章探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时，也谈到了"公认的"属于共产党的一切理论家。还指出"所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的理论，陷入了作出晚期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消失了这个错误结论的境地。据曼德尔的理论，晚期资本主义是意味着帝国主义阶段即垄断阶段的更进一步发展的概念[2]。同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能够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基础上展开论述一样，它就是在当今的时代里，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研究的基础上，"在马克思的《资本论》所发现的资本主义基本规律的立场上，试图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战后史加以说明"[3]。曼德尔指出晚期资本主义概念的积极作用在于能表现"来自传统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的继承性和非继承性[4]〔非连续性——引用者〕"；它所考察的问题是，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它就具有资本雇佣劳动关系、价值增殖、价值破坏、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剩余价值率的上升、利润率的趋向下降、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和实现条件的矛盾，等等，这一切在现代的（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结构的条件下，如何在与开辟着超额利润的源泉的同时而发展的。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是企图把马克思在《资本论》所阐明的一般规律加以具体化，阐明在新的市场和剩余价

值实现的条件下，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如何从旧资本主义继续下来以至于具有了新的特点的问题。曼德尔说，晚期资本主义的概念决不是意味着不去研究通常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要解决的问题，即靠“永久性军事经济”为大企业保证市场、靠新殖民主义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辟市场、在国内试图开辟消费资料的新市场这一类新现象以及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问题。

那末，曼德尔所以拒绝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的理由是什么？他说那是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者”们为“现代世界的主要矛盾不是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而是资本主义世界阵营与社会主义世界阵营之间的矛盾”的命题作辩护。可以说他认为在这里存在“资本——劳动的命题”与“阵营间矛盾的命题”的对立，而前者是晚期资本主义论，后者则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前后二者处于一种对应关系之中。这种使上述两个命题对立的方法，对日本读者来说不可否认是会稍有异样之感的。举例来说，日本社会的“工人、居民”与“垄断、官僚”的对立就是曼德尔所说的“内在矛盾”，虽然是符合“资本——劳动的命题”的内容的，可是认为限制或扼止日本国内的阶级对立和矛盾的激化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阵营的这种想法，在今天来说不会有多少市场。然而，曼德尔却顽固地坚持对阵营矛盾命题进行批判，他说：“追踪这个概念的意识形态的根源并不困难，那就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说是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与被孤立的各个国家的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概念的否定。这个概念在意识形态上的职能是一目了然的。就是说它的意图在于，使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的斗争服从于苏联官僚制的外交策略合理化，把旨在创造反资本主义力量的过渡时期的斗争代之以旨在创造反垄断同盟的民主主义的有限的斗争”[5]。

只从这一段引文来看，人们可以在曼德尔的主张中感受到托洛茨基主义的陈腐的变帝国战争为国内战争、反对企图把革命的危机封闭在改良主义框子里的民主主义革命论的口号在发挥影响的印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的发生史能否容许曼德尔这样的解释，有必要作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关于列宁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使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的，曼德尔认为，列宁是在叙述1917—1918年德国的战争经济时使用的，在共产国际的纲领性文件上并未用过。据我个人的看法，这是错误的。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如追溯其起源就必然要遇到国家垄断这个概念。这是起源于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一书引用的《银行》杂志的文章（F·平内尔博士）所提出的"受国家监督的私人垄断组织"这个概念，其含义是"用国家补助来救济快要破产的私营企业"[6]。列宁在以后的论文中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合法化的盗窃国库"，因此，对于把这个概念用于由官僚机构在法律上行政上确认垄断组织的排他性的营业特权这个意义上，从发生史的角度来看，可能是最妥当的。总之，曼德尔主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概念就是为苏联官僚制辩护的理论。所以，对他是怎样理解"公认的"理论家的理论结构的，就应该在下面加以研究了。

注　释：

1. E·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英文版第513页。
2. 同上，第513页。
3. 同上，第10页。
4. 同上，第11页。
5. 同上，第514—515页。
6. 参阅池上惇：《国家垄断的基本概念》（载《现代资本主义财政

论》有斐阁1974年）第50页以下各页。

Ⅱ 限制垄断与官僚机构

曼德尔所举的公认的第一号理论家是苏联的V·切普拉科夫。1969年切普拉科夫[1]写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书。五十年代以来，他的文章在来自瓦尔加的论题的激发下而由库西宁编辑的文献资料之中出现了，曼德尔判断它作为公认的文章保持了长期的生命力[2]。据曼德尔说，切普拉科夫一方面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家的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矛盾的产物，另一方面又认为它是一种对由于国际、国内的"资产阶级的软弱化"和反资本家的各种力量的壮大而形成的"新的力量对比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反作用"[3]。要是只强调前者，那末曼德尔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就会被强调起来；要是只强调后者，那末适应反映了国际上"阵营间矛盾"的垄断资本主义新情况这一点就会被强调起来。于是，曼德尔就断定，切普拉科夫虽然采取着这种折衷主义的两面派立场，但是最后还是主张，国家为了适应各种矛盾，为了促进资本积累提高利润而加强了再生产的社会性，以至于国家对竞争加以限制并在资本主义之中加进了计划性。

如果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是帮助垄断的资本积累的工具，同时承认这个工具又对垄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话，那末，切普拉科夫的主张在强调前者的情况下，为了正面提出垄断和国家的结合即所谓"融合命题"，就不得不强调提出工人阶级和居民不只是同孤立的资本家也同国家本身的对立。另一方面如果说国家对垄断还具有作为工具的相对独立性，当工人和居民作为民主力量掌握这个杠杆而进行制伏行政当局的斗争任务时，那就又形成了可以"使用它们对付垄断"的结果。曼德尔不能容忍切普拉科夫承

认“限制垄断”的可能性。曼德尔在引用了切普拉科夫下述见解之后，终于斥之为“切普拉科夫的修正主义”。切普拉科夫说：“民主计划需要国家的干预，以限制对生产资料具有自由支配权的垄断资本，保证工人阶级参加管理企业”[4]。据曼德尔的观点来看，面对包括“阵营间矛盾”的各种矛盾，为了适应此种情况而使国家机构庞大化了的垄断资本主义，加强了生产的社会性，使工人、居民“参加管理”的条件成熟起来，以至于在国家机构中找到了能限制垄断的门径。这种主张与下述见解有关，即认为由于两个阵营间矛盾的加深，帝国主义国家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能够进行民主主义的反垄断的限制。由于把民主主义的要求摆在正面，结果就会把工人阶级打倒资本家阶级，掌握政权这样的任务当成次要的东西。这个主张将会导致如下结果，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被限制在为民主而斗争的框子里；在国际上，被限制在旨在支援一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共处”体制的框子里，从而失掉了革命性。如果这种主张是正确的话，那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就成了斯大林主义的现代版，就成了为苏联官僚制辩护的理论。

然而，仔细思考一下，令人感到曼德尔的这个观点是极其牵强附会的。姑且不论切普拉科夫观点的是非。就是看一下曼德尔常常好引用的《资本论》的论述，也可令人感到否认从资本主义中会出现限制资本主义营业自由和取缔资本专横的法律和制度的事实也是不可能的。例如，工厂法对作为资本的营业权的组成部分的劳动时间的自由延长的权利进行社会的限制，由称作工厂视察员的公务人员监督实行；又产生了义务教育制度、保险制度、保护工人居民权利的法律等大量的法律和制度；在现代又产生了国有化、公有化、财政金融上以居民为中心的管理经营、防止公害保护环境的法律和行政体制等，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5]。如果

把承认这种事实的人都叫作修正主义的话，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就都成了修正主义者了吧！关于限制资本营业自由权的改良，究竟是作为一种单纯的策略而用以欺骗工人居民的手段，还是实质上限制垄断，创造社会上大多数人掌握国家权力的前提（即是否创造革命成熟的条件），对此，曼德尔不进行任何的研究就急于得出结论。然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却超越了曼德尔和切普拉科夫的水平，对改良是走向革命还是停止于策略的界限问题进行了慎重的研究。例如，马克思为了判明工厂法能否保护工人的权利，就不断地研究工厂视察员的工作能否为工人着想，地区法院的裁判态度如何等公务人员在工作中的权利和居民的自治权利的发展程度[6]；在探讨法国政治史时，他还考虑了，地方自治的权利与教师自由进行教育活动的权利如果得到保证，居民的发展就应该得到保证的制度。而这种制度在教师改为隶属于拿破仑的人事权的处境时，它就变成了统治居民的一种工具[7]。更何况当巴黎公社兴起时，就是把否限制议员、公务员的“名利思想”看作是教育、福利、警察的行政工作能否达到以居民为中心的关键[8]。恩格斯则注意于作为担当军事任务的公务人员的兵士，他说：“兵士如果继续从工人、农民中得到补充，居民与公务人员（兵士）的团结就容易，兵士把国家政权借给的作为行政工具的武器不是指向居民而是指向少数拥有特权的官僚阶层时，革命就到来了[9]。在分析巴黎公社失败原因时，还举出了公社未对巴黎的银行进行控制，就是说未能触及大资本的营业自由权[10]。

总之，只要是官僚机构从社会中产生、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执行不符合社会成员利益的职能时，任何民主的法律也容易变成徒具形式的东西，反而起到促进资本积累的作用。但是只要居民对官僚机构施加改造手术使之民主化，就可以使公务人员作为担负执行居民权利的人，在“一定的限度内”发挥作用。官僚机构

的军队如果采取符合居民利益的行动，以之为中心对银行和大企业的限制就会超越一定的限度而发挥极大的力量。当然，只要存在万能的货币权力，还不能说靠这些措施就能直接削弱垄断的力量。然而，靠这些可以进一步扩大垄断和民主的矛盾。离开官僚机构及其民主化问题，象切普拉科夫那样，认为面对危机的垄断组织使国家机构庞大化，加强官僚的独立性，从这里就可产生对垄断实施限制的可能性，这是不可能的。也不能象曼德尔那样对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改良和民主的意义估计过低。官僚机构如能实现民主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生产、流通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簿记、记帐、统计、交通、通讯、金融、宣传工具的机构就都可以一变而成为限制垄断的营业秘密和自由的巨大机构。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了生产、流通、分配的社会性的事实出发，直接主张民主限制的可能性，是日本历来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争论中屡屡出现的被称为“生产力论”的一种倾向。而在这一点上，切普拉科夫稍欠明确，恐怕是事实吧！从生产和流通的社会化本身来看，在私有制和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多数是表现为垄断和官僚制的加强，很难认为它可以直接作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而发挥作用。

如果说必须探讨的课题是，官僚机构的民主化或者否定它的因素是怎样从资本主义当中合乎规律地产生出来的，不如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论证公务劳动与居民利益相一致的必然性这个课题。可是，这个课题不是从欧洲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争论当中，而是从日本的公务劳动论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当中找到了解决的线索[11]。不去讨论居民统治能力的发展和官僚机构的民主化问题，仍旧辩论是斯大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的西欧，在这一点上，也许可以说是一种稍感落后的现象。曼德尔进而又把笔锋指向了东德的齐香、法国的波卡拉，并展开了批判。因其论点与用

以批判切普拉科夫的东西大体相同，对它的研究就从略了。只是法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包含与切普拉科夫不同的新问题。对这个理论的研究，留到下一节来进行。

注　　释：

1. V·切普拉科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莫斯科1969年。

2. V·库西宁编：《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莫斯科1961年。

3. 参看曼德尔所著前书第516—517页和切普拉科夫所著前书第15页、第516—518页。

4. 见切普拉科夫所著前书第460页。

5. 制定限制资本营业自由权的法律与资本间竞争的缓和不是同义的，现实是资本间的竞争反而激化了，对此，曼德尔也不屑一顾。例如，如果制定了工厂法，因为中小资本也不能延长劳动时间了，就更不可能靠把劳动时间延长到超过大资本的办法来对抗大资本了，因而大资本与中小资本的竞争就激化起来，向大资本集中的趋势加强了（参看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512页以下）。

6. 参看《资本论》第1版序言、第1卷第8章第6、7节、第13章第9节。

7. 参看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694页）。

8. 参看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414页）。

9. 参看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210页）。

10. 恩格斯为德文版《法兰西内战》第3版写的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333页）。

11. 池上惇：《财政危机和居民自治》青木书店1957年。

Ⅲ “内在逻辑”与国家的地区性

晚期资本主义概念不是曼德尔第一个提出的。希法亭在1927年德意志社会民主党基尔大会的报告中，就曾经对一部分人使用的“晚期资本主义”概念，表明了他本人不能赞同的意思[1]。看来，这是为规定经过第一次大战这种新局面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创造的词汇。为了理解第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局面，曼德尔提出的晚期资本主义论，作为表述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一种方法，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然而已如所述，曼德尔所给予这个词汇的独特内容，从能否具有普遍性来说未免过于狭窄了。更深入地研究，作为表现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局面和新阶段的总危机的理论，或许是更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吧！

假如问题是这样的话，那就必须对总危机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关系重新进行理论上的探讨。这样的话，就不能不从整体上来把握资本主义的新局面、新阶段与在这个基础上运动着的资本、垄断、金融资本、国家和官僚机构的关系从而进行研究。这时，历来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争论中通常所说的“资本、垄断的内在逻辑”问题，和被称为“资本、垄断和国家对总危机的适应”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成为决定性的重要问题。在日本，如前所述，已故井上晴丸、宇佐美诚次郎两人五十年代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和对此依靠国家干预以确保利润的一种体系，从而着眼于这种“内在逻辑”在第二次大战后总危机的各种条件下是如何运动的[2]。因此手岛正毅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3]，法国、意大利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大体上也采取了同样的理论结构，都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利

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在现在的表现形态[4]。

对这个观点，至少可以作如下的评论。

第一，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以至于资本积累的规律和国家对它的反作用，或者从促进资本积累的角度来把握国家这种观点，就成为把资本积累规律在现代资本主义中进一步具体化予以把握的指针，这种观点作为剩余价值规律的一种具体表述是有用的，但是却存在着只能极为表面地说明资本积累与国家的关系的局限性。因为上述观点忽视了如下事实：资本积累的过程，在多数情况下，给地区社会居民的生活、纳税行动和共同体、家庭的存在形式以反作用，为公务和国家行政的膨胀提供了大量的条件。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社会成员因私人利害而分裂，共同体、家庭被资本主义彻底瓦解，这种情况愈是发展，准备应付意外灾害和战争的储备、治山治水、警察、交通、教育、文化、艺术等社会共同事务就不得不愈是转化为由脱离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基于政权的征税和居民的按地区划分的官僚机构来承担[5]。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官僚机构的发展是同时并进的合乎规律的过程，把两者的联系割裂开来加以论述是不妥当的。

当以国家对资本积累的适应为问题时，离开作为国家物质基础的人口和纳税因资本积累而起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又产生了什么样的新的“行政需求”这些问题，而进行抽象的论述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例如以创建保育院这个实例来说，就可以作出如下的分析，即从国家适应资本积累的要求这一点看，保育院的设置是对工人、居民要求的一种让步。与此同时，资本又把这个让步利用于有效使用劳动力和统治手段上，从而使之成为资本增加利润的手段。然而，保育院的成立就是资本积累在地区发展的结果。双职工增加了，所得税纳税人增加了，以前靠家庭的成员间互相帮助这种职能所维持的保育工作，从单纯的家庭内劳动转为

托给由地区社会和自治体所雇佣的保育工人。因此，保育院的成立就是这种劳动的转移过程，也是扩大厚生福利部门行政工作的过程。国家给资本积累以反作用时，就是在这个过程的基础上，只要保育院是在居民自治力量控制下，那就会成为改善居民生活的因素。保育院如果被控制在厚生福利部门的官僚行政的框子内，那就会在福利事业工人的低工资、增加劳动的基础上扩大厚生福利部门官僚的权限。那末，保育院的成立也就是靠“低福利、高负担”加强对居民统治的过程。保育院是否成为资本积累的手段，应该以这一点为基础而不应该靠抽象的“国家的适应”来进行探讨。

第二，重要的是，国家的适应必然由用一定的技术装备起来的行政手段，与公务劳动相配合而进行。为了实现这个配合，必须从民间买进技术、物品和机器，并雇佣公务人员。在这一点上说，如果没有一定的行政技术水平和公务劳动理论国家对资本积累的适应就不能成立。

沿着这样的方向考察下去，就能理解，官僚机构以把大企业的技术移植到行政上的形式，把从居民生活需要产生的行政需求提高到由居于居民之上的官僚机构担任起来的趋势。这样，与考察扩大居民和公务分工条件的同时，当然也会对居民与公务通过官僚机构的民主化又合为一体的趋势加以考察的。这才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能够对公务承担者的工人化，和所有居民都受到教育训练担负统治任务的条件成熟起来作出预见的根据。日本关于地区、自治体研究的成就，由于着眼于国家的地区性，在一步步地向着上述研究方向接近，因 此，可以认为在这里也已经奠定了超越西欧的基础。

注　　释：

1. R·希法亭：《社会民主党在共和国中的任务》1927年5月在基尔大会上的报告，第2—3页。

2. 井上晴丸、宇佐美诚次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潮流社1951年。

3. 手岛正毅：《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有斐阁1966年。

4.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经济部《经济和政治》杂志编、大岛雄一等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上、下册，新日本出版社1974年。

5. 池上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地方自治》（载《地区和自治体》第5集，自治体研究社1976年版）。

末　章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争论的成果和问题

前　言

战后日本以国际争论为背景所进行的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的争论，取得了哪些成果，还有哪些问题有待于今后继续研究下去？在结束这本著作之际，作一个简单的概括。作为评价的尺度，想以井上晴丸、宇佐美诚次郎两位先生所提出的如下三个问题为准分别进行探讨。

第一，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类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的理解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作为危机理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第二，垄断阶段的资本积累、利润规律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作为垄断理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第三，有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历史地位问题，特别是国家和官僚机构、民主主义和向新社会过渡的问题（作为过渡的理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Ⅰ　总危机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大危机、帝国主义战争、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和民族解放运动

的高涨等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经济危机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处于怎样一种关系？对于这个问题，争论的基本对立之点如下：

就是说，这些危机，井上、宇佐美两位认为，是“覆水难收”，它不只是暂时性的危机和暂时性的战争体制，而是如同结构危机”、“制度危机”等提法所表现的那样具有经常性的东西[1]。如果认为结构危机提高了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促进了靠税收等救济垄断的破产和技术开发的话，那末，是以这个结构危机的存在为前提来把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还是作为与结构危机大体无关而当作“生产关系的社会化”的表现来把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成了争论中最主要的对立点之一。争论的结果，“生产关系的社会化”这个概念本身否定了国家的政治性，它作为把统一生产关系寄希望于国家身上的一种观点被拒绝了。但是作为这个情况的结果，也同时提出了关于结构危机原因的若干理论问题而使有关这个理论的观点更加深入了。

南克巳、古川哲等人把结构危机的原因求之于垄断阶段价值规律形态的变化。他们认为与自由竞争性质迥异的垄断的统治给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带来了结构的不平衡，而这种结构的不平衡只有靠国家的暴力干预即战争体制才能维持。他们是从这里找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必然性的[2]。

他们的研究方向是根据这种方法，把危机周期即垄断阶段的工业周期看作经济内部的周期因素和为战争体制所规定的一种政治周期两者的合成物，与加深现代经济变化论的同时[3]，又以再生产论中编入军需部门作为方法论的基础，企图阐明美国靠军事支出进行的研究开发和技术垄断；企图阐明美国国内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跨国公司的统治世界的基础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制崩溃的必然性等[4]。

大内力则把结构危机的原因求之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这种政治危机本身。他认为，怀有危机感的金融资本为了应付这个过渡时期，下决心凭借管理货币制度和通货膨胀干预劳资关系，实行缓和失业和实际工资的统制政策。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确信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垄断阶段价值规律的形态有了变化，而是处理过剩人口和失业才是得以应付政治危机的基本问题[5]。从而可以说这个说法，在阐明通过通货膨胀支配劳动力的现代意义上提出了重要的问题。

本书中，如同研究布哈林学说时所明确的，垄断阶段价值规律形态的变化表现在，由于垄断的形成，改变了历来互不了解对方情况的自由竞争状态，它计算世界的原材料的多少和市场的大小，了解中小企业的经营内容，知道群众的收入和储蓄的水平，懂得能从国库汲取多少资金。在此基础上，缔结垄断组织相互间的协定并且进行垄断集团相互间的竞争[6]。这个事实，在加速垄断经济的发展，加快科学技术开发的速度并促使它急剧发展成为可能的同时，反过来也会令人预想到一旦形成生产过剩危机，那末资金闲置的规模就要加大，损失的金额也要增多，从而带来长期而严重的不景气，垄断组织相互间把损失转嫁给对方的斗争以及斗争规模之大也会达到空前的程度。在这一点上，垄断阶段价值规律形态的变化，可以说在经济变动方面使繁荣的高峰越来越高，萧条的深谷越来越深。这种场合，对于垄断阶段价值规律形态的变化是否可以直接与慢性萧条结合起来看，还是一个有研究余地的问题。

可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垄断集团间的竞争产生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的国家垄断。如平内尔的考察所表明的[7]，国际垄断的协定和竞争改变了专卖的概念，通过由国家税收援助垄断组织和对公款的合法的私人占有而发展了与其他国家的垄断

集团进行竞争的手段。这里产生的国家垄断，渗透到一切经济领域的过程，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8]。

那末，这种场合，结构危机怎样予以说明？它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关系又是如何？

如果认为垄断阶段的价值规律以加强国家垄断的形式推进了国际上垄断集团的竞争，那末能与这个国家垄断相对抗的竞争手段就是垄断原材料，为了确保此种垄断还要对领土进行垄断[9]。但是大垄断企业如果要通过所谓扩大对殖民地的垄断来同对方国家的国家垄断相对抗时，大企业就必须通过垄断组织的发展来扩充销路和对金融的支配能力，而这种垄断组织是依存于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组织的。因为如果没有市场、销路和财政的扩大而要去限制别的国家的主权以垄断原料资源是极端困难的。

特别是通过财政和借款建立联系以谋求敷设铁路和推销铁路资材，是与在保护关税和国有企业所持有的竞争能力的帮助下廉价扩大商品销路同样重要的一种扩大殖民地的手段。这样一来，想要堵死用国家垄断来对抗私人垄断的可能性，就必须加强殖民地的垄断。然而为了加强殖民地的垄断，又必须加强国家的垄断来进行对抗。而且由各个国家的垄断所增强了的国际垄断集团，围绕领土进行争夺时，就会发展到为了在竞争中获胜而使用终极手段即加强足以吞掉民族自决权的军事力量的垄断的地步。国家垄断这个概念的发源地德国，在与殖民地的垄断这个概念的发源地英国相对抗中，以帝国主义战争为契机确立地跨本国和殖民地的战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通过以垄断军事力量为目标的战争经济和战时动员进行的。为垄断军事力量进行的生产、流通、消费的统制，使私人垄断组织为税收和国库而进行的营业活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大了；使由国家的垄断所保障的殖民地投资扩大了[10]。

以这样的形式去理解以两次大战的战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第二次大战后美国的军事力量垄断为背景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那末垄断阶段价值规律形态变化的理论化工作，就不能不以由国家垄断、殖民地垄断、军事力量垄断造成的大企业、大银行的竞争关系作为典型。第二次大战一方面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使殖民地垄断面临危机；另一方面产生了美国对经济、资源、军事各方面的垄断远远超过了西欧、日本的水平这样的状况。结果，为保障美国世界企业的营业活动，利用军事、技术、资源、市场、金融、通货等方面的垄断力量使美国以外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和殖民地垄断解体，再以隶属于美国的形式加以改组的这种情况发展起来了。比如日本，美国使其在第二次大战中的国有化部门的电力、钢铁部门解体，代之以实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通货制度，实行了道奇路线和索甫税制，提高了财政、金融进行“统制”的比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由日本的防卫力量“分担”占领军的军事力量这种方向以及加强对外援助等[11]。

把结构危机的原因求之于垄断阶段价值规律的形态变化尤其是国际的大公司的竞争和斗争内容的发展的观点，是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求之于在总危机下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和军国主义灭亡的规律的[12]，这些都是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深入地多方面地加以探讨的问题。就是这样，也可以说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争论的成果吧[13]！

注　释：

1. 井上晴丸、宇佐美诚次郎：《危机中的日本资本主义结构》岩波书店1951年。此书关于危机叙述如下：“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以世界分裂成两种制度为背景而被推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

危机。对资本主义制度来说这正是崩溃的危机；同时对下一个新制度来说也是它成立的基本条件的成熟。”（第8—9页）

2. 参阅本书第一部分第3章第3节南克巳的见解。

3. 古川哲：《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的结构与工业周期》有斐阁1970年。

4. 南克巳：《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战后‘冷战’体制的性质》（《土地制度史学》第27期），《美国资本主义的战后阶段——若干基础指标——以1963年工业普查为中心》（同上第45期），《资本输出的战后、美国的阶段——若干基础指标——美国商业部‘1966年世界企业调查’摘录》（同上第60期），《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改组的基本性质——以美对西欧扩张为中心》（《经济志林》第42卷第2期，1974年11月），《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改组的基本性质（承前）——以美对西欧扩张为中心》（同上第43卷第3期，1975年7月）。古川哲：《国际货币基金体制的崩溃与战后资本主义的结构转变——贯彻价值、再生产规律的现代形态》（《土地制度史学》第42期，1969年1月）。大岛雄一：《现代帝国主义与财政、通货危机》（载岛、宇高、大桥、宇佐美编《新马克思经济学讲座》第3卷，有斐阁）。

5. 大内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揖西光速、加藤俊彦、大岛清、大内力：《日本资本主义的没落Ⅱ》东京大学出版会1963年初版。大内力：《日本经济论》上，东京大学出版会1962年版。

6. 参看本书第2部分第2章。

7. 参看本书第2部分第1章。

8. 岛恭彦：《〈帝国主义论〉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1967年12月号）。

9.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802页）。

“最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最大企业家的垄断同盟的统治。当所有的原料来源都被霸占起来的时候，这种垄断组织就巩固无比了。我们已经知道，资本家国际同盟怎样拚命地致力于剥夺敌方进行竞争的一切可能，收

买铁矿产地或石油资源等等。只有占领殖民地，才能充分保障垄断组织获得胜利，战胜同竞争者斗争中的各种意外事件，直到战胜对方打算用国家垄断法来实行自卫这样的意外事件”。

10. “这种政治一再向我们表明，两个世界庞然大物即两个资本主义经济集团不断进行着经济竞争。一方面是英国，……靠剥削广大殖民地，……另一方面同这个主要是英法集团对立的是另一个资本家集团，这个集团更加凶恶，更加蛮横。这个集团的资本家走近资本主义筵席的时候，席位已被占光了，但是他们采用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新方法，有了优良的技术和无比优越的组织，使旧的资本主义即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大托拉斯、辛迪加、卡特尔的资本主义。这个集团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化的原则，把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和国家的巨大力量联合为一个机构，使千百万人处于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组织之中”。（列宁：《战争与革命》，《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74—75页）。

以这个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国家化的原理为中心谋求其理论化的力作是上田耕一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宪法问题》(《思想》1962年5月号)。

11. 坂田昭夫《国际财政论》，有斐阁1976年。池上惇编著《现代世界危机与资本输出》，青木书店1973年。广田司朗《国际财政论》（载高桥诚编《现代财政论》，日本评论社1975年）。

12. 池上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有斐阁1965年。

13. 探讨日本的隶属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力作有一濑秀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研究》新日本出版社1972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的现代课题》（《现代与思想》第21期）。

Ⅱ 资本积累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日本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从井上、宇佐美两人的学说开始，不断地以利润率的趋向下降的规律为中心分析资本积累过程，致力于把国家摆在反对这种趋向的各种因素之一而且是主要因素的地位上。这个基本态度在法、意两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理论中也有共同之处[1]，波卡拉认为，这个规律的贯彻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当长期的下降局面或者说是与长期萧条的存在和资本过剩的形成以及积累过剩相结合着的。为摆脱长期萧条，就必需包括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在内的提高剩余价值率的各种手段。国家干预私人资本的业务，通过金融财政、国有化等各种手段，承受伴随资本的“贬值”而来的损失，分担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负担。总而言之，通过为私人资本负担损失和费用来创造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和生活上的条件。一方面提高剩余价值率；另一方面接替承担资本家的费用以提高利润率。波卡拉注意到这不单单是对企业的经营危机进行破产救济这个意义上的支出，而是“人才投资”、“对教育科学研究以及其它的投资”，特别强调了科学技术革命和国家作用的关系。这个理论还认为军事支出也与科学研究和教育的支出同样是“为了发展非生产部门的支出”[2]。国家既要应付垄断组织的经营危机，又要分担损失和开发的风险以及负担国防费，这种规律性，前面已经说过，是用“私人合法的占有公款”这个国家垄断的基本概念表述的；并把它看作以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为背景的长期萧条发展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由此而准备了长期的上升的趋势。波卡拉指出的问题可以说是非常正确的。还有，齐香说明了由国家完成投资问题的趋向，日本财政投资贷款的研究者也一直强调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这个侧面，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3]。

然而，问题在于，虽然说对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以及它的表现形态之一的积累过剩是由国家来处理的，但是为了使国家能够处理，就必须增加国家经济基础的税收和公的信用，就必须发展为资本积累而使用税收的官僚机构。如果认为现实存在着能够处理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和积累过剩的国家干预的话，就必须论证纳税人口的增加和官僚机构的发展是与资本积累并进的[4]。不

论证这一点，只单单停留在把国家的政治的、权力的性质作为前提上，是过去以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和积累过剩问题为理论中心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缺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说明从积累过剩到国家干预的必然性时，不论证资本主义获得垄断利润的前景，只是单纯地说国家负担私人资本的损失和风险，那就只能是片面地把握国家刺激垄断的投资活动的过程。国家依靠税收等承担垄断的损失和风险，也许确实是垄断组织扩大投资活动的前提条件，但是为了使垄断组织的投资能够付诸实践，还必须具有由垄断利润规律所决定的可靠的收益前景。

为了说明这个可靠的收益前景，许多论者假定通过垄断支配市场的力量来决定垄断价格。据此，再从存在过剩设备情况下的垄断价格的决定带来了原材料价格等的上涨，以及从国家予以保障方面论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确立。就是说，由国家的行政领导、财政金融体制和统制价格所支持的垄断物价体系才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而许多人认为，在垄断价格统治下，产生了使垄断的投资行动把价格维持在能阻止新的竞争者打进市场的程度的水平上的趋向，造成生产能力不能百分之百地开工而形成的慢性的生产过剩[5]，也以此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根据。这就是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一种由国家支持垄断价格的体系，而垄断价格又造成了慢性生产过剩从而使国家的干预程度日益加深。

在维持垄断价格上，国家的直接统制、财政（例如对企业的补助金）、金融（政府有关机关和中央银行的贷款等）所起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这可能是事实。但是以垄断价格为中心并且仅仅以此为中心来考虑垄断利润问题是否合理？如小笠义次所指出的，在美国，资本收益即有价证券（股票等的）、土地等涨价的收益和买卖这些东西的收益达全部利润的五分之四[6]。

这样，投资的决心不单纯是与垄断价格有关，也与可能取得资本收益的预计有关，应当看到，在预计可能增加资本收益的情况下，垄断价格起着一定的作用。在提到垄断利润规律时，这个规律就不单单是垄断价格问题，也必须是与资本收益增加的规律性有关的。因此，就应当提出国家干预经济用何种形式为获取资本收益创造条件，以使资本家决心投资的？然而，以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为中心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充其量也只是把问题搞到垄断价格为止，未能更广泛深入地展开。

以上说明了，深入研究赋税、公的信用以及官僚机构发展的规律性问题和在垄断利润规律中的资本收益问题，这对于以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为中心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争论与有关领域的研究一同在这两个方面都得出了一定的结论，明确了今后的研究方向。以下分别把这两个方面的论点阐述清楚。

第一，关于资本积累与官僚机构发展的相互关系。

第二次大战后日本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争论是把争论点集中在国家论上面的，这是它的一个大的特点。这是因为日本一直存在着一个基本问题，即关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官僚机构的评价及其作用问题，是把它看作寄生的、权力的机构，还是看作对生产力的进步发挥积极作用的机构。由战前日本资本主义继承下来的落后性，加上处于危机和战争的时代，使官僚机构更加发展，这就更加提高了人们对国家的关心。

我们在概述德国的争论时也已谈到可以从希法亭等人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当中得到这样的看法：战争的结果使工人在军队和官僚机构中所占比重显著地增加了；作为生产力和实施合理化政策的中坚力量，工会的作用增大了，因此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当中军队和官僚机构，对工人来说已不是解散和改组的对象，

毋宁说已成为“参加”的对象了。似乎在德国也同日本一样可以看到企图对官僚机构的积极面给予肯定评价的趋势[7]。列宁研究俄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认为，官僚机构是已经不反映社会成员利益的“寄生虫”，在变革国家政权时当然应该予以彻底解散[8]。

在日本的争论中，站在彻底主张“生产关系社会化”说立场上的人，是把国家本身当作具有把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统一起来的职能的东西来把握的。从这个立场来看，国家是以某种形式反映社会的共同利益的，回避了它是不反映社会成员共同利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这个基本的认识。

于是争论的进展就不得不探讨下述问题了，即不仅强调国家是居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机构这个结论，而且要研究国家和官僚机构是怎样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积累的进展，并且与之相关连地发展下去的问题[9]。一般的情况是，资本主义的进步要伴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国内市场的统一和语言的统一，因此，社会消除了按地区分散的共同体和封建体制国家的壁垒而成为一个统一体；与此同时，人们的社会关系只是表现在所有或占有货币的私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形式上，从而使社会因私人利害而分裂了，这是已经讲过了的。社会一经被私人利害所分解，应该反映社会共同利益的公共事务（共同体的保卫、土木建筑、交通、清扫、文化、教育等等），和完成公共事务所需要的社会成员的公共财产（自发的捐献、准备应付荒年和意外灾害的储备、水源的管理设施、一般为共同体成员的生产和消费提供的各种公共条件）已不可能靠社会成员的自发性来支撑了。这就要任命领取薪金的官僚，以完成作为商品生产者自治职能的保护私有财产（军队、警察）、征税机构（财务行政）、为商品流通和交易服务的货币制度、最低限度公共开支等任务。

可是，这种商品生产者的自治职能，当然不能反映不持有货

币财产者的利益，商品生产创造了使社会的公共事务转化为由居于社会之上的官僚机构担任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由机器和大工业独立支撑的工厂制度一经发展起来，工厂制度和科学技术的成果就被移植到官僚机构上，以高度技术装备起来的军队、财务制度、公共活动就被实行和开展起来。这种情况愈是发展，国家和官僚机构与工厂制的产品的关系就愈是密切。如果忽视私人生产的生产力，国家和官僚机构就不能维持下去，愈是如此，就愈是同私人利益发生联系而与社会的公共利益远离下去[10]。军队同许多军需品制造业者发生关系，反映他们的利益并行使财政权力就是典型表现。另一方面征税机构也通过货币经济的渗透而同私人生产者的收入、居民的消费活动发生密切的关系，增加税收就比较容易了，国家财政力量的基础也就显著地扩大起来[11]。商品生产的发展一方面把社会的公共事务转化为权力机构的事务，另一方面又把社会的公共财产出售给私人以使征税机构发展下去，这就为资本主义发展同官僚机构的关系提供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探讨垄断的形成和发展使官僚机构向怎样的方向发展的问题是必要的。战后日本的地区，自治体问题的研究者通过地区开发的研究，在使这个问题得到某种程度的确切表述上取得了成功[12]。

众所周知，垄断的发展造成了产业和地区异常的不平衡发展，这个过程包括国家用财政资金购买构成地区社会的居民生产和生活共同基础的土地、水源和其他资源，以供给大企业等利用。所谓“社会资本”和国家经济基础部门项目的建设和利用过程包含着：一方面形成以财政资金为中心的国有财产，另一方面这种财产又被转卖给大企业或为大企业所利用的过程。如果把这种官民一体的土地所有和土地利用的形式称作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13]的话，此种所有形式就具有如下职能：使地区自然发

生的、共同体的土地所有和水利权以及受此支持的小私有者解体，又通过补偿形式的货币关系使居民同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的基础脱离。这一方面促进了建设省、自治省、大藏省、通产省、运输省等官僚机构的扩大；另一方面又给居民生活带来了摆脱财产束缚的自由和货币经济的支配。因此，使地区共同性的最后堡垒家庭也解体成为许多小家庭，从而使历来由家务劳动承担的保育、教育、福利、清扫、环境保护等事务不能再在家庭内部进行，于是就扩大了地方行政以医疗、教育为中心的业务活动内容，这也使官僚机构膨胀扩大。劳动省、厚生省、文部省、自治省、地方公共团体的工作领域势必迅速膨胀起来。随着官僚机构的膨胀，共同体和家庭被解体，农民阶层分化被促进，这又使个人所得税缴纳者中工资收入者的人口剧增，从而保证了税收的激增。此外，货币经济的渗透与生活的不稳定化又使储蓄激增，增加金融机关尤其是邮政储蓄而起到了支持政府金融活动的作用。在这里，地区的共同体、家庭、小生产者的解体是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强有力地推动着的。与之相对应，在生产基础和生活基础两个方面的官僚机构都在急剧地膨胀，尤其在政府出资法人和地方公共团体中可以看到公务人员剧增的规律、税收和金融的基础并进地剧增的规律[14]。这个过程的基础是如下的事实：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基础上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的扩展，地区共同体、家庭、小生产的劳动被大规模的社会化劳动所代替，其内容为：交通、邮电、流通、医疗、教育、文化、环境和资源等。然而在资本主义和垄断的统治的条件下，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化这个基本事实，一方面产生了因资本的营业活动进入社会化的生产和消费的领域而发展起来的各种产业——住宅、教育、医疗、交通、流通、新闻广播事业等等；另一方面，也相应地产生了通过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来掌握福利、教育、交通、

通讯等领域同时又把各个家庭变成了纳税单位的过程；其结果就表现为营利组织和官僚机构的发展。生产与消费的高度社会化表现为最富于投机性和寄生性的机构的发展，这个规律的发现，可以说是日本的地区、自治体研究的一个成果，它给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开辟了新的视野。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贯彻和积累过剩的发展过程，就是地区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家务劳动转化为由官僚机构承担（这是由于社会成员彻底解体为私人生产者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土地所有规模的发展造成的）的过程，也是纳税人口剧增的过程。不言而喻，保险和储蓄的活动更加促进了这个过程。论证资本积累与官僚机构并进的发展关系，就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因素了。

第二，垄断利润规律与资本收益。

与资本积累过程并进的官僚机构的发展使纳税人口和作为公共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的保险、储蓄迅速增加[15]。这样一来，增加的公款被垄断资本私人占有的过程就包含两个过程：一是从民间筹措维持官僚机构所需要的物资和资源的过程；二是垄断资本私人占有和利用公共所有或占有下的资产和劳动力的过程。如果把前者称作国家市场垄断，把后者称作利用公有寻求特殊方便的垄断，那末历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便都是企图从利用这两种垄断维持垄断价格从而创造出反对利润率下降因素的角度分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市场垄断的例子可以举出：军需品的置办、兵员和公务人员的雇用、公共土木建筑工程订货、根据维持农产品价格政策的政府收购、计算机和办公用具的购置等；后者的例子可举出：廉价使用道路和港湾、低利利用国家资金、特殊减税、国有财产的处理出售、公共教育和研究设施的利用以及交通、邮电、贸易、汇兑、信用制度等的有效利用。

但是如前所述，从垄断价格找出获取垄断利润的整个特点似

乎有些勉强，资本收益如何通过扩大国家市场和利用公有的寻求特殊方便的垄断发生的，这个收益与垄断价格又是如何联系的，这都是必须予以回答的问题。

瓦尔加争论以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指出，不是为自由市场生产，而是为国库进行生产，是合法化的私人占有公款。这个侧面如果以军需品为例，在供应军需品时，因为交纳价格是以附有“暴利”的垄断价格向政府出售，所以国家市场被看作是保障可靠利润的东西，军火公司生意的发展前景就会受到高度评价。这就使军火公司股票价格提高，军火公司的大股东由于股票涨价而获得资本收益。这个确保利润的前景就会调动出指望将来收益的大规模的设备投资。不限于军火，通过公款的合法的私人占有而使垄断价格得到保证，这确实是会提高该公司的股票价格，使该公司的资产获得高估价，并会成为扩充设备的动力。并且随着这个过程还会同时出现下述情况，即垄断的寄生于公款、通过研制新武器的技术开发、以军事为中心的产业和地区产业的发展不平衡等。官僚机构垄断了能预测财政规模、政府活动的确实情报，行政方面的秘密和大企业营业的秘密通过人事勾结合为一体时，就会使前述垄断资本的计算可能性大大发展起来。行政和财务、统计工作的各种资料和簿记反映生产与消费的社会化而日益被积累起来。对此成果的应用，其结果就是由“可靠的收益”造成的资本收益投机勾当的扩大和基于对资本的过高估价的设备投资的扩大。一旦面临财政危机等失掉了获得利润的希望，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股票价格暴落和设备过剩，就会因萧条而使税收减少，就会由于寄生于国家市场的产业的生产过剩而进一步走上扩大萧条的道路。这就暴露了寄生于国家市场不是使企业稳定而是使其不稳定的因素。因此，为了靠确保垄断利润以阻止利润率下降而加强对国家市场的寄生性愈是加强，也就愈是进一步积累着利润率下

降的因素。

同样的过程在通过利用公有以寻求特殊方便的垄断上也可以看到。例如通过大规模的公路建设一经形成了交通中心，那末，周围的地价就一定暴涨。这就保证了土地所有者和大房地产业者的资本收益，也保证了开发产业的利润。因而与此有关的公司的股票价格就上涨，资产的估价也提高了，就又会产生了资本收益，银行贷款也得到了保证。从土地的利用中能提高收益的前景为公有制所确认，关于城市计划、住宅建设的情报，愈是被垄断组织所掌握，地价也就愈是随之暴涨，虚拟资本的估价也就愈是抬高，投资也就扩大起来。然而一旦地方财政危机和国家财政危机到来时，其后果与前述国家市场情况是一样的。

于是，为了避免财政危机造成的垄断利润危机，就要采取如下措施：发行公债以确保足以保持由国家市场和公有的利用以寻求特殊方便的垄断的财政资金，有时也增发纸币实行慢性通货膨胀政策，在确保靠通货膨胀获得资本收益的同时，又在虚拟资本价格跌落时，提高公债的利率使其作为资产为人们所保存，以便把损失控制在最小的限度之内[16]。

只有这样才能论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得不面临慢性通货膨胀与萧条同时存在，即“滞胀”的必然性。这个理论在阐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单单具有寄生性，也具有财政危机和滞胀这种极端腐朽性质的同时，还能论证，随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得不出现景气的急剧上升局面和猛烈下降局面的必然性。而且也阐明了景气一旦下降时萧条易于长期化的一个根据。阐明垄断利润规律以及它与官僚机构和财政危机关系的工作，有必要按此方向使它得到进一步发展。

注　　释：

1. 鲍尔·波卡拉著，村田阳一郎译：《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载金田重喜编《法国经济与共同政府纲领》大月书店1974年）。另外，波卡拉的观点在《经济与政治》杂志1966年6、7、8、9月号也展开了论述，详见金田重喜：《法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动向》（《东北大学研究年报·经济学》第97、98期）。

2. 同上，第14页。

3. 参看本书第一部分第三章第Ⅳ节。

4. 同上。

5. 例如，大间知启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弥涅耳瓦书房1969年。另外，对最近的垄断价格论的出色的概括评论有森冈孝二：《垄断资本主义论的改变》（关西大学《经济论集》第二十五卷第5期）。

6. 小谷义次：《实现收益与归属收益（一）》（《经济学杂志》第67卷第3期）。A·R·艾拉济：《资本收益的纳税》。

7. R·希法亭：《战争、裁军及国民军制度》、《关于战争的三本文集》，《社会》杂志第1卷1926年第3年度第389—390页。

8. 列宁特别着眼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而论述了官僚机构的问题。参看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列宁：《国家与革命》。

9. 参看本书第1部分第3章第Ⅳ节。

10. 池上惇：《现代资本主义财政论》有斐阁1974年。

11. 池上惇：《财政危机与居民自治》青木书店1976年。

12. 宫本宪一：《社会资本论》有斐阁1967年。

13. 参看池上惇：《现代资本主义财政论》见前第8章。

14. 池上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地方自治》（自治体问题研究所《地区与自治体》第5辑、自治体研究社1977年）。

15. 加藤睦夫：《日本经济的财政理论》青木书店1976年第1章第2节。

16. 岛恭彦：《通货膨胀》青木书店1977年。

Ⅲ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方面是与垄断的资本积累方式有关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或过渡时期以国家政权维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制。这是争论的参加者所一致承认的。从这里就出现了下述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的看法，即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一种趋向或一个小阶段的意义上，它仍具有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各种典型特征；同时，另一方面又是社会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各种条件虽已成熟，但仍要坚持资本主义，从而带有由此而产生的各种问题的一个阶段[1]。

如上一节所述，垄断时代的资本积累过程反映生产和消费社会性的发展，它与自由竞争时代不同，具有“计算可能性”。这种“计算可能性”既是获取垄断利润和投机收益的基础，又使承担社会化生产和消费职能的生产资料和工人，通过分工和协作的制度密切地结合起来，甚至连研究、教育、管理之类脑力劳动也社会化了，而为领取薪金的人、以雇佣劳动形式工作的人担负起来。

另外，与资本积累的进行并进的官僚机构的发展，使历来是共同体和家庭内部的劳动转化为社会化的劳动——公务劳动、因而建立起凌驾于居民之上的统治机构，同时使维持生产和生活的劳动社会化，尤其是使承担生命再生产职能的体育、教育、医疗等劳动也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这也使脑力劳动具有了社会性。

由于资本积累与官僚机构的并行发展，垄断向官僚机构的寄生化愈是发展，生产、消费、生活、劳动的社会化的进展就愈是迅速，从而使所有脑力劳动都由领薪金的人承担起来。私人所有

制的存在就成了只不过是把这种社会化成果作为资本收益等寄生性的收益加以侵吞。因此，没有资本家阶级，社会照样能够活动，成为尽人皆知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使社会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物质条件成熟起来，它表明没有垄断组织和官僚，社会照样能够经营管理。

反映这种劳动的社会化，在所有制形式上也出现了资本主义所有制范围内的更加社会化的所有制形式，股份公司、国家所有、自治体所有、工会所有等发展了，并且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情况下，使税收等官僚机构的物质基础以政府出资、补助金、国家市场的形式与这种所有制形式相结合，因而又把在更加社会化的所有制形式中对他人劳动的支配，和通过征税权对居民家庭生活的支配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尽管使劳动的社会化更加进展，使“计算的可能性”发展了，如前节所述，如果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作为投机收益的源泉而活动，那末，就不能不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用以征税权为基础的，官僚机构尽力维持已成生产力发展桎梏的生产关系的一种制度了。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基础即承担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整体和上层建筑尤其是国家政权、官僚机构的相互关系来看，在这里表现为上层建筑对社会进步的阻碍[2]。

如果要讨论这种阻碍能否除掉时，单纯地把劳动的社会化和“计算可能性”的问题当作物质的基础而加以论述是不充分的。必须论述的则是阐明推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变革的主体形成与积聚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进劳动的社会化，在此基础上构成官僚机构和投机的收益。这些构成物的形成过程就是“合理化”、劳动强化、失业、重税、通货膨胀等的进行过程。直截了当地说，也就是一方面是财富积累，一方面是贫困化的进行过程。通过分析这种贫困化过程以尝试客观地分析变革主体的形成过程，开始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不

仅把变革主体的形成单纯地作为政治觉悟和已知条件来处理，还作为工人阶级和居民发展的必然性的问题来处理的趋向也开始出现了[3]。

这种场合，如认为财富积累是通过垄断和官僚机构而进行的，那末，不言而喻，工人阶级和居民发展的条件则只有通过对垄断和官僚机构进行民主的限制才可能有产生的余地。因为贫困化就是意味着：由于财富积累，居民和工人对资本来说只不过是剥削资料，因而被排斥于人的全面发展（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统一，城乡的统一，劳动与生活的统一等等）的大门之外；并且对资本积累来说则不断作为相对过剩的人口而被置于严酷的生存竞争之中，参与统治的余裕时间和能力都被剥夺了[4]。

关于提供给工人阶级和居民以发展余地的“对垄断和官僚机构的民主限制”的必然性，以及实行限制的途径的增长问题，可以追溯到远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之前。

英国的市民革命已经针对君主专制创造了从市民立场出发的财政民主制度，创造了通过议会对专制主义的官僚进行民主限制的方法。再如美国的革命所表明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国内市场的统一、民族的自决、货币制度的确立，创造了以议会为中心的民主共和制，同时还创造了限制专制主义官僚权限的城乡地方自治制度。这个事实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诞生之际，不能不对专制主义的官僚机构进行民主的限制。一旦针对旧势力的制度形成之后，作为负有商品生产者自治任务的制度就从民族自决、地方自治两个方面使民主制度固定了下来。这也表明国家和地方都确立了财政民主制度吧。然而，只要是这个民主制度停留在保护私有财产这个大原则的范围内，它就不能不反映资本相互间的严峻竞争，和反映这种竞争的工人相互间、居民相互间的严峻竞争。象英国那样把投票权给高额纳税人，承认金钱力量的民主

主义，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来说，当然是极其有限的。

另一方面，在英国可以很典型地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产生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当他们要求普选权和缩短劳动时间而加强对议会的压力时，工厂法的制订就开始提到日程上。工厂法从其对资本的营业自由权给以限制的意义上来说，是在以保护私有财产为首要意义的民主共和制中加进了新的划时代的因素。工厂法包括确保缩短劳动时间、儿童义务教育、劳动场所和地区的保健卫生等，限制随意决定劳动时间，随意地雇用儿童、妇女，限制制造恶劣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资本的营业自由权，并且确定了为实施这种限制而设置工厂视察员这种公务劳动者。与前面提到的财政民主一起，意味着限制资本的营业自由权的经济民主的法律的制订，对工人阶级的发展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个法律和执行它的公务劳动，把劳动时间和生活时间划分开来，给工人阶级提供了一个途径，使他们建立自主和自治的组织（工会等）以参加工作场所和地区的民主活动，使他们提高文化教育水平以发展参加统治管理的能力。

因此，论证工厂法成立的必然性，作为工人阶级和居民形成变革主体的基础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大工业使工人与机器竞争，使成人劳动者失业，使妇女和儿童离开家务劳动和游戏而去工厂劳动，夺去了在家庭里的自由的生活时间、家务劳动时间和接受教育以及成长所需要的游戏的时间，出现了劳动时间长而工资低廉和基于父权制出卖妻子给资本家的情况。金钱关系进入家庭关系之中和生活时间的受到破坏，造成了劳动的痛苦和牛马一般的生活水平。资本主义使它的生产力基本要素即生命力的根源本身受到了威胁。这种“威胁”与前面提到的民主共和制度下的扩大普选权的要求结合起来，与以社会规模对滥用父权进行的批判结合起来，这样，工人阶级斗争的高潮就会到来，这是不言而喻

的。市民革命的民主主义，当它得到了随着工人家庭的解体而来的贫穷状态这块土壤时，普选权的要求就会突破市民革命所设定的框子而向前发展。

为了保障生命与生存的权利，就必须划分开劳动时间和生活时间，确立教育制度，建立卫生和保健的制度。以财产的所有为基础的民主主义加上以劳动和生活为基础的民主主义，就都发展起来了。

不仅是对破坏生命根源的原因即资本的营业自由权进行斗争，就是在资本的相互竞争中，把科学技术的成果用于生产，又兼提高工人的流动性而加强在劳动市场上工人相互间的生存竞争的过程，也在另一方面起着遏制破坏工人生命的反作用。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创造了群众性的工艺学以及其它专门学校。培养因劳动流动而产生的适应新劳动场所的能力，就需要造就具有基础文化知识和可能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机器和大工业一方面使人固定在单一作业上，而使其能力的发展片面化；另一方面又必须使人不断流动适应新的岗位。这个矛盾，一方面以糟蹋人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的形式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加重贫困化现象，另一方面又要求工人具有能适应各种各样职业的基本文化水平，产生了为全面发展准备基本条件的需要，于是义务教育制度诞生了[5]。

通过大工业导致家庭解体而失掉了的生活时间、家务、教育、医疗等劳动，就这样地一方面通过工人阶级的民主斗争，另一方面又由于资本主义本身创造了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基本条件（即使是在攫取利润的动机这个有限的推动力的范围内），而不得不以社会的规模重新建立起来。而且这种重新建立，首先就表现为，制订管束资本滥用工人的法律。工人视察员作为维护生命再生产的社会劳动（公务）的承担者而出现，通过他们的劳动，工人阶级所受的资本的营业自由权的压迫缓和了，获得了实现发展的基

础。公务劳动对资本营业自由权的限制和工人阶级发展所需条件的获得，就在国家政权内部纳入了保护工人权利的法律体系，就对历来以军队、警察、征税机构为中心的官僚机构施加了一定的民主的压力。特别是在教育和医疗部门的劳动者被地方自治体所雇佣时，就形成了一种在使自治体民主化并成为民主的学校的同时促进官僚机构民主化的力量。工人阶级和居民通过公务劳动和自治体形成统治能力的必然性，就垄断以前的资本主义来说，是可以作这样的论证的[6]。

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的转变，一方面通过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和教育制度、劳动流动的促进扩大了居民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又利用官吏调动职务的自由置国家于金融资本的支配之下，或是制造地方财政危机，限制地方自治权利，对教育和福利的内容加以统制。在教育和医疗部门设置官僚机构，以使公务劳动者从居民发展的承担者转变为凌驾在居民之上的官僚机构的承担者。公务劳动者在他是居民自治的承担者的条件下，他所进行的就是维持生命发展的劳动；在他是官僚机构的承担者的条件下，他就成了保障垄断的营业权，凌驾在居民之上的压迫生命发展的存在。公务劳动的这种两重性，是陶冶和训练公务劳动者的动力，也是促进公务人员工人化的杠杆。

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进了生产、消费和生活的社会化，并通过这样一些途径，诸如，以军事化为中心的国家市场的扩大、根据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土地所有的基本建设项目的扩充、所得税制和社会保险制度的扩充等，使公务劳动者的数目激增，使他们从工人阶级和居民中获得大量的补充，使他们雇佣化，使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的生活条件与居民并无不同。应该是以强制力量维持已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生产关系的官僚机构，由工人担当起来，就在其中包含着工人统治工人的矛盾。这

个矛盾由于下述条件的日趋成熟而日趋扩大，这种条件就是：通过财政民主和经济民主，对私人占有公款并依此来获得资本收益进行资本积累，对扩大以所得税为主的对群众的课税以及通货膨胀的“垄断与官僚机构”进行限制和统制。通过改革税制对资本收益加以课税，使官僚机构民主化以削减军事费用和高级官僚的开支，实行反垄断的统制，扩大为居民发展服务的各种支出，这些任务一经提出来，前述各种社会变革的物质条件和这种变革所需要的主体条件就会结合起来，就可以实行社会的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限制，对少数的富人及其巨大垄断力量的限制。当这种限制活动与国外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对跨国公司进行限制的运动结合起来时，严重的危机就摆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面前了。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争论经过了许多曲折，创造了许多成果，提出了许多的问题，也明确了研究的方向。现在也还在提出中间阶级论等许多新的论点，从国际争论的动向来看，今后也会提出更大的课题并会产生新的成果。本书的内容就是对迄今的争论情况所作的具有“中转”性质的阐明。[7]

注　释：

1.参看本书第1部分第1章第Ⅰ节。

2.参看池上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有斐阁1965年版第1章。

3.池上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贫困化问题》（载日本科学者会编《现代人的科学》第9卷，大月书店1976年版）。二宫厚美：《生存竞争·阶级斗争·全面发展》（《经济科学通讯》第19期1977年7月）。本多三郎：《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动和家庭》（同上）。

4.参看池上惇：《财政危机与居民自治》青木书店1976年版第1章第Ⅱ节

5.柳濑孝三：《关于公共教育费的理论基础的一点考察》（爱媛大学法学会《爱媛法学杂志》第1卷第1期1974年1月）。

6．参看向井喜典、池上惇、成濑龙夫编《现代福利经济论》青木书店1977年版末章。

7．概述迄今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争论的文献资料有如下各种：井上晴丸：《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的笔记》（立命馆大学《经济学》第1卷第3期1966年），坂野光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争史》（岛恭彦、宇高基辅、大桥隆宪、宇佐美诚次郎编《新马克思经济学讲座》第3卷有斐阁1972年），池上惇、重森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管理经济》（《经济》1972年8月号），森冈孝二：《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的方法》（《经济科学通讯》1973年春季号），村上和光、小林正雄、大内秀明：《日本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争《（大内秀明、镰仓孝夫、新田俊二编著《现代资本主义讲座》第1卷，日本评论社1975年），大石雄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芝田进午、田口富久治、金子八儿才、永原庆二编《马克思主义研究入门讲座》第3卷，青木书店1974年），上原信博：《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的谱系与发展》（静冈大学《产业与科学》第18期1965年），桥本辉彦：《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分析的一个观点》（东北大学《经济学》第32卷第1期1970年），石原忠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定问题》（载越村信三郎、石原忠男、古泽友吉编《走向垄断资本的道路》同文馆1969年）。

后　记

在“前言”中也提到过，本书是面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争论的新的发展，把迄今日本的争论限定在“国家与财政的理论”以及与其有关的理论范围内加以概括而写成的。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争论，此外还与许多学术领域有关，如总危机或现代帝国主义的理论、日本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尤其是技术和产业问题、现代国家论本身、现代革命论、现代民主主义论、甚至于历史学和比较社会史等等。虽然深入到这些领域进行研究是极其有意义的工作，但是也由于不属于我的专业范围的关系，就做不到了。

只是，关于日本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国家论和现代民主主义论，也发表过我自己的看法，并且受到了批评。因此，按道理说，更详细地加以说明和进行必要的反批评应是当然的义务。特别是最近，关于我在1965年以后发表的著作（《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有斐阁、《现代资本主义财政论》有斐阁、《财政危机与居民自治》青木书店等），柿本国弘（岐阜经济大学）、兵藤钊（东京大学）、富森虔儿（北海道大学）、远藤三郎（爱知大学）、大内秀明等人的联合研究组等诸位先生提出了许多的论点，本应辟一专章进行充分的探讨，但是限于文献资料和时间，不能克尽己责。特此表示歉意，同时也请允许我把它作为今后的课题研究下去。

另外，对原来是书评的部分，蒙允作为一部分纳入文章内；对杂志刊登过的文章，蒙允修改，为此特向《经济学家》、《经济论

丛》、《经济科学通讯》各编辑部表示谢意。

一看内容即可知道，本书的基本特点是以在货币理论和官僚机构论的基础上的资本积累理论的展开过程来对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关于货币理论方面反映了岛恭彦先生的近作；关于官僚机构论方面，有对地区和自治体问题的研究、教育医疗问题的研究的成果大量反映在本书之内。特此向自治问题研究所、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特别是自治体论学科）、全国升学就业指导研究会的各位先生深致感谢之意，同时还希望今后多加指教。大力推动本书出版的是青木书店编辑部的江口十四一、樱井香两位先生，对承担校对和其他事务的编辑部各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回顾起来，经历经济系学生、大学院研究生的时代以至今天，各位老师指给我许多文献资料。本书也提到了，有关《资本论》的文献资料受到故吉村达次教授，关于布哈林以及《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杂志受到田中真晴教授，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受到丰崎稔教授，关于列宁理论受到木原正雄教授，关于世界经济受到小野一一郎教授的启迪和借助于他们的力作之处是很多的。此外，对共同进行教学和研究活动的知心的同事尾崎芳治、野村秀和、中村哲、野泽正德诸位，经常承教，深表谢意，也希望今后多加指导。

最后，对从工作和生活两方面给我支持和鼓励的妻子顺子和长男令，愿以此书的刊行表达我的谢忱。

作　　者

1978年8月盛夏